

炎黄春秋

第 **10** 期
2008年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样联手的

我看党与国家 and 人民的关系

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

目 录

求实篇	
1	1976年, 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 熊 蕾
9	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 张根生 遗稿
亲历记	
11	关于三峡的一场“御前辩论” 韩 磊
15	我的右倾罪: 青海农村调查 王志敏
21	绕航黑瞎子岛 吴广权
一家言	
25	我看党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应克复
30	怎样选择突破口 辛 宇
春秋笔	
33	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阎长贵
35	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 方海兴
47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王洪起
治方杯征文	
53	1984年胡耀邦中苏边境行 张持坚
58	一项改革建议的提出和采纳 陈 力
怀人篇	
61	我要说话 ——纪念母亲郑德芳 蒋燕燕
品书斋	
66	回忆父亲胡耀邦对我的教诲 ——从一封家信谈起 胡德平
古今谈	
68	“万岁”故事 雷 颐
海外事	
73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上篇) 赵启强
编读窗	
80	读者来信 于俊沂 吴 镛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副召集人) 袁 鹰
凌 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 社 长: 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执 行 主 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奕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 010—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5.80元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

熊 蕾

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就不可能有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举动。然而，记述当年粉碎“四人帮”过程的文章有很多，对华、叶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却都语焉不详。

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是老爹熊向晖。

此外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对，没错，就是那位钢琴家。

而我和家兄，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1976年那个非常年代，我们早已走上工作岗位。老爹对我们的政治态度很放心，也知道我们嘴巴比较紧，因此好多事情不再像对我们小时候那样守口如瓶了。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

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这些人前些时候虽然也因被毛主席批评沉寂过，但是周恩来病重辞世以及邓小平反“文革”的一些言行，给了他们再次兴风作浪的机会。

这次“批邓”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

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小平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

很多人在揪着心，看张春桥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

那可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哪。果真他上来，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

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老爹们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

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省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



1977年，熊向晖（左）和聂帅

工作，1970年“文革”高潮中开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书记、“文革”后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死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总是靠冲冲杀杀来谋求并扩大他们的权力，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

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老爹们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4月。

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

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们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彻底下台，和华国锋的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批——当然有很多是认认真真做样子，基本只限于自己的机关大院之内。唯有时任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率领外交部人员到王府井游行，高呼“打到邓小平”，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就在这个时候，杨振宁要来北京。

就是那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

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杨还提出见毛主席和邓颖超，中央当时也同意了——几个月前另一位得过诺奖的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来时，毛主席曾见过他并谈了话。

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杨博士的老爹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

按照安排，4月15日，邓颖超见了杨振宁及杨母和妹妹。对那次见面，老爹有专文记载，题为《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收入其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这里不再赘述。

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老爹当晚10点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并提出陪见人员名单以及主席是否见杨的意见。

晚 10 时,老爹到了人大大会堂。但是政治局还在开会,直等到 17 日凌晨 2 时许方才开完,华国锋才能过来。老爹向他汇报了邓颖超会见杨振宁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时取消了市长的职务,市政府都为革委会取代)的徐景贤见了,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他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的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关于陪见问题,老爹说他不参加。华问为什么。老爹说,如果他参加,科学院方面势必就会让核心组的一个造反派参加,此人在科学家中的名声很不好,肯定是杨振宁不愿意见的人。老爹不陪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华于是问杨振宁跟哪些人熟?

老爹说,科学院的吴有训、张文裕,北京大学的周培源。

华说:那就是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嘛!

确定了这些科学家陪见之后,老爹参加陪见就没有障碍了。他和这些科学家也都很有感情。

参加接待的还有外交部。华问杨振宁和外交部什么人熟?老爹说,那就是乔冠华了,1971 年乔冠华去联合国时,请杨振宁吃过饭。华于是确定乔冠华也参加陪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当晚 9 时 30 分,华国锋在人大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 11 时 20 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老爹印象深刻。虽

然两人并没有做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老爹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做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叶帅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老爹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 年 5 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老爹,老爹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老爹和叶帅的交情,始于 1969 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老爹和四位老帅结下刎颈之交。

1976 年 1 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地位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 月 21 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老爹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南方,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老爹的意见。

老爹问叶帅,江青的讲话是否确实。

叶帅说,确实,就是在政治局讲的。已经有几个在场的人向他透露。

老爹又问叶帅,如果他去广西,军委怎么办?

叶帅说,军委他还可以掌握。

于是老爹说,叶帅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看,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有些记述叶帅在 1976 年的文章说,叶帅是

奉命“休息”。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从当时的宏观政治形势来说，叶帅请病假是出于无奈，但是请病假本身，确实是叶帅自己提出的。

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老爹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老爹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4月2日晚，叶帅又一次找老爹去谈话。叶帅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帅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叶帅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老爹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老爹跟叶帅讲了王震的牢骚：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老爹说，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老爹告诉叶帅，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叶帅为首了。

叶帅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老爹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这两次见面时，老爹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老爹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老爹这里来，沟通消息。

向叶帅挺华

老爹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之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老爹。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

不好。希望老爹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老爹说，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

选基说，这个话我们不好提。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我们说话没分量。

老爹答应约个时间去跟叶帅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老爹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

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老爹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

叶帅说，华国锋长期在地方工作，调到中央以后，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老爹说话，从来不是仅凭个人印象，一定要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这是1975年11月，老爹向他当年清华的同学、当时在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昌要来的一份打印件。老爹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老爹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老爹想起这个茬，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一看，果然有收获。

他把这个记录稿交给叶帅，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这段插话。

这段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开实验室。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老爹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4月17日华国锋和杨振

宁的谈话记录稿。这个记录稿是华自己改定的。

老爹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老爹给叶帅讲了两件事。

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他杀，是谋杀。当时，很多认为李是自杀的公安干部遭到整肃。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老爹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国务院会议。他发现，作为主持人的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来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老爹，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老爹的老战友。

老爹说：他病了。——罗叔叔本来心脏就不好，天安门事件后，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双双被隔离审查，更加重了罗叔叔的病情。

华问罗叔叔住在哪里。老爹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呢？老爹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大会堂外面。听了老爹



1977年，熊向晖（左）和叶帅

的话，华国锋站住，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 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就这样，罗叔叔住进了北京医院——他至今还健在。

老爹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

叶帅听了以后，颌首说，这个人含而不露。

老爹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听了老爹对华国锋的介绍，叶帅决定去见华。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九亿人民的元帅”

转眼一个月过去。传来的消息，毛主席身体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是已经不能讲话了。党内的局势，依然表面上云山雾罩，下面却暗流汹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告诉老爹,叶帅已经和华国锋见过面——具体时间他没有讲,想来是7月间的某一天。

选基说,叶帅见过华后,说老爹“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叶帅要约个时间和老爹面谈。8月15日下午,老爹得到叶帅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帅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帅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客。

叶帅对老爹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当天近夜时分,叶帅接到通知去参加这个会。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指华国锋)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老爹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

叶帅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那时候可还没有手机对讲机什么的,华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在门口等。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

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

——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行;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

——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

——当时军委还在老师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老爹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当天晚上,叶帅留老爹在他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决战临近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

中央高层领导开始治丧活动,中央各部委和各地党政军领导继天安门事件后,开始新一轮向中央的表态。而中央高层的斗争,更趋激烈。

9月10日晚，老爹听我的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表哥讲，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在学校讲话，说要准备“更尖锐的斗争”，要“五不怕”，并命令民兵随时听候调用。

老爹立即打电话给叶帅，报告这个情况。叶帅说，这是一个信号。他们要动手。

9月18日，为全国追悼日。当天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追悼毛主席的大会。

此时，叶帅连日去政治局开会，也不用销假了。9月20日，选基来找老爹，告诉他一些新的情况：一次政治局讨论治丧的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第一，开除邓小平出党；第二，华国锋批林（彪）批孔（夫子）不积极，“批邓”更不积极，领导中央不得力；第三，暂时还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当即表示，不同意江青的第一点意见；不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主席的意见，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叶帅虽然没有参加这个会，但是认为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叶帅说，主席说的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主席刚逝世就翻过来，这不行。但是叶帅赞成江青的第三点意见，就是仍然要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一说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赞成他的意见，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不表态。

选基说，这也是个信号，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测验。如果在适当时机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9月22日，选基和刘诗昆再次来找老爹谈。老爹问到叶帅究竟什么主张？他们说，叶帅要等主席治丧告一段落，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批那四个人。早在1974年，主席与总理和王洪文在长沙谈话时，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后来指示要批“四人帮”，但是小平没有批下去。

在老爹与叶帅和选基的所有谈话中，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四人帮”的提法。提到他们，都是用代号：江青是“三点水”，张春桥是“眼镜”，姚文元是“文痞”，而王洪文则没有代号。偶尔也会用“上海帮”来说他们，但多数时候还是用代号。在很多谈话中，他们也探讨过最后处理“四人帮”的办法。大体上，都是设想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他们选下去，然后把张春桥等调到外地，把江青架空，让他们没有实权。但是，具体何时操作，如何

操作，后果如何，都是很大的问号。

正如聂帅所言：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虽然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人们感到，决战已经临近。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一举除“四害”

在老爹们对决战的焦急期待中，人们度过了一个没有欢庆活动的国庆节。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许，选基给老爹打来电话，说：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老爹心里还有点疑惑，马上又给叶帅的秘书王守江打电话。他说：选基不是告诉你了吗？老爹说，他讲的四个坏蛋，是谁？王说：就是王、张、江、姚。老爹说，不要叫他们跑了。王说：跑不了啦！叶帅现在到玉泉山了，忙得很，可能过几天才能见你。

虽然还不知道是否大局已定，但是我们全家都兴奋得不行，好像长久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被搬去了，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10月7日，有驻京部队机关总部开始传达“四人帮”被逮捕的事情。尽管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还没有正式传达，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迅即在北京不胫而走。

10月8日下午，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打电话给老爹，说邓大姐看了蔡大姐，似乎有什么重大新闻，究竟怎么啦，大姐让问你。老爹说，大姐还不知道吗？“四人帮”被逮捕审查了。赵炜告诉了邓颖超，又跟老爹说：大姐说，是除了“四害”。老爹说，对，“除四害”，妙极了！

10月11日，选基打电话让老爹去王震家里。在那里，他和刘诗昆讲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

选基说，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来访问叶帅。从周总理去世后，叶帅一直期待着李先念的造访。老爹每次去叶帅那里，叶帅都提到，李先念还没有来，同时，也对李的处境表示理解。

终于见到李先念来访，叶帅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李先念说，是东风。

叶帅问：哪股东风啊？

李答：华总理。

叶帅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没有人叫你来，你不会来的。让你来，什么事呀？

李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

叶帅听了，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

选基说，这之后，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阎长贵按：汪不止一次讲，他们三个人也没一起开过会，都是单线联系——一个逢年过节去看汪的人），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到，都被抓起来。当晚，汪东兴又带着部队去江青处把她也抓了起来。阎长贵按：汪未去，是张耀祠去的——一个问过汪和张的人）。

选基说，叶帅认为，现在“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已经关起来了，目前的方针是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对各地已经打了招呼。叶帅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领袖。

党内和社会舆论对这次除“四害”之举，高度一致：果断、干净、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诗的劈头一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叶帅的希望

大局初定之后，10月31日，叶帅把老爹找

去，做了一次长谈。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谁帮啊？首先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他没有挑别人啊，就挑了他嘛！毛主席说他有工作经验，忠厚，不蠢。“不蠢”这两个字很妙啊！大智若愚啊。稳重。第二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第三是基层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受到全体人民的欢迎。

在这“三个帮”中，叶帅认为，关键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承上启下。

老爹和当时很多老家伙一样，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他跟叶帅讲了大家这份心情。

叶帅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另外，叶帅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叶帅说，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七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

不过叶帅还是说，小平晚一点出来，总要出来的。他说，你看（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

张根生遗稿

1999年3月9日上午10时20分—11时50分

地点：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华国锋家中

问：从上次（1997年11月）见面至今已有二年多没有见面了，再来看你，身体怎么样？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书，专门写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有的是有事实根据；有的是互相传抄；有的则是胡编乱造、歪曲事实、添油加醋，弄的真假难辨、混淆听闻。特来看看你，并澄清一些重要事实，以正听闻。我并从书店买了两三本书送给你看看，就可看出这方面情况。去冬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以来，有些书讲的比较符合实际了，例如于光远写的这本专讲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经过，是从实际出发的，特送你一本看看。当然，他对你也有批评，但基本上是肯定的。

华国锋（以下简称华）：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天天打针吧，高血压好了，但心脏有些问题，有时心绞痛，所以不能多外出了。毛主席1976年因病逝世，我们全党都很悲痛，但是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在这一时期他们更疯狂地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这一年周总理去世了，朱总司令去世了，邓小平又被打倒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拉又打。我心中很明确，绝对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

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两人。而且在七六年（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他（指叶帅——编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上述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1970年林彪搞的第一号命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广东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专门叫我去参加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师，在部队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9月10日，先找先念同志交谈当前形势、四人帮动向，认为与他们的斗争要早日解决，这是没法避免的，早比晚好。请他去看看叶帅交换交换看法。9月13日，先念去参观植物园，顺便去西山看叶帅，开始叶帅对李来的意图搞不清楚，也不敢多说。二人互相问候后，便说到院中走走，看看园林。边走边说，回到屋中交谈，主要谈了四人帮的情况、看法，没深谈有的出版物上竟说叶帅在10日曾到华国锋处商谈粉碎四人帮问题，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已）。

华：四人帮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乔冠华要在联合国大会上（9月2日）发言，稿子上也有这句话。我在审查稿子时，改为“照过去方针办”的原话了。张春桥不让向下传达，怕引起震动。实际是怕暴露他们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阴谋。

这以后我亲自和叶帅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我与汪东兴几次研究，叫他做准备，挑选可靠人员。我也和吴德、吴忠（卫戍区司令员）谈过，叫他们防备迟群、谢静宜利用学生闹事。叶帅和聂帅、王震、杨成武等部队同志，也有酝酿准备。

后来发现张春桥的弟弟张××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到坦克六师进行活动，促使我们早下决心，在10月6日，通知晚8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定稿问题，通知姚文元也参加。坐在怀仁堂内会议

室中的只有我和叶帅，汪东兴具体指挥行动。抓住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时，是我亲自分别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隔离审查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

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处抓起来的。同时抓了毛远新，北京卫戍区抓了迟群、谢静宜。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叫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且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宣传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的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绝不可采取的办法。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青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后来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

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怎么确定的？

华：1977年11月10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根据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发展状况提出的。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更明确地宣布“把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时，是认为揭批四人帮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应该结束了。还有工农生产和整个经济建设急需加强，人民生活必须改善，吃饭问题要早日解决。所以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工作重心的转移。

问：建立特区是怎么决定的？

华：当时，先是中央几位同志商定，派一个由谷牧为团长，七八个部长参加的去西欧几个国家考察的“国务院经济考察团”。大概是1978年6月底。考察回来向中央汇报时提出，有的国家建立加工区，把周围封闭起来，吸引外商投资办工厂，不收税，产品直接出口，可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大家听完汇报后，就议论

办加工区的事。赵紫阳、谷牧、登奎等都赞成。就确定由谷牧进一步研究考虑此事。此后征求广东、福建省委意见。习仲勋、项南都很积极。由谷牧牵头酝酿提出建立特区，经政治局讨论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四个特区。

这事以后，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主动提出要求把大连建成特区。日本专家大赖也提出要对外开放、大连搞特区的建议。我叫谷牧去沈阳与仲夷商量，并到大连看看。都同意了，正准备提交中央讨论决定。这时胡乔木从深圳回来说，深圳什么都变白色了，只有国旗还是红色的，因而只好暂时缓办。

问：洋跃进是怎么回事？

华：1978年9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报告，决定再追加48亿元基建投资，到年底共完成投资39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在出国考察团汇报后，整个精神是搞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引进技术设备，石油部提出再建十来个大庆，电力部、煤炭部提高了指标，加快了引进国外设备。当时是新建上海宝钢参照日本鹿儿岛建钢铁厂的做法，可以进口澳大利亚的富铁矿，因为鞍钢等铁矿多是贫矿。

再是新建江苏仪征大化纤厂。只8000万亩棉花不能解决全国穿衣问题。

现在这两个企业都建起来了，还是成功的，还有一些进口较大的项目，自动化采煤机组、电力设备、大化肥厂设备，就是余秋里负责引进的那一批设备项目，现在看大部分是好的。12套大化肥还是周总理生前定的。当然也有不成功项目，主要原因是考察、论证不够，有盲目性。

1976年7月计划座谈会上四人帮猖狂进攻，目标是想攻击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和我。是王洪文、张春桥幕后指挥，黄涛为主要活动者，觉得光批“条条专政”不能解决问题，直接提出国务院务虚会、计划会有问题。

问：许多问题你是比较清楚的，为什么不写写以澄清原来的情况？

华：我这里还有原来的报告、简报、文件，是要弄清楚。看时机吧。

北京对出版控制很严，李先念文集的序言中，写了我和他谈话找叶帅的事，人民日报还不让写，要改为小注才发表。

（作者系吉林省前省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关于三峡的一场“御前辩论”

韩磊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历经 12 年的建设，将于 2008 年全面完工。但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天字一号“热门话题”，“三峡热”不会因三峡工程的完工而转冷，仍将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持续热下去。

《炎黄春秋》2008 年第 8 期登载了《毛泽东和林一山谈三峡水库》一文，对上世纪 50 年代的“三峡热”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但对当年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南宁会议却叙述得较为简单。本文想将那次会议关于三峡工程的一场“御前辩论”，做一扼要介绍。

中国历来视治水为大事，有“治水如治国”之说。上世纪 50 年代，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关心洪水的问题。毛泽东当年的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反映了这一史实。

1953 年 2 月，毛泽东视察长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他汇报了修建三峡工程的设想。当听说即使修一大批梯级水库拦洪蓄水，也还是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毕其功于一役”时，毛泽东也想快点上马。

1954 年，长江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武汉被围困四五十天之久。洪水过后，林一山再次向中央提出要尽快修建三峡工程，他的出发点是要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1954 年长江洪水堤防防不住的水量大约有 1000 亿立方米。林一山就想让三峡这个水库把这 1000 亿立方米水装起来。

1956 年，“三峡主上派”在毛泽东面前再次力促三峡工程上马，这一次老人家真的动了心。这年夏天，63 岁的毛泽东在饮了长沙水、食了武昌鱼之后，又在武汉畅游长江。富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磅礴诗篇，高峡平湖似乎立马可

就。

同年 9 月 1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便醒目地刊出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查勘工作结束”的特字号标题新闻，副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

当时的神州大地，到处热气腾腾，蒸腾着冲天的干劲。但此时，也有很多人对三峡工程的上马却持怀疑乃至反对的态度。李锐，就是这为数众多的对三峡工程上马有不同意见的人中的一位。

中国有句古话叫“既生瑜，何生亮？”本来，中国有一个积极主张上三峡工程的林一山就够了，可偏偏又有一个与之叫板且“顽固不化”的李锐。

水利水电专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潘家铮在其所写《我所知道的李锐》一文中说：谈到三峡工程，不能不提到李锐同志，他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反三峡派的骨干和统帅，没有他，三峡之争绝难如此“波澜壮阔”。此言不虚！

关于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的公开争论，最早发生在 1956 年夏。当时，林一山在水利部主办的该年第五、六期《中国水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约两万字的长文，主张要尽快修三峡。认为只有三峡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其中谈到发电只有 500 字。李锐至今仍认为，林一山那时候提的方案是很荒唐的。他所设想的水库蓄水高度是多少呢？是 235 米，比现在即将建成的三峡水库的蓄水高程 175 米高出 60 米！李锐告诉笔者，蓄水 235 米会是什么结果呢？重庆要淹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大半个重庆城要被淹掉。另外还要迁移人口 200 多万，将淹没四川沿江十几个城市。为什么非要 235 米呢？林一山认为这样就可以有 1100 亿立方米以上的防洪库容，就可以把长江 1954 年堤防挡

不住的洪水全部装起来。

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水电系统许多技术干部都看到了，认为这样的方案太离谱了。当时李锐主政的水电建设总局也有一个技术性刊物《水力发电》，李锐就组织了一批老水电专家写文章批驳林文。9月份出了一期“长江规划专号”，全面地论述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经济、淹没损失和地质等种种技术上的问题，共有10来篇文章，其中包括李锐亲自撰写的一篇字数也达两万多字的长文章。

这些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不能为了免除武汉多少年一遇的洪水威胁而牺牲重庆等十来个城市，认为这是以邻为壑。防洪应该采取综合规划原则，要注意加强堤防、湖泊洼地蓄洪排涝、支流水库和干流水库4个方面的协调发展，而堤防的作用自古相沿，中外如此，尤为重要。文章还认为，我们只能根据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条件，逐步提高防洪标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地去解决最高标准的长江防洪问题。至于要求在当年建成三峡这样大的水电站，同国民经济包括电力的发展更是远远不相适应，并且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未经历过的技术问题。因此，这一组文章认为，防洪有其他可靠办法，当时三峡决不能上！当然，这种发行量较小的学术刊物，影响有限，毛泽东无缘过目。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几个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称的“南宁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批判“反冒进”。这是毛泽东为在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进行思想理论准备和具体部署的一次会议。会议后期，毛泽东提出修建三峡工程。薄一波反映说，此事有反对派，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同林一山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毛泽东说，那就把两个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于是，就有了随后发生的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一场精彩的“御前辩论”。

笔者曾先后就此事采访过李锐和林一山，两人对事情的叙述稍有出入，评价也不尽相同，但主要史实大致是一致的。

1958年1月17日，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讨论“三门峡”问

题。还说专机在武汉停留，接林一山一起去。李锐知道电报多了一个“门”字，其实是要讨论三峡。

关于三峡问题，李锐成竹在胸；为了借此机会呼吁优先发展水电，他请专家画了一张中国水电开发示意图，做宣传之用。

李锐回忆说，飞机18日上午在武昌机场着陆时，林一山已经在等着，他的秘书提着一口沉甸甸的大皮箱；而李锐是“单刀赴会”，只带了这张图纸。李锐同林一山不算很熟，1948年在沈阳东北局开会时见过面；1952年参观荆江分洪工程时，他也领教过林一山的口才。然而，此次见面，两人只打了个招呼，在飞机上也没有交谈。

载着一对“冤家”的专机，当天中午到达南宁。李锐刚刚住进宾馆，他的好朋友、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就找上门来，急切地向李锐介绍会议形势：主席大批“反冒进”，认为“反冒进”给当时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泼了冷水，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并点名批评周恩来、陈云，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睡不着觉。田家英对李锐表示严重的担心，说自己和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都为李锐捏了一把汗！

18日晚饭后，李锐和林一山“两个冤家”参加了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李、林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对面左右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代林铁）、史向生（代吴芝圃）、陶铸、王任重、杨尚昆、周小舟、刘建勋等；中央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等；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大家都坐定后，毛泽东问林一山：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答：要两个小时。

毛泽东又问李锐，李锐说只要半个小时，并请林一山先讲。

林一山曾就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识丰富，口才出众，在水利系统很有名气。

林一山长篇大论，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两千多年间，长江洪水为害，平均10年一次。辛亥革命以来的40年中，平均5年一次，可见长江洪灾愈演愈烈。1931年水灾，死14.5万人；1935年大水，死14.2万人；1949年大水，死5700人；1954年特大洪水，虽采取紧急分洪等措施，保住了武汉和荆

江大堤安全，仍淹死了4900人……

林一山强调：长江洪水主要来自宜昌三峡以上，至少占汛期干流水量的50%以上。因此，三峡枢纽对长江防洪有决定性意义。林一山认定：只有三峡才能控制川江洪水，解除荆江大堤的严重威胁和洞庭湖区的洪灾。倘若荆江大堤决口，将直接威胁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于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林一山这时改变

了235米方案，提出“210—200方案”；关于装机容量，认为至少可达1340万千瓦，年发电量1000亿度以上；关于工程技术，林一山称：已选好几个比较坝段，有三个方案；施工难度和强度同国外类似工程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关于投资，林一山估算约为72亿元；关于水库移民，林一山没有谈及。

李锐发言，首先强调长江不同于黄河，自古以来是条好河，轮船从上海可直达宜宾，是世界大河中数得出的黄金水道，最好的通航河流；泥沙远不如黄河严重；水量为黄河的20倍，洪水量为50倍；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黄河为200多倍，长江只25倍。

李锐认为：三峡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的50%，即只能管住西水（川水），而对南水（湖南四水及赣江等）和北水（汉江）都无能为力。

李锐强调防洪的堤防作用，他说：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无论有无三峡工程，必须搞好堤防。1870年所谓长江干流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主要是川江洪水，四川灾情极重；洪水过三峡后，向南冲开松滋口（南岸四口最上位），并未冲破荆江大堤。因此，说什么荆江决口要死上百万人，是一种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辞。他感慨发问：难道我们的能耐还不如蒋介石时期？



1958年3月，李锐（左一）随同周恩来总理（左三）、李富春副总理（左二）乘江峡轮考察长江三峡

李锐特别强调移民问题：如按坝高200米方案修建三峡水库，估计移民至少在100多万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

李锐特别谈到三峡主要是一个发电站：1957年全国用电的总需求只有190亿度，而三峡一个大电站就要发电1000亿度以上，即使按当时预测的15年后全国用电量达到2000亿度，这个电站的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也太大，并将严重影响电网的运行，因为一个电站的发电量在一个电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来说是不应该超过20%的，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总有好几个电网。讲到这里，李锐打了一个比方：在一座城市里，总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吧，尤其大城市，需要多少个商店啊！中国什么时候需要三峡这样一个大电站，我说不清楚。这个比方使得毛泽东和与会人员频频点头。

李锐接着谈到，国防也是问题，同世界形势有关系。此话大概言中了毛泽东的心事，他插话道：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注意，决不能遭敌人破坏。

李锐最后说：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很复杂，根据自己搞水电建设的经验，弄清三峡的地质情况就需要多年时间。多级船闸、电站装机容量（至少60万千瓦一台）以及施工等问题，都是超世界水平的。

据与会人员讲，这一场由毛泽东导演的精彩的“御前辩论”，口才颇佳的林一山似乎发挥得不够好：从内容看，讲理想多，而分析理想与可能之间的关系很笼统，时常离题较远，听来显得驳杂，缺乏系统；从技巧方面看，他引用了许多外行不易明白的数据，“行话”、“术语”过多。

而学识和口才一点不逊于林一山的李锐的发言，显然引起了与会者情绪上的呼应。特别是他带到会场铺在桌子上的一张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令人一目了然，引起了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毛泽东当时就说了话：中国应当优先发展水电。因此李锐发言结束时，几个小时前还为他“捏一把汗”的人们，神态都宽松了下来。

两人都讲完之后，毛泽东没有当即评判，却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俩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

1月21日晚上，仍在原处开会。与会者已将印发的两篇文章看过了。毛泽东先讲，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特别赞赏李锐文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批评林一山的文章“文理不通、大而无当”。其实，实事求是地讲，林文作为一份长江流域远景规划的概要，虽有不足，但也是很有见地和价值的。对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自己的赞扬，李锐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自己在这场三峡之争中所以取胜，主要是因为对水电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因此应当受到称赞的是符合实际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经济观点，而不是词章。毛泽东呢，“但说文章好，未言经济长（李锐诗《三峡》三首之三）”。

当天晚上的会议只开了不到半个小时，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明确宣布：中央并没有要修建三峡的决定。还说他对三峡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

说着，毛泽东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同时宣布：李锐当我的秘书。李锐当即回答说，这个恐怕不行，水电业务太忙了。毛接着说：兼职的嘛。

毛泽东还很风趣地对林一山说：谁要是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会后，薄一波和胡乔木还狠狠批评了林一山：以后不要向中央乱建议！

南宁会议以三峡议题结束。会后，毛泽东将三峡问题交给周恩来负责，并嘱咐，一年抓4次。50年代这桩三峡“公案”至此告一段落。

就这样，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声中中央做出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决议，是当年唯一的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的正式决议，是在南宁会议两个月后那个掀起中国全面“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做出的。李锐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了这个决议的起草。毛泽东在这份决议的草稿上做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八字批示。因此它成了成都会议上通过的39个“跃进”决议中，唯一没有给那场即将爆发的国民经济重大灾难火上浇油的决议。

1958年底，长江水利委员会曾提出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建议三峡工程1961年开工，1965至1966年发电，1967年完工。但中央未予考虑。此后，不管水利部和林一山怎样催促三峡工程上马，毛、周始终没有点头。

三峡工程现已基本建成，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负责人、三峡工程验收专家组组长、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潘家铮，在回答“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的记者提问时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和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的人贡献最大。”此话应该是一句实话。潘家铮2007年9月27日在致李锐的信中，虽然对李锐“在二十一世纪反三峡”有不同看法，但他却承认：李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上三峡有功，且其功至伟”。

时至今日，发生在广西南宁的那场关于三峡上马与否的“御前辩论”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亲历其事者只剩下了李锐一人。当世界科技水平已有了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的发展，当国内外修建巨型水利水电工程已有了丰富经验和惨痛教训，当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已大大深化从而发现三峡这一超巨型工程原来竟还有那么多难题没能解决，而且至今解决起来依然让人头痛的时候，许多人感叹：如果1950年代三峡工程就上马的话，对于中国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值得万分庆幸的是，中国阻止了那一场灾难。

（作者系《水利水电工程报》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

王志敏

1959年7月，由庐山会议发起的反右倾运动，已经过去49年了。这场运动大大加剧了由大跃进引起的全国性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也是继“反右派”之后，把阶级斗争由党外引入党内，进而导致文革历史悲剧的重要转折点。我当年由于工作的关系，也被卷入这一运动，成为“因言获罪”者之一，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由纠“左”陡然变为反右

1959年2月底到3月初，中央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当时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因病不能出席，改由省委常委书记张国声参加，我作为秘书随同前往。会议是逐步扩大的，我们与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同机到达。会上，从毛泽东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对纠“左”是非常坚决的，强调我们党同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必须从解决所有制和分配政策上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为此甚至说，他要代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

从郑州返回青海后，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传达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具体贯彻措施。因春耕在即，决定先抓东部农业区的几个县。我随同张国声到青海产粮大县——互助土族自治县，从调查研究入手，会同县委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解决大跃进中的“共产风”问题。

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的头脑都很热，整天喊的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后来者居上”（青海属后进地区，要在短时间内超过先进地区），文章、讲话都少不了这些语言。那时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很不了解。此次下去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几

乎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存在高估产、高征购问题，农民口粮十分紧张，食堂已维持不下去。有的生产队连春播的种子都吃掉了，牲口更是饲料不足，地里看到的净是人拉犁。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到农民家里看见那些脸上蜡黄发亮坐在炕上低头不语的老人，实在惨不忍睹。在此期间，毛泽东不断以《党内通信》的形式严厉督促各地认真纠正“共产风”，坚决对平调财物实行退赔，不要“善财难舍”。这更让我们感到心急如焚。我们在互助县把各个公社基本上都走了一遍，传达了中央精神，初步安顿了群众的生活、生产。之后，由于省委一把手有病，急需张国声回去主持日常工作，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就农村政策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我在省计委、省统计局干部的协助下，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两项调查，一个是《关于农村征购粮任务过重的调查报告》，另一个是《关于农村经济死滞的调查报告》。

青海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跃进不仅造成农村问题突出，牧区问题更加严重。在牧区由于实行“一步登天”（直接由农奴制进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实行“高指标”、“瞎指挥”，大量毁草原开农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叛乱，而在平息叛乱中又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从而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在此情况下，青海的纠“左”任务更加繁重，若不及时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张国声几乎逢会必讲纠“左”。他是个急性子，尽管有时言辞重些，但确是为了扭转危难的局面。

不料，中央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却由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因而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陡然变为反右。而在青海则更是亦步亦趋，使反右倾

运动大大加码。

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从庐山开会回来，在简要传达会议情况之后，就说道，青海的右倾风刮得也不小。他不仅认为前一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方向有问题，甚至连在庐山会议前期张给省委打电话，要求按照“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的精神，召开厅局级干部座谈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也被认为有否定成绩，向党进攻之嫌。于是，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会议刚开完，张国声就告诉我，要按照庐山会议文件好好对照一下这个时期他的讲话、报告，看有什么问题，准备一个检查提纲。

哪里想到，还没来得及准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就开始了对他的批判斗争，而且火力非常猛烈。一上会就给他定了调子，说他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地利用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大刮右倾翻案风，反对中央、反对省委、反对三面红旗。接着就召开三干会（省、州、县三级干部会），并由三干会扩大为“万人大会”，用高音喇叭在全省范围内“消他的毒”。第一书记讲话说，“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张国声就是彭德怀在青海的代理人”，“必须批倒批臭”。当时差一点把张搞成彭德怀死党，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未查出什么历史问题，也未查出在一野期间与彭德怀有什么特殊关系，最后才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了事。

回忆这段历史，让我想起了所谓“第一书记制度”问题。记得在反右派之后，省委第一书记从中央开会回来向常委会传达时，曾几次提到，毛主席说：我们党实行的是第一书记制度，你们是各省的第一书记，我是中央的第一书记，第一书记要挂帅。我当时还以为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后来才渐渐明白，正是由于这个从上到下的“第一书记制度”，使本来象征集体领导的职务名称变成了“一把手专政”，使一把手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其他人只能顺从，否则就被认为是对其个人权力的挑战，被怀疑有“篡党夺权”的野心。青海省1957年把当时的省长孙作宾打成右派，接任的省长袁任远又在1959年几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按袁本人的说法，只因“投鼠忌器”而幸免于难，结果只搞了一个张国声和一名主管财贸

的副省长张毅忱。这几个人被整都是由于对一把手有不同意见导致的。这就是由“第一书记制度”造成的恶果。当然，更大的恶果还是人民的不幸。由于大跃进中的浮夸和瞎指挥，使青海这个人口小省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结果“物极必反”，两年后青海省委的一把手也因此而被免职。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不受约束的个人绝对权力，既给别人带来灾难，最终也将危害自己。

因农村调查而受批判

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扩大，在揭发张国声的同时，各部门陆续揪出一些所谓张国声反党集团成员，有省委宣传部部长聂景德、省委工交部部长李兴旺、省委副秘书长王静先、省统计局局长解伯淳、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还有省计委、省经委的有关负责人。这些人多半都是由于对青海的浮夸风有所抵制。

此时，已是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但省委第一书记还一再强调“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他说，“我们反孙作宾，就是只削了个蔓菁头，这次一定搞彻底。”听了这些话，我自知“在劫难逃”。这时省委已决定我调省委统战部，拟接替一中层干部。我想，既然“在劫难逃”，与其被人揪回办公厅，不如“自投罗网”，也许处理还能从宽一些。因此，我主动向统战部长（省委常委）冀春光提出回办公厅接受教育。他表示同意，并且说省委一些人认为我的思想一贯比较右，应当借这个机会好好清理一下。

回到办公厅，一上会主持人就说，让你检查并非由于你是领导的秘书，而是有你自己的问题。接着就让我交代为什么在互助县贯彻落实郑州会议精神，还要搞“关于征购粮任务过重的调查”和“关于农村经济死滞的调查”？是不是为了向党进攻，为了否定“三面红旗”？面对这些问题，我详细交代了调查的起因和经过：

中央郑州会议以后，我们在互助县张进仁（土族）县长陪同下，有一天到了1955年合作化时我担任工作组组长的广化乡所在地。先去原该乡的纳家生产大队，见了支书苏成福（土族），他泪流满面向我们讲述了由于去年（1958年）粮食产量报得太高，征购粮任务过重，使乡亲们饿肚

子。又见了几个过去熟悉的农民，都说食堂吃不饱，日子太苦了。随后，我们夜宿公社，我与张县长同屋。躺下后，他问我：“你听外边有什么声音？”我说，“一片寂静，什么也听不见。”他说，“是的，现在农村是‘鸡不叫、狗不咬、娃不哭’，哪里来的声音？”人都没吃的，哪有粮食养鸡、养狗？妇女哪能生娃？”去年让群众上北山大炼钢铁，粮食没收上来，产量还报得高，再加上吃食堂浪费大，现在缺粮严重。公社化后，农民除了每天到食堂打点稀糊糊，手里一没粮食，二没副业收入，把人都困死了。我在县委会议上说过这些意见，但吴书记（吴正夫，长征干部）不听。我是个少数民族干部，说多了不好。这些问题只有你们省上来的人帮助解决。这不是一个公社的问题，是全县的问题。我们可得给老百姓一条活路呀！”我听了他这些话久久不能入睡。开始产生搞调查的念头。我也知道当时做这种调查会有风险，但不搞，又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于是第二天，向顶头上司建议省计委、省统计局来两名专业干部，一起就农村粮食征购问题和农民副业与集市贸易问题作调查。他同意后，我们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完成了这两项调查。

我在会上谈了这个过程之后，纷纷质问我为什么不调查大跃进的成绩，专找问题？要我首先端正对反右倾的态度，从思想深处检查动机和目的，检查自己的立场。开始，我强调这些问题是当前农村实际存在的问题，而且数据都是经过核实的，是实事求是的，决不是为了给党抹黑，为了反对大跃进。但人家说我是用“实事求是”掩盖自己一贯的右倾思想，说我是抽象承认、具体否认右倾，大帽子底下“开小差”。要求我好好用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他批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刘澜涛的助手们汇编的有关马恩列斯论对待群众运动的语录）来检查自己的思想、立场、观点。经过多次反复的批判，我终于怀疑自己的立场是否真有问题？不然为什么我总是看农村的问题多？于是，我开始“投降”，用马列毛语录“对号入座”，承认自己右倾。之后，尽管我作了多次自我批判检查，但上了会，人家还是说你不深刻。于是我挖空心思地每晚回来写检查，力求深刻一些。

我当时之所以那样“痴迷”地检查自己，主要

是有过关思想，因而在严厉的批判压力下失去了自我。在紧张的批判停顿几天后，省委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也是批判会的主持人，突然找我谈话，开门见山对我说：“你的问题原打算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看矛盾性质变了，你要好好考虑在互助县调查期间都找了哪些人，他们向你反映了什么问题？然后在会上老老实实交代清楚，争取从宽处理，否则后果自负。”还要求我把笔记本统统交上来。

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妙，一定是与我在互助县调查时和原青海日报在那里下放的两个“右派分子”雷廷梓、王立道见过面，并向他们了解农村情况有关，而这一情况我在检查时并未谈到过。因此，回到办公室一边整理笔记本，一边向妻子讲了人家跟我谈话的情况。并告诉她，还有前两天雷、王寄来的材料在抽屉内。她说笔记本不交不行，但寄来的材料无论如何不能交，交了，你和他们都不得了。开始我有些犹豫，后来觉得还是要烧掉，否则万一搜出来，的确不得了。于是，她帮我在里间卧室很快销毁。

第二天上会，会场上气氛大变，主持人刚发话，发言者争先恐后，纷纷质问我：“为什么专找右派调查农村的阴暗面？”前几天说你调查是为了向党进攻，你还不承认；不是为了向党进攻，为什么找右派调查？”既然你心里没鬼，为什么不早作交代？”……

面对这一连串的质问，我只好如实交代找这两个“右派分子”调查农村问题的原因和经过：

在我们到达我在农业合作化时工作过的互助县广化乡时，公社干部对我说，这里还有两名下放的右派记者，并说了名字。于是我主动提出要见他们，并说过去认识他俩。为什么要向他们调查？是因为当时有些农村干部不敢讲真话，而他们是下放劳动改造的，对农村情况会有一定了解，也许他们能提供一些真实情况。实际上，他们向我提供的情况也并没有夸大不实之处。但批判者根本不顾事实，咬定我与右派沆瀣一气。

这时我最害怕的是，问他们俩给我提供过什么材料没有。好在未涉及。

接着就问我反右派的看法。我不由得脱口而说：我认为我们定的有些右派分子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是对我们领导工作有意见，对

领导作风有意见。又问我：你指哪些人？我说：咱们办公厅李咨就是这样的。这时有人说：怪不得批李咨你不说话，那时就看你态度不对头（李曾是第一书记秘书，1957年因对领导作风和特权问题提出过意见而被定为右派，当时省委秘书长杨西林曾向我的顶头上司告状，说我对反右派态度有问题）。

又问我对镇反、肃反的看法。我说：我认为镇反、肃反有扩大化问题。有些本已无现行活动，而仅仅是历史问题，我们也硬是镇压了，有的案子一牵连就是一大串人。前几年复查中曾遇到这类情况。

又问我对农业合作化的看法。我说：农业合作化中有过急的情况。1955年，当时我在工作团负责互助县一个乡的合作化，我们还正在搞规划，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县委就宣布全县实现了合作化。又问我：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我说，搞得过快，当然也就有早了、糟了的问题。

我这一谈，会场上几乎沸腾起来了，都说我不仅在一个问题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在一系列问题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彻头彻尾的漏网右派。主持人最后也是下的这个结论，并说要对我新账老账一起算。

不久传来消息：互助县的土族县长张进仁因积极配合我们搞所谓“反党”活动，而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又有消息说：原来向我反映情况的青海日报在互助县下放改造的两名右派分子，其中的一名雷廷梓被判了刑，另一名已“摘帽”的王立道重新戴上帽子下放改造。这使我大为吃惊。后来得知给雷判刑的原因是，他曾经将寄给我的农村问题的材料又抄寄当时《青海日报》总编辑乔迁一份，企望在宣传报道上加以注意。不料乔将该材料上交给省委第一书记，随即作为“反面教材”印发省三千会，雷本人也从此由右派变为囚犯。

这就是那个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两个因为帮助党整风提了点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人，下放期间，凭着自己的良心反映一些农民的疾苦，这本是进步的表现，却被视为反党，由此重新戴上帽子，甚至判七年之久的重刑。当我

1979年再次和雷廷梓见面时，他与二十年前判若两人，面目清癯，老的多了。他告诉我在狱中时，妻子是靠拉架子车度日的。多年来，每当想到这一幕都让我异常难过，深感内疚。因为他们的“祸”来源于我的调查。而他们却说不怪我。

艰难的下放生活

自从最后一次批判会开完，我就在家等待处理。大约将近年底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俊贤要找我谈话（当时他是省委反右倾办公室负责人）。他说，省委研究了办公厅对我的处理意见，认为我的问题是严重的，但考虑到我当时所处的位置，决定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只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劳动，行政上原定到统战部的任命就不再宣布了，等于免于行政处分。

他的这些话，使我非常感激。我原以为，按原来办公厅定的调子，至少要开除党籍，说不定还要送去劳教。现在给的这个处分实在出乎意料，下去后一定好好改造自己，争取早点回来。当时最担心的是“有去无回”，这个想法一直支配我整个下放过程。

在经过短暂的准备之后，我就踏上了下放劳动的路程。此时虽然严冬即将过去，但青海的天气依然寒冷，大地一片萧瑟。我坐在卡车上，迎面来的寒风如刀割。当汽车行至青海南部产粮大县——化隆时，看到路边有三三两两讨饭的行人，而田间却空无一人，往年那春前备耕的忙碌景象一概不见了。约中午时分，汽车停下来，我们走进路边的一个饭铺，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在桌子下面爬着拣饭粒的乞讨者。这让我顿时感到，不到半年的反右倾，农村竟变成这种光景。但我并未把碗里的饭分给桌子下面的农民一点。我当时麻木了，也许是由于自己饥饿，也许是由于怕别人看见。事后想，无论如何这件事都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每当想起这一幕，我都后悔不已，都要问自己：你的同情心哪里去了？

傍晚汽车到达下放目的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晚饭后，我过去的一位同事（当时任州上的局长）来看我，他似乎对我并无戒意，约我次日早饭后同他一起去看青海南部的著名寺庙——同仁隆务寺。我答应了。当我们走进

这个寺庙群时，一片空空如也，一个僧人也不见。寺院内的壁画——属藏族著名的热贡画派，被破坏得一片狼藉。我的同事告诉我，平叛前的喇嘛寺香火鼎盛，而今一去不复返。

这天下午，经中共同仁县委组织部联系，由我下放的同仁县城关公社苏乎瑞（藏语名称）生产队派人把我接走。

这是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藏族聚居村庄，属牧区中的小块农业区。生产队将我安排在一户藏族老太太家，家中只有她和一个十多岁的孙子。我怀疑她家是否有平叛中被镇压者，因她们祖孙见我都从无笑容，尽管我竭力帮助她们干些扫院子、提水等杂活，但从不说我一句话。至于为什么安排在这一家，可能是因为住房宽敞一些。而村内其他藏人，见面也都低头不语，解放初期下牧区藏人那种热情好客的表现，再也见不到了。我当时把它归因于生活困难和平叛过激，但从未敢跟懂汉话的藏人交谈过这事。

下放的生活开始了。比起纯农业区来，这里的生活要算稍好些，但吃粮标准每人每天也只有半斤粮，后来一度下降到四两，实际上，七折八扣，真正吃到嘴里的还没有那么多，油水则根本谈不上。我每天拿着下来前为自己准备的特大号搪瓷缸子，与社员一起到生产队食堂的大锅前排队打稀糊糊，它是用少量的粮食和蚕豆秆子、青稞秆子等磨成的代食品做的。开始，生产队食堂的大马勺给我盛上半缸子就够喝了，以后一顿喝一大马勺（每人只给一勺），肚子坠的走不动，但还觉得不饱，心里空荡荡的。我每天和藏人一起蹲在墙角喝糊糊，喝完了先休息一会，然后再回到住处，等待上工干活。在地里拔草的活本不重，但也觉得很费力气。由于吃代食品大便困难，我每次都要蹲很长时间，故大便时尽量跑到村外去，免得占用房东的厕所。

夏天到了，生产队的几棵杏树杏子熟了，队长发布命令：社员可以在下边帮助队上拣杏子，同时可以就地吃，但不能带回。我也加入其中。心想这回可以饱餐一顿，边拣边吃，因为太饿了，我也不知吃了多少，大概有好几十个，回到住处就受不了啦，躺在炕上难过地来回打滚，吐也吐不出，拉也拉不下。心想，这回可要“杏（李）子树下埋死人”了，我非把命送到这里不可了。过一会，

房东老太太给我端了刚熬的半茶缸浓砖茶水，让我喝下去。果然滞胀消解，这缸子浓茶把我的命救了。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刻。但我事后并未报答这位老太太。这是个遗憾。

困难时期领导人的一大发明是用代食品填肚子，叫做“瓜菜代”。本来秋天到了，应当让老百姓吃几顿饱饭，但公社书记却下来布置，要大找代食品。于是，我跟上一些较年轻的藏人到十几里外的山上采摘一种叫“染布籽”的代食品，这是一种颗粒大一点的草籽。大约去了十几天，因受凉拉肚子不止，回来后躺在炕上思忖着：是否我的劫难又到了？好在队长还算照顾我，病稍好后让我去看场；也许因为农民吃不饱，偷粮厉害，让我看场，比较放心。

时间已进入冬季，食堂的糊糊还是那么稀，浮肿病人越来越多。有多少人因饥饿死亡，我不得而知。我不懂藏话，又是“戴帽子”的人，不便打问，但从食堂打“病号饭”的人不断增加是可以看出些问题的。这个“病号饭”是由食堂里面另一个小一点的锅做的，无非糊糊中的粮食比例大一点而已。而我自己，此时更觉得浑身无力，上一个高坡，每走一步都觉得脚底下有吸引力似的，要一步一步地拔着向前走。当时还以为是由于这里海拔高的关系，后来才听别人说是严重缺乏营养的表现。在下放的后期，我靠着妻子托人带来的“馍干”和食堂的糊糊勉强地维持生命。妻子晒的“馍干”，是从她每月十八斤口粮中抠出来的。

正在这时，州里我过去的同事来看我，并告诉我：西北局来青海检查浮夸和饿死人的问题来了，你们的问题也许有希望了，还听说省上有人打听把你下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此后不久，通知我返回西宁——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曲折的平反及思考

回到家后，见到久别的妻子和初生不久的女儿，自然高兴。妻子一见面就问我：你咋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走到镜子跟前一看，脸肿得像皮球，简直不认识自己了。随后便上医院查体，一查，肝肿大，胃下垂，三度浮肿，体重只有九十二斤（减少四十多斤）。这时我才有点后怕，如果再回来晚一点，说不定就命丧黄泉了。

不久,传出消息说,省委根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召开有县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检查饿死人的问题。这时全国首先爆发的河南信阳严重饿死人事件(简称“信阳事件”),也已传达下来。由此,人们议论纷纷,说青海按死亡的人口比例不亚于河南,饿死人严重的民和县等有些全家死光,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有的说省委领导太“左”了,明明粮库还有好几百万斤存粮,不拿出来救济老百姓,如果早点拿出来,也不至于问题发展这么严重(后在省长袁任远动议下解决)。在议论这些问题的同时,自然涉及:1959年反张国声等人右倾机会主义是否对?这时有人却放出风说:“高峰错了,不一定张国声就对”,“不能搞一风吹。”

看来,省委“左”的盖子是很难揭开的,又出现了“左”和反“左”的斗争,一些人要揭,另一些原来搞“左”的一套的人又在竭力捂。当时把这叫做“揭盖子与捂盖子”的斗争。只是后来中央派了一个省委第二书记王昭(新任第一书记杨植霖后到),情况才开始变化(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因而深得人心,可惜文革中被整死)。在新省委的领导下,直至1962年张国声等人的错误问题才得以平反。

我的问题比张的问题简单,因而提出甄别的时间较早些。但在甄别的过程中并不顺利,依然

是一波三折。

总要给你留点尾巴,以证明现在给你平反是对的,过去整你也是对的。这又是当时的普遍做法,因此也还得想的开。

我在反右倾运动中的思想经历,是一个充满困惑、恐惧、彷徨、无奈与扭曲的过程。事后曾不断责问自己:当时为什么那样愚昧、软弱,那样缺乏理论和道德的勇气?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后,才觉得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在一个全党都要服从领袖个人意志的体制下,任何个体都是无能为力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当年庐山会议在一夜之间人们由称赞彭德怀的信转而口诛笔伐,就无法解释像彭德怀这样的“民族脊梁”最后也被压弯,就无法解释一声号召全国上下齐向“左”转,从而几百万敢讲真话的人被打成右倾分子,几千万人因饥馑死亡而不能及时披露。痛苦的记忆告诉了我:没有真正的民主,就必然会有权力的肆虐,由此真理就会被践踏,事实就会被歪曲,真相就会被掩盖,人性就会被扭曲,“因言获罪”就不可避免。作为有幸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深感民主和自由的可贵,深知为人们提供一个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制度环境的重要。这既是我晚年的一点反思,也是一个期盼。

(作者系陕西省政协原秘书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p>欢迎 订阅 邮发代号 25-42</p>	<p>2009</p>	<p>请订安徽老年报</p> <p>—— 雍奇西江月</p>
<p>四开四版 每旬二期 逢五逢十出版 全年订价 25.20元 零售每份 0.40元</p>	<p>安徽老年报</p> <p>本报是我省唯一的老年人报纸,曾被省评为一级报纸、编校质量先进单位、广告发布诚信单位。</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版 新闻言论 ▶ 二版 卫生保健 ▶ 三版 《枫林》副刊 ▶ 四版 综合 ▶ 月末为生活版 	<p>本报老人之友 赤诚二字坚持 调和五味</p> <p>学厨师 求适各家口味 浓缩新闻消息 身心双健需知 文章词赋冠当时 犹似一池春水</p> <p>耄耋艰难相助 倡扬人世真情 精神物质 两文明 举翼双飞并进 剔去官言空话 端庄凝重风清 铅华洗尽发心声 务要文坛纯净</p>
<p>本报发行部地址:合肥市庐江路69号 邮编:230001 电话、传真:0551-2653071</p>		

绕 航 黑 瞎 子 岛

吴广权

最近中俄双方举行领土交接仪式，俄将 174 平方公里的土地交还中国，同时中国还收回阿巴盖图洲渚。这标志着中俄东段边界已最后勘定，也是继香港、澳门之后，我国又一大片失地得以收复。这一消息使我高兴之余，也引起我对一段边陲往事的回忆。

那是 1968 年 8 月底至 9 月初的事：我参加了绕航黑瞎子岛的斗争。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非常紧张。苏军不断在我东北边境制造事端。苏联政府还声称，包括黑瞎子岛在内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 600 多个岛屿约 10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统统为苏联所有。

黑瞎子岛位于黑、乌两江汇合处的中国一侧，是由两江共同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正式名称为抚远三角洲，由 93 个岛屿组成，总面积 350 平方公里。该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如按 1689 年相对平等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外兴安岭为界的规定，黑、乌两江均属我国内河，根本不存在领土争端问题。但是后来清政府由于内忧外患，无暇顾及北方领土，以致沙俄乘虚而入，迫使清政府 1858—1860 年相继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中俄天津续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最后形成以黑、乌两江为界的边境，黑龙江以北 60 余万平方公里和乌苏里江以东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俄占领。不仅如此，沙俄还在兴凯湖以南陆界勘界后单方面绘制了一份地图，并在地图上划了一条附图红线以表示边界的具体位置，但这条红线不公正地划在了两江我侧的岸上。后来的苏联政府不仅没有纠正占领中国领土的政策，还在 1929 年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中东铁路事件时，派兵占领了黑瞎子岛，并逐步在岛上建了农场、修船厂、教堂、别墅

群和军事设施。但是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所谓“附图红线”，一贯坚持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国际惯例和主张，也从未放弃过对黑瞎子岛的拥有的主权。中苏关系变坏之后，苏联政府竟然继承沙皇的衣钵，强占黑瞎子岛甚至两江所有岛屿，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不答应。

1968 年 8 月下旬，时逢黑龙江枯水期，抚远水道不能通行大船，只有绕航黑瞎子岛走黑龙江主航道才能进入乌苏里江。这既是船只航行的需要，也是借绕航行动表明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的最佳时机。但由于苏军阻挠，评估绕航行动时认为“会有一定风险”，因此决定由佳木斯航运分局有组织地实施一次绕航黑瞎子岛的斗争。

这次绕航任务是由一艘“红星”601 号货船实施的。船长姓马，是一位有多年航行经验并与苏联人打过交道的老船长。黑龙江省航运局与合江地区革委会各派一名干部登船参与领导，我被调任翻译。合江日报社派一名摄影记者参加。红星 601 是一艘自动驳船，载重约 600 吨，时速 6—8 节；有船员 20 人，加上我们 4 名支援人员，船上共有 24 人。

至 8 月底，我们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9 月 2 日下午出发，佳木斯航运分局赵副局长率队送行。晚上，船停靠富锦县码头过夜，第二天上午经同江口入黑龙江。这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云兴霞蔚。沿江放眼望去，碧水青山，景色十分壮丽。船在赫哲人居住的八岔村和边防要地街津口两次停靠卸载后，便直向抚远县城驶去。傍晚抵达县城码头，县航运部门人员登船办理相关事宜，并介绍一些当前情况。在甲板上，一位船员告诉我，东边 11 公里那个拐弯处便是黑

瞎子岛,右侧那条小河子就是抚远水道。

9月4日清晨我来到甲板上时,有几个船员正在船尾处忙着“起钩”收鱼,所获颇丰。原来,船员习惯在夜晚停船后于船尾处放下去几条长线(底钩)钓鱼,这样早餐时便可以吃到鲜鱼了。

早晨8时,船员们精神抖擞,各就各位,马船长一声令下:“开船!”红星601马达轰鸣,直奔黑瞎子岛而去。船上挂的那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格外耀眼。很快我们就看到对岸的苏军斯巴斯克哨所和江中停放的几艘炮艇。这些炮艇是二次大战期间苏军阿木尔区舰队用过的旧炮艇,但马力大、速度快、性能仍然较好。

大约9时左右,我船已行至黑瞎子岛外侧的黑龙江主航道上。可能因为长期没有中国船只从这里经过,苏炮艇上面官兵有些麻痹大意,似乎没有注意到来船是一只中国船,有几个光着膀子的士兵正忙着冲洗甲板。当我船行至与炮艇平行时,他们好像才发现“敌情”,艇上艇下顿时一片慌乱,士兵跑来跑去,有忙着穿衣服的,有急着收拾甲板上东西的,也有从艇里出来向我船观察的。不一会儿,艇上响起了警报声,甲板上已经无人,随后有两只炮艇向我船追来,并一直尾随我船观察。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从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方向驶来一只小指挥艇,对我船观察了一会儿后,靠在一艘炮艇边上,一名海军军官跳上了炮艇。这时,后边又赶上来两艘炮艇,苏艇增加到5艘,我们估计,总兵力应该在80人左右。

红星601一直照常航行。苏军也忽前忽后地一直对我观察。没过多久,一艘炮艇的扩音器响起,一人对我船喊话,说我们进入了苏联水域,让我们立即停止前进,并调转头离开这里。对于苏军喊话,船长决定不予理睬,我船照常航行。苏军见我们没有反应,便又开始喊话,仍然要求我船立即停止前进,并发出警告说,如果继续前行,他们将采取行动,后果要由我们承担。船长决定仍然不予理睬,但要求船员按预定方案做好战斗准备。如果苏军强登我船,坚决予以阻止。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我船行至距伯力大约还有30公里的地方,苏军炮艇开始了新的行动:4艘炮艇迅速在我船两侧展开,指挥艇拖后,

对我船形成包围态势,并与我船同速前行。十几分钟后,4艘炮艇突然加大马力,一齐靠到我船两侧(前后各两艘),各艇士兵头戴钢盔手持枪械蜂拥而出,企图登上我船甲板。这时,马船长一声令下,船员们抄起生产工具和棍棒之类的东西,分头迎上去阻止苏军士兵登船。甲板上发生了激烈的打斗。与此同时,我在驾驶室里打开扩音器,开始用俄语广播喊话,反复要求苏军官兵立即停止登船和殴打我船员的野蛮行动。警告他们,登船就是侵犯中国领土,他们要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负责;指出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两国国界是主航道中心线,他们武力阻止我正常航行的船只只是违反国际法的;还劝告他们不要受其领导人的蒙蔽,做破坏两国人民友谊的事情,等等。同在驾驶室的合江日报社记者老纽也忙个不停,隔着玻璃照了许多照片,记录下苏军的野蛮暴行。

甲板上进行的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武器、装备、人数均占绝对优势的苏军虽然没有开枪,没有用刺刀,只用枪托打击就很快完成了登船占领行动,并打伤我船员多人,其中重伤5人。随后,他们开始对全船进行搜查,收走了一些生产工具,相机、胶卷、胶鞋,并破坏了船上的无线电天线。

与此同时,有两个士兵冲进驾驶室,没容分说便把驾船的大副推到一边,夺过方向盘,把船调转90度向苏岸开去。随后进来一个海军少尉,看我还在广播,便来到我跟前把麦克风移开并关掉。然后拿起我的广播喊话材料看了看,问道:“这是谁写的?”我说:“谁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必须明白,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我们有权绕岛航行,你们武力劫持我船是违法犯罪行为,你们必须立即离开我船,放我们过去。”苏军少尉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只听咣当一声,我船船头插进苏岸的泥土里。苏军少尉急忙下船,向岸上一辆军车走过去。

这天,一共有5名尉级军官相继登上我船,主要是了解情况,察看船只,马船长一面照看伤员,一面应付这些军官。不管谁来,马船长都要提出抗议,并把“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宣示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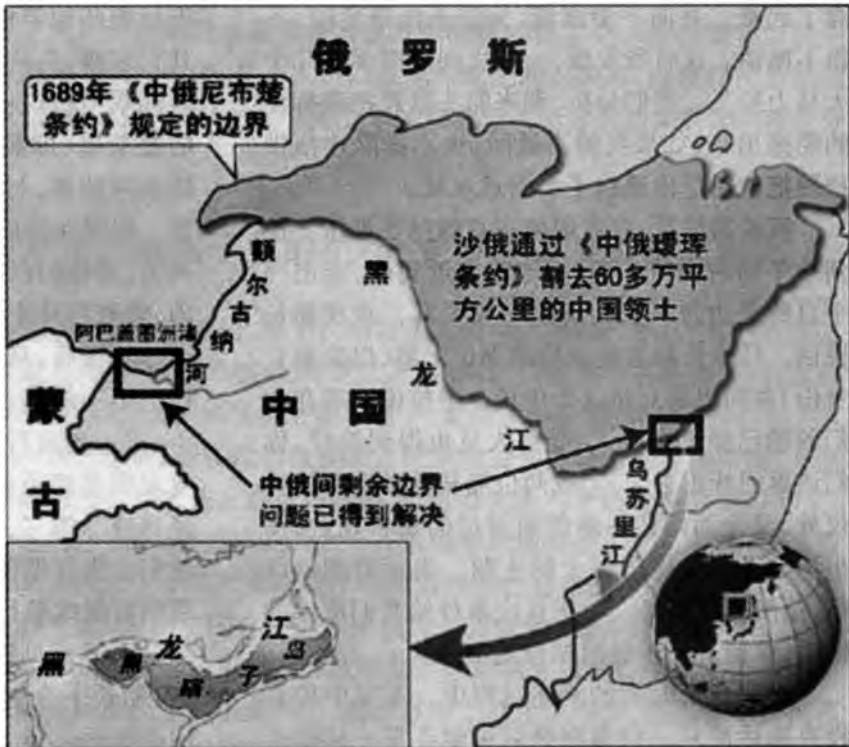
下午,苏军士兵大都撤离了我船,船上电报

员乘机修好了电报天线，马船长把船上情况向上级做了报告，后收到回电，电文中有“向受伤人员和全体船员表示慰问”和“坚持就是胜利”等内容。

船长正与几个同事议事的时候，一个苏军上尉匆匆上船说：“你们可以走了，返回抚远去。”船长当即拒绝了苏方的要求，指出：“你们打伤我们的人，伤员需要治疗，我们不能走；你们强行把我船开到你们岸边，并造成船体搁浅，我们无法走；你们的劫持行动给我航运业务造成损失，我们需要继续前进，而不是返回。”苏军上尉说声“那是不可能的”，便悻然而去。

太阳西斜的时候，船上岸上安静了下来。晚饭后我来到甲板上时，有十几个苏联士兵正围在一起议论上午登船的情形。一人说：“多亏头上戴了钢盔，不然我的脑壳就被打碎了。”另一人说：“不过他们也被打得很惨。”士兵们看到我出来，便跟我打招呼。我说：“你们应对上午的行为感到惭愧！”一个士兵说：“我们是在执行任务。”接着士兵便七嘴八舌地问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你们是没有粮食吃而吃青蛙吗？”“你们的穷人是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吗？”我很生气地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你们受领导人蒙蔽太深了。事实胜于雄辩，你们不是有人翻看了我们船上的厨房吗？在那里大米、白面、猪肉、蔬菜应有尽有，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士兵们相互看了看，有一个可能翻看过厨房的士兵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

“你们是在准备和我们打仗吗？”一个士兵又问。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是爱好和平，同时也是维护和平的国家，从来不无缘无故地同别的国家打仗，但中国人是不怕侵略者的。”又一个士兵问：“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苏联的？”我说：“苏联曾经帮助过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帮助过中国搞建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中苏两国人民曾经长期友好相处，希望一如既



黑瞎子岛的地理位置

往地友好下去。”

这时来了一个边防军上尉，把我叫到一边说：“你的俄语讲得不错。”我说：“中苏友好嘛，我国大中学校都开俄语课，会讲俄语的人很多。”他又说：“我们下船一起走走怎么样？我请你吃饭。”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克格勃的人，不能让他纠缠下去。我说：“谢谢！我已经吃过晚饭，吃得很饱。”这时，恰巧从抚远方向驶来一只挂着中国国旗的小船。他说：“你看，又有事了，我得过去看看。”我说声“对不起”后，就回到船舱去了。

这只小船是抚远航运部门经边防站与苏方交涉后派来送医药和给养的。随船来的医生给受伤船员进行了包扎治疗。来人告诉我们，边防部门已经同苏方会晤，提出谴责和抗议，指出这是绑架我正常航行船只和人员的行为。外交部也在与苏交涉，准备提出强烈抗议。现在苏联政府压力很大。希望你们继续斗争下去，坚持就是胜利。

来船返回后，船长向大家转述了上述精神，要求大家晚上一定要好好休息。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觉船在移动，我到外面一看，水手们正在抛锚。原来当天晚上黑龙江水上涨，搁浅的船

漂了起来。并向下游漂流,为防止出现危险,不得不抛锚。这时我发现,一夜之间周围多了几个大马力船头。我们分析,调来船头是想把我搁浅的船拖出来,如果我船不返回,也不排除连拖带顶硬把我船赶出黑瞎子岛附近水域。

我船抛锚后,双方船艇一直僵持在那里。快到中午的时候,终于有一炮艇靠近我船,走出一个自称是边防机关代表的中校军官,找我船长说话。马船长和省航运局的那位干部(以副船长身份)共同出来对付这个中校。中校说:“现在你们的船已经不搁浅了,受伤人员也得到治疗,你们该返回抚远去了。”我两位船长除再次提出抗议外,又全面阐述一遍前面讲过的基本观点,突出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的主题,表示要继续前行,绕航黑瞎子岛。对于这次事件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保留进一步提出赔偿的权利。

在船长长时间的阐述过程中,苏军中校并没有插话反对,只有到最后讲到苏军士兵抢走我生产工具等东西时,他对旁边的士兵说:“你们拿了他们什么东西,都还给他们。”两个苏军

士兵抱些钩竿棍棒放到我船上,船长说:“还有其它东西。”一士兵说:“当时都扔到江里了。”这时苏军中校说:“现在东西也还给你们了,至于塔曼斯基(即黑瞎子岛)属于哪国领土,那是两国政府的事,与你们无关,两国政府将进一步交涉。但现在你们是不能通过这里的,你们必须返回去,走你们以前走过的航道。”说完,他钻进艇内,炮艇就开走了。

午饭后,马船长召集全体船员在甲板集合,讨论下一步怎么办的。讨论结果认为:“第一,进一步前行是不可能的。第二,我们已经反复表明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原定绕航目标已经达成。第三,继续呆在这里意义不大,说不定他们会强行把我们拖走。与其如此,还不如我们表明有继续航行的权利后自行返回。”

上述意见通过电波传了回去。大约下午3点,船长下令起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船回到抚远。岸上欢迎人群敲锣打鼓把我们迎进了县政府礼堂,马船长简单介绍了绕航情况。第二天返回了佳木斯。(责任编辑 杨继绳)

广告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8040039号 京医械广备字第2008050153号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8 传真:010-84608847

邮编:100027

SW 声望听力 网址: <http://www.sw-tl.com>

解决听得见
听不清
耳聋
耳鸣的烦恼

我看党与国家 和人民的关系

应克复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这就需要以民主的原理阐明党与国家，党与人民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以现代民主制的要求，重建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本文仅就前两个方面的关系作一理论分析。

国家不是从属于党的机构，党不应该凌驾于国家之上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鉴于长期以来实行“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党有极高的权威，相比之下，政府的权威则要逊色得多；在这样的政治实践中，人们的意识中便形成了“党高于国家”的观念。

中国的革命，是在社会极其缺乏民主的条件下进行的。在中国，专制政体绵延两千年之久。在这种政体下，社会失衡与矛盾冲突总是以起义、战争这种非改良、非妥协的暴力形式求得缓和或解决。起义成功，天下便是起义者的天下。共产党领导革命所面对的社会条件仍然是这种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无民主的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方式供你利用；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方式成为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这两种方式，就一般而言，前者是在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条件下，通过政治上的合法斗争，依靠争得选民多数的支持而取得掌握国家权力的机会。这种政治斗争（也可称为“政治竞争”）的方式虽然也是颇为激烈，但是和平的，而非战争、非流血的；是依靠民众的选择，而不是凭借武力之大小；是通过竞争挤掉自己的对手，而不是打倒对手、剥夺对手任何政治权利登上国家权力的基座；只是获得一次性的执政机会（连选连任除外），而不具有永久性执政的特权。后者的方式固然也需要民众的支持，这是任何一次革命和任何一种革命方式成功的社会基础；但这种方式取胜的直接原因毕竟是主要依靠武装力量的大小和斗争策略的是否正确。这两种国家权力的获得方式，前者是运用民主制，或者说凭借民主的权威；后者则凭借枪杆子的权威，继而以枪杆子夺得并掌握政权的人便成了权威。两者的客观目的虽然都是达到取得国家权力，但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却产生了极不相同的结果。前者对获得政权的成功，除估计到主观条件，更意识到社会民众的支持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后者对革命斗争之成败，往往主要归结为革命党主观方面的原因（因为与民众直接关系较少）。与此相关联的，在执政之后，前者运用民主制操作国家权力的运行，后者则往往依赖执政者的权威运用国家权力。

中国革命成功地采取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成了整个革命过程中最权威的东西。但是，党与枪杆子，是党指挥枪（武装部队），而不是枪指挥党。因此，党比枪杆子更有权威。用枪杆子夺取的政权同枪杆子一样，自然都必须服从党的指挥。也就是说，党，枪杆子，政权三者，党才是权威。在战争年代党指挥枪，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党指挥政。或者说，党指挥政是党指挥枪在和平执政年代的继续。这是中国革命的逻辑，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条。由此可见，“以党代政”这种政治体制的出现并能延续较久而难以改变，一个重要的奥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这种方式。

按照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党虽然是国家生活的领导者，但应当服从这

个国家政权,服从国家政权的法律法令。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特点是,这种革命不是像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那样,把国家权力从一个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的手中,把国家权力的获得看成是最终的胜利品;而是把国家权力从少数人手中夺回归还社会,让人民来管理国家,控制国家权力,即所谓“还政于民”。作为革命向导的共产党,无非是领导革命群众去实现这一目的。从此,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非某一集团的私物。因此,所谓“党高于国家”,既不符合一般民主原则,也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从社会的一般结构来看,政党是社会的一个政治团体,它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社会的全体,它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不能不带有某种倾向性或局限性:革命的,或保守的;代表这部分人的利益,或代表那部分人的利益。政党不是国家,不是国家机关,而是从属于国家、服从于国家机关管理的一个组织。虽然它的成员可以在国家机关中担任某种重要职务,从而领导国家机关。但这不等于说,党就是国家。

有人说,如果党不高于国家,怎么保证党的领导?关于这一点如果从思想上去理解,则是正确的。就是说,党要领导得正确,应当比国家、比一般人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正确一些。但这还是“应当”,而非事实上已经做到了的。事实上是否正确,则有待于实践的验证。如果把“应当”改换为“总是”,那么政治上就会产生优越感,思想上就会产生盲目性,从而导致瞎指挥,强迫命令,家长制,导致领导工作的各种失误。党在民主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重大失误证明,党的认识难免有局限性,它可能与客观实际、与全体人民的意志不完全一致。承认这种局限性,可以减少盲目性,提高党的领导的正确度。有时候真理不在或不完全在共产党一边,而在党外某些人或某个人一边这是可能的事。人口问题的真理就在马寅初一边,黄河三门峡建坝问题的真理就在黄万里一边,如此等等。所以要使党的认识比国家、比社会的认识更高一筹,不是轻而易举的。在这个问题上,切勿陷入“权力真理”论的误区,以为有权就有真理,权力越大拥有的真理就越多,享有最高权力就拥有一切真理了。为了使党的正确意见,也为了防止某些不成熟的意见转变为代表国家意志的法

律法令,应当使这种转变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也就是说,党的领导应当通过国家民主的程序来加以实现。

“党是人民的代表”,这只是党的宗旨,并非是绝对的现实

中国共产党党章誓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如果对这一原则做简单、肤浅的理解,就可以成为“以党代政”的根据,并抑制民主权威的形成。

党章中所规定的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党为自己确立的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宗旨,表示党以及每个成员不具有自己的私利,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这是党的组织为党和党员确立的一条自我约束的原则。因此,这种“代表”同经过一定民主程序选举的那种代表的差别是:前者是党的组织对自己党员的要求,是党员言论和行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后者是受选举人委托的执行选举人意志的享有代表资格的人。前者是广义的意义上借用“代表”这一概念,后者是本义上的“代表”概念。

党的组织要求每个党员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但在事实上,党组织与每个党员是否都能达到这一要求呢?这里存在着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由可能性到达于现实性,由理论转变为实践,其间是一个充满着复杂的矛盾的过程。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以为反党党章上已规定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因而可以无所顾忌地决断一切,指挥一切,干预一切,那么其结果往往会做出一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来。

事实是,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即使主观上很想把人民的事业办好,也会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

譬如,要代表人民,就必须了解人民,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劳动,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一点,在未取得国家政权因而同人民群众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时候,相对地说,比较容易。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党的工作也会发生或大或小的错误。不过,直接地受到这种错误损害的还不是全国人民,而是党以及党所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发生错误的原因,一般地说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

这种错误比较容易发现,也比较容易纠正。但是,党成了执政党之后,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只要直接掌握着国家的权力,那么党与人民在同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就始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党的支撑点是什么?是广大的人民还是手中的权力呢?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已经不是人民,而是手中所握有的权力了。是的,权力可以指挥千百万人移山开河,改造自然。权力也可以驱使人们服从你的意志,甚至可以损公肥私,谋求特殊利益。权力有这样的功能和魅力,于是当林彪喊出“有权就有了一切”的口号时备受一些人的赞赏和奉行。尽管我们不止一次地批判过这种“权力拜物教”,但只要掌握着无限的国家权力,并且在运用这种权力时不受任何力量的制约,那么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就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由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逐渐蜕化为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社会主人。这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只要不改变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那么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良机总会伴随权力的运转而被权力占有者所利用。二是由要求群众支持转变为驱使群众服从。理由很简单:既然党是代表人民的,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服从呢?不过,我们能否假设,这种服从包括以下两种可能:一、或者是服从包括服从者本身在内的整体利益,或者服从的仅仅是少数人的利益;二、或者服从正确的意见,或者服从错误的意见。在这两种可能性中,有什么根据证明,我们所服从的一定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一定是集中人民的意愿和智慧的正确意见呢?当服从成为一种习惯,是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可以想一想,当这种服从成为一种高尚的道德训条,或成为许多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习惯时,人们还怎么能去思考服从的是什么呢?可想而知,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我们民族的创造精神怎么会耀光四射呢?而某些领导者的专横武断、滥用权力等恶劣作风又如何能得到制止呢?

要代表人民,还要通晓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要熟谙各方面的专业知识,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这方面的困难也不少。特别是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有很大的困难。人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开始往往只能是科学的假说和预见,至多也只能随着社会过程的推移逐步地认识发展的某些规律。特别是在在

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传统社会中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多少中外历史经验可供借鉴,更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工程。如果把某种意见当作绝对真理加以推崇,并且通过权力系统强令推行,都会妨碍人们接近客观真理;由此造成的种种失误和挫折足够使人们痛定思痛的了。

总之,从广义上说党代表人民,始终是一个可能性与现实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可能性可以转化为现实性,但可能性也并非都能转化为现实性。由可能性到现实性之间的桥,有时候是畅通的,有时候则堵塞着。理论与实践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因此只在党章的条文中宣布一下,党是人民的忠实代表,并没有保证党在事实上一定是人民的忠实代表。这一点需要现实性、实践来证明,由人民来裁决。另外,党在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问题上代表了人民,也不能推论在另一历史阶段或另一问题上也理所当然地代表了人民。因为旧的过程完结,便进入了新的过程,新的过程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党只有正确把握并善于处理这个过程提出的种种新的矛盾,党才能继续代表人民。

正确地认识党是人民的代表这一问题,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党如何才能正确处理党与人民关系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党自身建设和党如何运用党的权力的大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以党代政”、国家权力集中于党的领导机关这种政治体制,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既然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那么国家的重大决策,大政方针,法律法令,人事安排,内务外交,乃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争论,理所当然地应由党来提出、决定、安排、管理和裁决;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一旦颁布,就具有国家意志的性质,甚至比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而且,既然党是忠实地代表人民的,人民对党的每一个决定和每一项指示,自然只能无条件地表示拥护,于是言路只能被堵塞,舆论只能是一律的;既然党的意志也就是国家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因此,党、国家、人民一体化的观念就孕育而成了。有时候也会发生这种可悲的情况,即人们不能以人民的真实情绪与愿望作为判断人民意志的根据,否则便会像彭德怀那样大祸临头。惨痛的教训使人们只能有一个选择:以党和党的领袖的意志作

为国家、人民意志的根据（如果党内的民主不充分的时候）。然而历史早就启示我们，党、国家、人民一体化的观念和实践原则，在理论上是经不起推敲的（最明显的一点是，它否认了三者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实际上，人民（包括党自身）已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除了“以党代政”，还存在“以党代民”，在思想上两者同出一辙。所谓“以党代民”，就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由人民自己来讨论和决定的大事，应该由人民自己来选举和罢免的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基本上由党在代替做了。人们经常谈到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包括代表的选举产生，代表的职责和权利的实现，代表机构功能的发挥等，之所以难以实实在在地起到人民代表机构的重要作用，因为人们还从未讨论和解决过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到底谁是人民真正的代表机构。这种讨论或许并无必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早已宣告，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自己权力的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可是宪法这一庄严宣告同党章中所规定的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又如何作统一、协调的理解和处理呢？难道可以并行不悖、井水不犯河水吗？社会中只需要一个最高的代表机构，如果人民在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机构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代表机构，那么人民再去组织自己的代表机构确实再无必要。人们常在议论我国干部制度的弊端，最根本的问题是，称之为人民公仆的政府机关各级领导，企事业单位的大批管理者，不是由人民普遍、平等地选举产生和及时更替，而基本上由党代替人民物色，委托，调换，更新。虽然有的干部并不都需要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和更换，但每一个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应当都无例外的受到人民的切实监督，只要其中有不称职者，甚至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者，人民就有权免去他的职权。实现公民的这些民主权利自然不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但在实践中之所以难以实现，是因为“党管干部”这一原则有一条不可动摇的根据：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以党代政”和“以党代民”是一种政治体制，也是一种政治关系。政治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并且是维护一定经济利益最重要的保

障。因此，改革政治体制不仅要摒弃僵化的观念，还要涉及到调整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使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趋向新的合理的构架。

党要实现其领导必定要有相应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不是国家权力

党可以领导国家的，但必须通过法律程序，通过政府机构中党员的活动。虽然党和它的成员可以参与或掌握国家权力，但是党的领导权还不能认为就是国家权力，还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最根本的是，国家权力是人民所委托的权力，这是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合法性和强制性的根据。而党的权力作为领导权只是一种引导性、影响性的力量。从内容看，国家权力由三部分构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如果党的领导权是一种国家权力，那么它是国家权力中的哪一部分呢？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哪一种也不是。是否可以在这三种权力之外，再加上一种党权呢？可是问题来了，党权在国家事务中的职权是什么呢？是立法，行政，司法？或者再发明一种新的国家职权，或者把国家职权一部分（如立法或行政和司法）转让给党？但是，党所具有的这种国家性质的职权是受谁委托的呢？因为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或者说，在一切民主制国家，国家职权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直接的或间接的受选民委托的。这些问题都使我们陷入困境。还有，作为国家权力的党的领导权同其他国家权力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党的领导权转入到国家权力的范畴，那么它势必居于其它国家权力之上。这样，在国家权力中产生了这样一种权力，它是指挥着其它三种权力的运行的权力，或者说，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权力。这在理论上，法律上又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首先是使人民代表大会失去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宪法要改写。二是党的性质变了，它不再作为一个政党，而是成了国家机关，而且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遵照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这样的权力机关必须有民选产生，可是哪有民选产生的政党呢？由此可见，党的领导权如果是国家权力将会引起多大的混乱。

但是，我党我国长期的情况是党的领导权比国家的其它三种权力更具有权威性。应当说，这是

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就是列宁所说的,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个无产阶级不发达的国家,在革命之后只能是“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不是永恒凝固的政权形式。一定条件下是合理的,并不等于在另一条件下也是合理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理的国家。如果人民还不具备这种条件,由党暂时地代替人民来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应当同时看到,这具有历史的暂时性。历史已有力证明,由一个党长期包揽国家权力决不是理想的政治形式。

从理论到实践,把党的领导权转变为国家权力的是斯大林。虽然斯大林也阐明过列宁的某些思想,譬如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他详尽地分析了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之间不可以划等号。但在他的实践中所推行的实际上是另一种理论。

1920年,斯大林对工农管理国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说:“真正管理国家的并不是那些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国会或者在苏维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不是的。实际上管理国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晓国家执行机关事务和领导这些机关的人。如果工人阶级真想掌握国家机关来管理国家,它就应当不仅在中央,不仅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而且在贯彻决议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工人阶级真正掌握了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324页)。斯大林一方面不主张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人民的代表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国家的命运决定于是否有自己的代理人,试问这些代理人是谁呢?虽然斯大林没有直说,但是,除了党的精英,

除了斯大林,还能有谁呢?可见,斯大林是主张由党来包揽一切国家事务,由党的领导权转变为国家权力的。至于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由人民管理国家,完全不在斯大林的视线之内。

斯大林的“代理人”理论在以后更有发展,他在1925年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中,把党的领导与发挥苏维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对立起来,认为后者“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42页)。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权力成了国家至高无上绝对无限的权力。

党的领导权如果不是一种国家权力,那么共产党员是否还能掌握国家权力、是否还能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呢?回答是肯定的。问题在于弄清了党的权力不能代替国家权力之后,一些党员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不应再由党的组织指派,而是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选择录用。由上级党委委任转变为民选,由共产党员具有优先享有国家权力的特权转变为同广大人民一起经过民主选择(这是一种政治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竞争者机会均等),才能有资格担任某种国家行政职务,这将是我国权力体制的重大变革,也是“还政于民”的重要内容。(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小说选刊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零风险订阅

不满意,凭邮局原始订单和保存完好的12期刊物全价退款!

邮发代号: 2-210

月刊, 定价: 10元

全年订阅价: 120元

全国各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已连续两年实行“零风险订阅”措施,截止目前,仅有一名读者退刊。

它代表着当代中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更是中国文学创作的风向标,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力。

历届国家文学大奖中的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有八成以上均被《小说选刊》选发。在同类选刊中稳居前列。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小说选刊》杂志社 邮编: 100013
读者热线: 010-64294136 64293503 网址: www.xsxkzz.com

怎样选择突破口

辛 宇

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也是可以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当大体同步。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得已的埋单，大多与不同步紧密相关。1982 年邓小平尖锐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都深感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26 年过去了，此前的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走过浅水区；面对重点难点，我们已经绕了四分之一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继续再绕，既无空间，也没时间。

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定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党的领导制度，主要是党内权力结构的改革应当通过试点先行。在此基础上，再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则会事半功倍。否则将欲速则不达。

其实，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改革起步的。30 年前，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引了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实践反复证明：民主与素质是间接关系，与利益是直接关系。民主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经济体制可以通过特区来试验，政治体制也可以通过特区来试水。特区成功，成就了特色理论的成熟。特区即是样板间。新的伟大工程，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样板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需要这样的样板间。

三中全会功绩有三：一是党内权力进行分解，重建中央纪委（集体分权）；二是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个人限权）；三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很多人只从工作层面解读，因而对前两大功绩评价严重不足。其实 30 年来，我们还一直受惠于前两项重大改革举措。当然，当

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正在于没有及时深化前两项改革。

一 重要环节 突破口

1.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但却不是当前的突破口。

重要环节、重要内容、结合部、瓶颈都不能直接等同于突破口。金门是海峡两岸的重要环节和结合部，但却不等于祖国统一的突破口。收复金门，可能更难统一。毛泽东很早就明白这一点，因此虽有象征性的炮击，却无实质性的攻占。

我以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真正难点有三。一是核心目标难以实现。计划经济下的政治体制不改革，难以长成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更遑论转变职能。二是改革动力严重缺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动力来自包产到户的农民，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源却始终未能看清楚。三是综合效果难以发挥。30 年来，平均每五六年一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多次牵过这一发，却未见能有效地带动全身。

2. 难点之所以成为难点，是因为解决的思路和举措远离源点。

察举比不了科举，科举抵不了选举，专制赢不了法治，君主胜不了民主，官本让位于民本，此乃历史潮流。中国半个世纪的农业发展史也证明：学大寨跨不了“黄河、长江”，“八字宪法”保不了农业上“纲要”。邓颖超同志因此才在 30 年前放胆直言：学大寨不是方向，农业现代化才是方向。

3. 既然还权容易，减权难，改革为何不先易而后难！

30 年前，安徽、四川两省将种田权先还给农

民,而不先减生产队长、大队和公社的权。于是,虽然严重违宪却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为改革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将考试权还给学生,把科技发明权还给专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于是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20多年过去了,重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的论述,深感其远见卓识。

4. 突破口重要标志是能迅速扩大战果。

一旦撕开口子,就能向两侧(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纵深(政治体制)发展。五次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成效不尽如人意。

行政体制改革方式、方法,多被动地由经济体制改革所拉动,以国家赶超战略为导向。这些年的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职责权限几经变迁,权力多次下放和上收,几乎没有来自下面的试点和推动。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各部门及公务员的利益被强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如果没有制度上的隔离措施,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只可能导致其与市场经济利益更紧密更隐蔽地结合,从消费资料到生产资料,生产领域到金融领域,从能源到金融,再到金融衍生产品。而制度上的隔离措施,在我国通常来源于政治体制改革。

5.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增加活力。

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中提到,“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以为,完成第一个目标,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保持政治活力;完成第二个目标,必须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以保持经济活力;完成第三个目标,必须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以保持民主的生命活力。十六大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十七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的重要论断。“生命论”的提出,使民主的理念,不仅超越了过去的“工具论”和“目的论”,而且有利于激活以人

为本的深化和科学发展观的践行。

二 脚痛 只能医脚

表现于执行层面的问题,其根源多在决策层面。政府职能多年难以转换,根源于不少党委的“党”不管党并以党代政。

1. 我国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仅靠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很难完成的。

改革之初政社合一的职能转变,是在一没修宪,二没给政策的情况下,靠着三中全会精神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完成的,而不是靠县、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成的。当年学大寨,解决不了出工不出力这个老大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牵不了转换职能的牛鼻子。原因有二。一是无上涨空间。在党委领导制度未有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压力过大而空间过小。二是无下跌动力。来自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的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很难直接推动村、乡、县的基层民主进程。20多年前,来自农民自发性的村民自治,是以农民个体为本位的民主实践活动,现已经普遍完成六七届村委会选举,平均参选率80%左右,五六亿成年农民参与自治和海选。村委会是自治组织而非行政机构,因此来自国家级机构改革的力量,缺乏中间层级,很难传导于基层。不仅如此,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府职能的转变、关系的理顺、结构的优化、效能的提高,不仅取决于政府,而且更取决于党委。

2. 仅靠经济体制改革的拉动力,成本太高;仅靠行政体制改革的推动,阻力太大。

经济体制改革进城后,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而非消费拉动;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是靠危机推动而非民主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常常是上面想动而非下面愿动。

深入剖析我们的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透过机构、人员、数量增减的表面,实际折射的却是权力格局的划分和利益格局的调整。

利益的刚性,决定了单从技术层面,难以破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果政治体制不作实质性改革,如果党内权力不能科学分解,即使再搞多少次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也难以转换。前五次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之所

以只能限于机构精简和调整,是因为这种改革还缺乏政府职能切实转变的坚实基础。

3. 深化改革应以党内权力科学分解为突破口。

重视制度建设(监察制度和科举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走在世界前列;忽视制度建设,使我们被动挨打;提出改革制度,开始走上复兴之路。

30年改革历程,有这样一种现象:经济上大多放权于基层,政治上往往收权于高层。于是形成一种哑铃式结构。村民自治面广量大,各部委权重钱多。但乡、县两级却已经中空。如果我们能通过强化县级政权的权力,并加大其自治和民主的分量,或许就能变哑铃式为橄榄式,就能找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三 看似容易 实际容易

1. 行政三分,看似容易其实很难。

一是不充分的权力,还权后还得再分;二是在执行权上搞三分,必然叠床架屋;三是利益的刚性,决定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职能转换实难到位。

2. 党内权力三分,看似很难其实相对容易。

民主既是党的生命,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专制下无民主。通过制衡,民主才能产生、成长、巩固和发展。因此,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从党内分权入手,进行权力的监督制衡。党的领导制度改革了,真正建立健全了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就能有效地推动吏治的改革,以及行政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多年的党代会常任制已经为党内权力三分,作了必要的准备。

3.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功夫看来还得在诗外。

“大部制改革”、行政权力三分等改革当然需要也可以做。但作为先进性战斗堡垒的各级党委,如何先理顺与人大的关系再理顺与政府的关系,先改革党委领导制度转变自身职能再转变政府职能,先优化自身的结构再优化政府的结构,先提高自己的效率再提高政府的效能,是否更好一些?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结构和制

衡的改革,而非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始于52年前的党代会常任制如何深化改革?从十六大的权力运行机制到十七大的权力结构,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从党内监督的制约到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出监督的制衡力,进行党内权力三分的试点已经刻不容缓,理顺党委与人大的关系也呼之欲出。

真正的机遇通常难以反复出现。一百年前立宪的教训需要深思。改革需要渐进,但却不允许不进;改革需要矛盾导向,但屡屡为次要矛盾导向,却难免贻误战机。改革也需要危机导向,但如果总是被危机所导向,最后将痛失转机。

其实,30年改革开放,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腐败的问题,两极分化的危险也在不断累积和加大。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致使在不少地方和单位的主要矛盾,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最近发生的贵州省瓮安事件,从一个侧面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

贴近问题的源点,我们就能全面、科学地认清问题,准确地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和正确路径。在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体制改革的智库建设,而且必须积极主动地开辟各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启动新一轮的特区(特别是政治体制特区)建设。(责任编辑 吴思)

本刊扩版调价启事

应作者和读者要求,从2009年1月起,本刊篇幅从84页增加到92页。由于扩版和纸价大幅上涨,自2009年1月起,本刊定价从5.80元提高到6.90元,全年82.80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08年7月

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阎长贵

“窑洞对”是怎么回事，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它通常所指的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在1945年7月的一次谈话。本文为便于说明问题，特再把它重复叙述一下。

1945年7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与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人的热烈欢迎。

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杨家岭他家里叙话。在窑洞客厅里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几天的考察有何感想。

黄炎培深感延安朝气蓬勃，抗日胜利之后定将赢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遂借此机会坦陈心中的远虑，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毛泽东在重庆和蒋介石赫尔利等合影

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微笑着严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个“窑洞对”，人们耳熟能详了。然而，还有一个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毛泽东书面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其价值与这个“窑洞对”相较，要超

过它。但这个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仿佛还不为人们所深切知道，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其影响远逊于名闻遐迩的“窑洞对”，即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的谈话。须知，在当时，毛泽东这个书面答路透社记者问那可是上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重要位置，甚至头版头条的。且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头条刊登这篇答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 中国需要和平建国》；10天后，即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八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以“本报重庆讯”的名义，用同样的标题全文转载这篇答问。不容置疑，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是非常重视这篇答问的。顺便指出，哈而滨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收录了这篇答问。这篇答问内容非常多，有十二条，我们只看看它不论对当时，还是对现在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内容：“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念。

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十二个问题，请因国共两党谈判逗留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回答。甘贝尔提的第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对这三个问题，毛泽东做了如下回答：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与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经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

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这个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虽然不是延安窑洞做的，但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即住窑洞时期的思想，和人们普遍称为“窑洞对”即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谈话，在时间上，仅相距两个多月：一个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个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然而，不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还是在胜利后，中国都面临着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但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国共两党的主张不同，这也就是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所说的“两种中国之命运”，因而，毛泽东这两篇东西，在内容上，也是相同或相通的，即它们都讲到或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建设自由民主新中国”的治国或建国方针，并且毛泽东答甘贝尔问比被称为“窑洞对”的毛泽东和黄炎培谈话内容更丰富。——为了联系和比较，我们把这个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称为：“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这两个“窑洞对”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十分明显，本文不做展开论述，只提几个问题。我们把这两个“窑洞对”对比一下建国后的现实，会作何感想？在我们中国，“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何以体现？“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念和现实怎样相统一？进一步问，这两个“窑洞对”对我们今天的思想和行动，特别对改革开放有什么启示？我们经常到处找“坐标”，找“参照系”，而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提出的以及所实践的基本纲领和路线不也是我们今天纲领和路线的最切近的“坐标”和“参照系”吗？……常常听到有人责骂“背叛”和“数典忘祖”，请人们认真研读一下这两个“窑洞对”，究竟谁——谁在“背叛”和“数典忘祖”？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

方海兴

1950年7月,当曾任石家庄市长的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而这之前,柯庆施的个人履历上已经有着不良记载:1933年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因畏惧敌情中途脱逃却谎称已去,延安整风中曾给他这一问题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按理来说,这样一位“问题官员”不会太得重用。然而到华东后的柯庆施却是仕途青云直上。他于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书记,两年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接替陈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当年大区撤销后唯一组建的中央局)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并非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员,同年还兼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协作区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那个时期的共和国历史上,柯庆施的如此官运亨通实属罕见,个中缘由也就耐人寻味。固然这与时代氛围、党内制度有关,但最主要者应是他坚持曲意逢迎最高领袖、窥测风向而动的为官准则。正如1980年陈云谈《历史决议》中如何写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所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

—

翻检史书可见,柯庆施琢磨毛泽东喜好行事者,最早当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他对毛泽东的一次看似漫不经心的谈话,曾经深深地打动了

毛泽东,且对当时共和国历史的某些方面不无改变。

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夏党内开展的对所谓“小脚女人走路”批判前,步伐一直是比较稳当的。但是在这年夏毛泽东视察南方后,5月起,这一工作陡然间被毛泽东加快了,短短数月内一蹴而就,因要求过急,改造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遗留了不少问题。近年来,不少人探询毛泽东“五月变化”的原因。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庆施向南巡的毛泽东所讲的一个情况所致,“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薄一波认为,柯庆施的这几句话“故作危言耸听,以打动领导”,“恰在这时,在党外高层人士中,替农民说话的多了,有的还说了一些类似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先生讲的‘农民苦’一类的话。毛主席是不大愿意听‘农民苦’之类的话的。当时他得出这么一种印象:这些讲农民苦的人,自以为代表农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农民,只是不愿搞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早在4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经典公式。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他就一再号召全党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努力过好社会主义关。因此不难想象柯庆施的这个情况汇报的高超和妙谛所在。恰如薄一波所说:“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三年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再次提及柯庆施的这次汇报,可证薄此言不虚)。所以,南方视察回京后的毛泽东就带着怒气与忧虑走上前台,开始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推进农业合作化;不知底里、

主张合作化步伐应当稳妥的邓子恢，自然就被他斥为“小脚女人走路”。而对于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不仅带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也导致了1956年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冒进。因此有论者指出：“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伪事实欺上瞒下，致使党的方针误入歧途的首次记录。”

柯庆施的这次向毛泽东进言，无疑是为自己博得了头彩。他更加事事紧跟最高领袖，以抢得风气之先为能事。也许正是由于柯庆施的缘故，从这时起毛泽东对华东地区格外青睐。1957年底，二次访苏归来、正在酝酿大跃进的毛泽东曾来此停留了近一个月。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于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际批评反冒进、改变八大路线方针的想法，及“十五年赶超英国”的雄心壮志，当时党内在言行上跟得最紧者当数这位上海党的领导人。这年底，柯庆施便在中共上海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一篇急躁冒进味道浓烈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他在报告中猛烈地抨击了1956年的反冒进：“曾经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们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试问，经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错误吗？”

柯庆施这篇升虚火的文章无疑是及时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准备大跃进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泽东，在这里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报》刊登柯庆施的这篇文章。次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便成了唯一不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明星。毛泽东说柯庆施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讲到激动处，他甚至拿出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对周恩来说：“你是总理，你看，这篇

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会议期间的多次讲话中，65岁的毛泽东屡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据说这是当时党内唯一被毛泽东尊称为“某老”而实际年龄比毛泽东小的人。在3月毛泽东继续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据吴冷西回忆：“柯庆施很活跃”，当会议发言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时，“连插话讲了三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吻”。而他的上佳表演，则当数他提出的这句类似当年周佛海吹捧蒋介石的经典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句名言会后在全党作了传达，他也从此博得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多年之后，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件事情时曾心情沉重地说：“这是在正式的会议上公开提出来的，不是几个人在私下谈话，更不是任何人编造出来的。”

1958年5月，正式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毛泽东继续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果然，在大会的发言中敢说敢做、敢想敢干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最为离奇者当数柯庆施关于文教卫生大跃进浪漫前景的发言：

——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中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将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

——到那时，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为社会的新风尚，随着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的发展，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将大大加强，全国真正变成一个亲密、和睦的大家庭。

这位“柯老”还说：“这样设想合不合乎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

据李锐说，柯庆施的这个发言“看来是张春桥的手笔”，在成都会议时柯庆施“似乎受到冷淡，他大概觉得这同没有交出一篇文章有关。于是这位柯老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篇文章。他的主要意思是在工业和农业大跃进的同时，也要同时做到教育和文化的大跃进、大革命，但谈不出多少具体内容，印象深的记得他谈了一条：十五年之内，全国人人都成为大学生，到处都办起大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非常勉强写了一二千字交了卷。结果此文没有印发出来。后来田家英告诉我，柯对他说：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以后中央开会，他就必带张春桥了”。其实，柯庆施的这番对未来社会图解式的描述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未来社会设想作的具体阐发。果然，南宁会议以来屡屡得彩的他在此次会上再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便和西南局的李井泉作为地方党委负责人一同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后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因而在随后的“大跃进”岁月中，柯庆施的长于琢磨、进而逢迎更是蔚为壮观。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便在全国各条战线铺开。高指标和浮夸风首先空前泛起。柯庆施自然是这万马奔腾中一马当先、睥睨一世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华东协作区在农业口率先放“卫星”，说华东五省市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收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增长近70%。华东区还规划到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薄一波说，这对毛泽东最终下1958年炼钢“一七”



柯庆施(1902—1965)

万吨的决心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可以断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响。这有毛主席后来多次的谈话为证”，是柯“促使他闯下这个乱子”。而1958年炼钢“一七”的目标对当年及其后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危害则是众所周知的。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曾说去年的1070万吨钢，主席本来是提出来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与会的谷牧后来回忆说：“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

在当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柯庆施还别出心裁地首创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据说，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柯庆施就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去参观，张发现那里搞吃饭不要钱，回去后向柯作了汇报，柯就把这个口号宣扬出去了。所以当时党内盛传“吃饭不要钱”是柯庆施的“首创”。李锐则说：“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柯庆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提过了，报纸上一宣传，就普遍推开。因此，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指出：“免费供应膳食的问题显然是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来的。”柯庆施的这个口号显然又极得毛泽东的欢心，在随后

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吃饭不要钱”。于是，8月23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时，柯庆施就正式提议“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不少人立即赞成，只是最终由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明确否定，会议制定的人民公社问题决议才没有写入。“吃饭不要钱”的提议没有正式获准，柯庆施则把毛泽东在会上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讲话牢记于心，9月初回沪后讲给了自己的“军师”张春桥，张立即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意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章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举了鲁迅小说中的赵太爷骂阿Q不配姓赵的例子后，张文说，在旧社会，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而文章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果然，看到了此文的毛泽东很是欣赏。根据他的指示，《人民日报》10月13日全文转载了张文，毛泽东代写的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从而引发了一场连续两三个月的大讨论，为当时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蔓延进一步制造了舆论。

二

喧嚣一时的大跃进并没能持续多久。1958年秋冬之际，发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出了不少的毛泽东率先开始纠“左”。但是这位大跃进的得力干将柯庆施却并不服输。在1959年初的上海会议上，据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当他在会上说四大指标都定得过高时，柯庆施就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而在另一个场合，柯庆施则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果园摘苹果，当够不着时就要跳起来摘。在7月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前期，面对“大跃进”的沉痛教训，大多数与会者都能冷静地剖析问题，反思经验教训，说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感到心情沉重，而柯庆施却屡屡护短。亲历此次会议的李锐后来在《庐山会议实录》中称

他是“左派”司令部的挂帅者，说以他为首的一部分人始终是在窥测风向，对上年的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反而犯阿Q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在16日彭德怀的上书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后，柯庆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领悟到了领袖的意图。因此在毛泽东表态之前，他就已称彭德怀的信为“毒草”。他批驳彭的“得不偿失”说：就得失关系，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正如上海工人说的，“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21日，当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时，柯庆施不断插话责难。次日，毛泽东找人谈话。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说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就促成毛泽东的主观武断，认为彭德怀是在“挂帅反毛”，“魏延反骨”作怪。正如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 1949—1976》所指出：“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末，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在毛泽东23日讲话之后，柯庆施在随后的发言中立即说彭信的整个内容“应当肯定是错误的”，是实际上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总路线的正确。这是小组讨论中最早批彭的“画龙点睛”之笔。在30日的发言中，柯庆施进一步攻击彭德怀在历次革命的紧要关头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这次为首反对党的总路线，决不是偶然的。于是，“神仙会”最终演变成了“护神会”，中国继续被推向大灾难之中。

共和国的建设从1961年起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调整时期。但是对于困难形势和成因的估计，党内看法不尽相同。一些推行“大跃进”不遗余力者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这不仅严重影响着调整工作的深入，也逐渐生成了中央领导核心内毛、刘的分歧。在这方面，柯庆施则是典型代表。这年初，毛泽东号召本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一个调整年。2月初，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地方党的负责人听取关于纠正“五风”的汇报，柯庆施仍然在大讲特讲食堂办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所幸的是，毛泽东

从其他渠道得悉公共食堂的极大弊端后，1961年底顺从了农民停办食堂的意愿。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则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极为不满，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并且说，“越看越没劲”。对于这一时期周恩来、陈毅主持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柯庆施也颇为不满。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柯庆施指示上海代表：“只带耳朵听，不要带嘴巴，上海的路线是正确的。”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文艺界的一些错误做法为“五子登科”，柯则不准在上海传达这一讲话。以至于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气愤地说：“你算老几？”原全国文联副主席、著名导演谢晋后来回忆说：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吓了一跳，周总理脸涨得通红。大家都在猜他讲谁，实际上他是在讲柯庆施，只是没有点他名。

三

1962年后，随着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展开，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大跃进”的挫折中重新转向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成了他审视的重点。意识到最高领袖兴奋点转移的柯庆施也立即跟进，开始频频瞩目文坛。

这年底，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首先对戏剧工作提出了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于是，并不熟悉文艺创作规律的柯庆施立即标新立异地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艺工作者联欢晚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只有写十三年的现代题材，才能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也只有反映建国十三年来的生活，才能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他甚至还说，只要是写十三年的，我就带老婆孩子买票来看，不是写十三年的，请我看我也不看。

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

报》同时报道了柯庆施的这个讲话。“大写十三年”这一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艺界的强烈批评，但是却和当时正欲染指政坛，却在北京无人理睬的“流动哨兵”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2月下旬，江青来到上海，欲借此地建立她的“文艺革命试验基地”。柯庆施则早已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了江青的重要性，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由于江青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而来，柯庆施就把上海市委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张春桥正式介绍给她。4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就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个口号有极大的片面性，不符合“双百”方针，而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则根据柯庆施的旨意，编造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北京和上海的对立之势由此形成。会后不久，有了具备特殊身份的江青的支持，柯、张就在上海动起了真格。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柯庆施组织人写的《“有鬼无害”论》，对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展开了政治批判，从而拉开了60年代中期文艺界愈演愈烈的批判运动的序幕，也标志着在上海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后，江青与柯庆施、张春桥开始“协同作战”。中国的文艺舞台遂日益变成了政治舞台。几年后，身为中央文革要员的江青曾不无感激地说：“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此后，善于揣摩的柯庆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动开展故事会活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农兵进行阶级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报导了他的这一新举措：柯庆施同志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柯庆施同志提到，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故事员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很快，看到这则材料的毛泽东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一阅，此中的深意显然是批评北京迁就文艺界、墨守成规，不如上海抓得紧、有新招，看来他后来指责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念头这时即已生成。也就是在这则材料上，毛泽东作出了他在

“文革”前关于文学艺术两个著名批示的第一个：“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因此，有人指出：“柯庆施的这个新招直接引发毛泽东对文艺界特殊的感慨，导致文艺界最终跨进灾难的门槛。”

无疑，柯庆施是很快就获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的，这可由他在12月25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会开幕式上指责戏剧工作的这一席话证得：“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就在这次用当时的话说——柯庆施亲自“领导”下、江青亲自“关怀”下召开的话剧观摩会上，特地赶来参加会议的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连遭恶意轻慢，当他得知闭幕会主席台上竟没有安排自己的位置时不得不悄然离开了上海。

1964年初，柯庆施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住院治疗和休养。延至翌年4月，病死于成都，终年63岁。在他死后，北京及上海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

动，中共中央的讣告中还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封友”，可谓哀荣备至。这一时期，江青则频繁地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点燃后来十年“文革”之火的那篇奇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在沪上秘密炮制之中。“文革”大幕即将拉开，柯庆施没有赶上那个时代，是不幸？抑或幸也？斯人已去，但看来是难以盖棺定论。时至今日，柯庆施仍然是“文革”前的20位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个人传记传世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注释：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吴冷西：《忆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

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540页。

广 告

大午温泉度假村

大午温泉度假村位于保定市徐水县，距北京110公里（京石高速徐水出口），是以大午温泉地热井为依托兴建的一处园林美景。

大午温泉地热井深3003米，井底水温62℃，出井水温56℃，日出货量达1200立方米。温泉是地壳深处经过几亿年的蕴酿而成，含有多种具有活性作用的微量元素，如钙、钠、镁、钾、锶等离子，有一定的矿化度。大午温泉水质卓越，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大午温泉度假村地处乡村田野，绿树环抱，鸟语花香，清幽娴静，远离尘嚣，初入使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可谓“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度假村下设温泉贵宾馆、温泉佳宾馆、温泉游泳馆、温泉露天池及大午企业文化主题公园，馆内设休闲大厅并配备大、中、小型会议室，集温泉泡浴、按摩保健、休闲娱乐、会议接待、餐饮住宿、度假旅游多功能于一体，可观赏田园风光，品尝乡村野味。宾馆高档舒适，价格低廉，服务超值，适合工薪阶层全家出游，更适合离退休老人的休闲疗养。

“古有武陵源，今有大午城”，大午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诚实善良的大午人，欢迎您的光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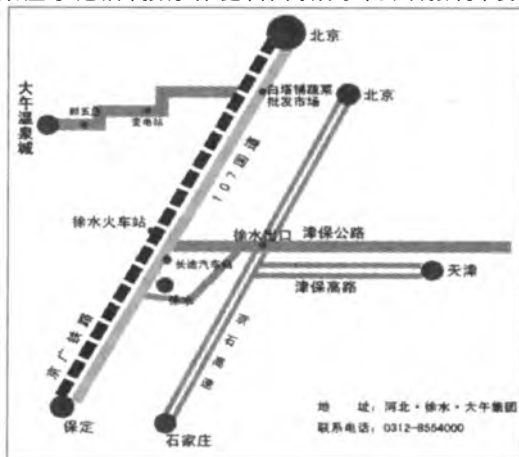
客房价目：大午庄园标间60元，温泉佳宾馆标间280元（含温泉门票48元）。

地 址：河北省徐水县河北大午农牧集团

联系电话：0312-8554000 8554999

自驾：京石高速徐水出口下，沿107国道北行至白塔铺蔬菜市场，沿大午集团指示路牌西行5公里即到。

火车：从北京西客站搭火车到保定火车站或徐水火车站。大午温泉度假村距徐水火车站5公里、距保定市25公里。保定市12路公交车直达大午温泉度假村。



地 址：河北·徐水·大午集团
联系电话：0312-8554000

通

渭

问

题

——“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杨继绳

在 1959 年到 1961 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一场掩盖了四十多年的悲剧

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2000 年 8 月，我到通渭县采访。完成工作任务之后，我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并找了一些当事人个别交谈。事后，又在定西和兰州的有关部门找到了“通渭问题”原始资料。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林田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通过多方努力，我终于弄清了解被掩盖 40 多年的真相。

从 1990 年出版的《通渭县志》第 146—147 页上记载的“通渭县历年人口状况”中得知，1961 年全县人口比 1958 年减少了 78462 人，减少人数占 1958 年总人口的 28.1%。1956—1958 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 2.67%，1958 年的平均人口为 276742 人（即 1958 年的年末人口和 1957 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 年应有人口 299506 人，而 1961 年实有人口只有 201255 人，比应有人口少了 98251 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 32.8%。这 98251 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 年 2 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 3892 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

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事过五年以后的 1965 年 7 月 5 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 60210 人，死绝了 2168 户，1221 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 11940 人，土地荒芜 36 万多亩，牲畜死亡 33000 多头，羊被宰了 40000 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 5 万多间，砍伐树木 27 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 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2000 年 8 月 9 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 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 年 2 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

看锅里正煮着啥，大队长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告别饥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6页）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开座谈会时，通渭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张大发在坐，他是《通渭县志》副主编，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愿。我建议他抓紧时间，抢救资料。2005年，我收到了张大发寄来的他的30多万字著作：《金桥路漫》，这本书是用县档案馆的资料写的，还访问了很多当事人，书中记录了很多吃人的事件。

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

1958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山西人，时年35岁，早年参加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牢。县长是田步霄，陕西人，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工作实事求是。由于席道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积极”，省委对通渭县的工作很满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这对一个小县的县委书记来说，是无上的光荣。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决定搞“大跃进”的会。席道隆在会上得到了“真经”，回来以后工作更积极了，立场更坚定了。

1958年，他们响应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把全县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

吃饭。农村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全县组织一个民兵师，各公社成为战斗团，大队为战斗营，生产队为战斗连，连下设排，排下设班。“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在生产上提出了“千斤元帅升帐（粮食单产），万斤洋芋上天（洋芋单产）”的口号。公社化虽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农民抢收自留地里的庄稼，杀羊杀猪，他们说：“看着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为了清除阻力，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成共产主义？显然，对这样深奥的问题农民是说不清楚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共产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谁反对组织人民公社，谁就是反对共产主义，谁就要受到批判、斗争。有不同看法的人就是“白旗”，要“拔掉”（即开斗争会）。仅1958年，全县共“拔白旗”565人。这是定西地委组织部1959年复查时的统计数，实际“拔白旗”的人数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达“拔白旗”的指标，生产队为了完成指标，谁开会来晚了就“拔”谁。在“拔白旗”的同时，对那些积极跟着跑的人“插红旗”，即表彰，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热。中共通渭县委1965年7月5日《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从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批判斗争农民10360多人。

为了迎接共产主义，全县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价值990多万元。

在生产上集中指挥。种什么，不种什么，不根据农民的意愿，不顾自然条件，随意改变种植结构。与此同时，把大量劳动力调离农业生产战线。1958年春，抽调劳动力17900多人（占总劳动力的19.7%）大搞工业。5月，又抽调18000多个劳动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月正当庄稼成熟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10多天时间，集中5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1.4%），从刘家岭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公里的长蛇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突击水土保持工程。10月，

又抽调25000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年,又调5万多个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县,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使得耕地荒芜(年底荒芜耕地11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16423万斤,1958年11576万斤,1959年8386万斤,1960年3632万斤。(《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一方面向上级浮夸粮食丰收。1958年计划总产38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26000多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25倍),征购任务定为4360万斤(实际入库4154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36%)。1959年计划总产24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18000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15倍),征购任务为5400万斤(实际入库3958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47.2%)。(《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完不成征购任务,提头来见!”

在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征购任务逐年增加,只好让农民勒紧裤腰带。其实,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农业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1959年8月开始“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10月18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揭发批判县长田步霄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

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死,中共通渭县委却不承

认现实。他们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谁要求供应粮食,就给谁扣上“以粮食问题攻击县委,是富裕中农,是怕死鬼”、“右倾机会主义者”、“坏分子”、“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县委认为,“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注: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在一起搞鬼,要进行打击。”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批斗要求政府供应粮食的农民和说真话的基层干部。还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把他们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

通渭县委这么做,是上级逼出来的。高征购指标是国家定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是一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干部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粮食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征购粮食任务完不成。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说:“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的胜利”,“防左容易,防右难”,“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在征购粮食时,窦明海在电话会议上说:“公购粮入库时,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农村断粮时,窦明海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窦明海是省委书记张仲良十分看重的干部,是全省有名的“积极分子”“先进人物”。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

“右倾反党集团”，地、县都揪出了霍维德、宋良成的“代表人物”。

一方面闭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 50 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到现场讲话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儿。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 120 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 1100 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 1300 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 40 多天。

1959 年 11 月 3 日，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 14 个劳教队，集中劳教 1637 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定西分院：《关于对通渭搞劳教队的情况检察报告》，[60] 检二字第 054 号，1960 年 3 月 30 日）

1960 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 50 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 11 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 79 人。42 个公社主任中，有 3 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 22 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 53 人，打死逼死 12 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和学生，架起轻机枪 12 挺，步枪 50 多枝和土枪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 160 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 66 人当中因伤致死 4 人。（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0]364 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 年 4 月）

在农民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 1961 年 1 月 13 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 1960 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 339.7 斤，油 23 斤，鸡蛋 260 多个，粮食 473 斤，糖及糕点 62 斤，红枣 320 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顾农民死活的干部，在大批人饿死的时候，席道隆开始允许农民自找生路；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将牲口分户喂养，给生产小队下放权力等。1960 年 1 月上旬，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席道隆连夜去地委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受到批评而回。

省委工作组继续反右倾

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经中共中央指示，甘肃省委对通渭采取了措施。1960 年 2 月 8 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 100 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看，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县委扩大会议结束的当晚,立即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向全县宣布“以席道隆为首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勾结一起所造成的恶果。号召全县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起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说:“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19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告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去去。”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是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

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子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成的,省委工作组却大反右倾,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县的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施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0]364号)。中共中央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揭盖刨根运动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还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资。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工作组还在口粮、棉

（上接第 57 页）边的关系是“面团往一块揉”。

黑龙江上沉积了那么多年的厚厚的冰层，就这样轰然间崩塌了！由中方主动而影响苏方，由下层启动而促动上层，由边境开放而推进两国多方面恢复交流，中苏之间冰冷的关系出现了解冻的曙光！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苏边境地区的人民迎来了建立新中国之后的第二次解放，这里重又出现了和平、繁荣的景象。

以后，苏联解体。巨大的动荡没有扰乱边境地区平和的氛围。中国和接壤的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其他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依然健康地发展着，不仅以货易货，其他诸如劳务输出、技术协作、工程承包、旅游和文化体育团组的交换等等，也都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它给边境地区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繁荣，带了人民的思想解放，边境地区不再是“死胡同”，而是对外开放的第一线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黑龙江省中俄边境地区已然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回望变迁的轨迹，和当年胡耀邦所构想和期望的一样。他审时度

势，顺应潮流，是极富远见的。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人们自然又想起了他当年的考察，想起了他一路上的讲话，想起了他对边境建设寄予的厚望……

“南有深圳，北有黑河，能不能比翼齐飞？”胡耀邦的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我的脑海里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这样一副图景：邓小平当年为寻找突破口建立经济特区在南方画了一个圈；若干年后胡耀邦为打破中苏关系的僵局，改变中苏边境地区的落后面貌，在北边从黑河、伊春、同江、抚远、虎林、密山到绥芬河画了一条线——两位伟人南北遥相呼应，共舞改革开放的大旗——这是一幅多么宏伟而又壮观的画卷啊！

边疆变了，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多么希望胡耀邦再来看看啊！

他来不了了。但我想，他的精、气、神留在了那里，他从没有离开过那里，他关注着那里每一天的变化，当年考察的时候，他肯定预见到改革开放之后的边境地区会有今天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王洪起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是 1949 年 11 月 23 日正式建交的。建交后的头 10 年里，两国关系发展正常。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从 1954 年开始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

1960 年 6 月，在由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 6 月 21 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宣称列宁主义若干原则已经过时，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从而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会议期间，惟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党内第三把手希斯尼·卡博态度坚决，他力排众议，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

正是因为卡博代表阿尔巴尼亚维护了中国，赫鲁晓夫便对阿打击报复：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并于 1961 年 12 月同阿断交。中阿两党在反修斗争中走到了一起。当时，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阿尔巴尼亚是惟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随着反修斗争的深入，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和相似点，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对阿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来访的阿重要代表团都要安排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接见。

1966 年 11 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1 月 2 日，康生向大会宣读了由毛泽东 10 月 25 日签署并署名的致阿党“五大”的贺电。

贺电说：“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英雄的人民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贺电说：“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矗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贺电还说：“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经验。”

贺电满怀激情地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贺电指出：“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康生在大会上宣读后，霍查立即敞开手臂，同他热烈拥抱、亲吻，并拿起贺电，让与会者观看，会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恩维尔（霍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歌声响遍“山鹰之国”的四面八方。

中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惟一执政党。当时，毛泽东每每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都离不开“文革”话题，并由此变成了“最高指示”，在国内各单位下达“不过夜”，中央机关人员纷纷敲锣打鼓，以示庆贺，而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也上街游行，表示欢迎。人们当时对这种不正常的方式私下里称为“出口转内销”。

中国对阿援助基本情况

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对“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中国竭尽全力地进行经济援助。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

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1968年春，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阿党坚决谴责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

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美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帮助阿进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和第五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建设。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同时也应承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中国在没有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简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记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国使馆突然分给使馆和分社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香烟是中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

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使馆人员。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尔巴尼亚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耿飚大使如是说

1969年5月16日，老资格的外交家耿飚赴阿任中国驻阿大使。他是中国共产党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耿飚大使通过与阿领导人的接触和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异常”情况，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述：“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政府对这种错误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

是，后来我进一步察觉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我们中央的观点之间，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致，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分歧。”

耿大使强调说，“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同时指出：“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中阿关系出现裂痕

应当承认，阿尔巴尼亚在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是出了大力的。对此，中国人民始终牢记在心。另外，中国还首先从阿尔巴尼

亚引种了油橄榄，谢胡总理作为给周总理的礼物赠送的油橄榄树苗迄今仍在中国茁壮成长，成为“中阿友谊”的象征。然而，中阿即使在上世纪关系最好的时候，双方也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霍查白天对我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中国。他于1962年初至1977年底期间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日记”以《中国纪事》为书名分两册出版，于1978年1月党内发行、1979年9月公开发行，同时还翻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也不知道这些日记是他当时写的，还是后来补写的。因为有例在先，阿党历史及霍查的其他言论集再版后许多事实和内容就被颠倒或是面目全非了。比如：《霍查言论集（1963—1964）》（1977年地拉那出版）中发表的他在阿国庆节前的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

“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和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而在该选集1980年再版时改为这样：“修正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

又如，原来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都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而新的说法是：“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

霍查把“中国共产党”统统删掉了！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抓住机会，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毛泽东提议并经党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以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动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阿尔巴尼亚不同意中国的做法，他们决定：决不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决不和解！

1969年9月，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阿尔巴尼亚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葬礼。霍查任命政治局委员马尔科为团长。马尔科抵达河内后即率领中国代表团的李先念副总理联系。李先念告诉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马尔科当即问李先念：“如果您和柯西金打照面怎么办？”

“如果他向我伸手，我也向他伸手，因为我们

两国有外交关系……尽管我们两党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我们已经邀请柯西金在从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在北京停留，他已经接受了邀请。”李先念回答说，而马尔科则神色茫然。他在琢磨：是不是要和柯西金握手？虽然他事先知道该怎么回敬柯西金，但为了不出事，他还是用密电向霍查请示：如果遇上苏联总理怎么办？

霍查命令：不！

马尔科还转达了李先念的问题：恩维尔同志是否愿意于10月份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

地拉那又发出一个大字：不！

这是霍查对邀请柯西金去北京的反应。

柯西金和李先念在河内是否见了面、握了手，不得而知，但肯定未与马尔科握手。

柯西金在北京逗留期间发生了什么？霍查命令阿尔巴尼亚所有媒体绝对不予报道，就好像没有那么回事。霍查却掌握每一个细节。通过阿通社发给他的内参告诉他，周恩来总理用双手握着柯西金的手。霍查感到十分不快。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我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全球战略、向我索要援助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1971年7月到8月，霍查异乎寻常地在亚得里亚海滨的都拉斯避暑胜地呆了很长时间。他在准备定于当年11月召开的阿党“六大”报告。回到地拉那后，他继续写报告，几乎不公开露面。但是，3条机密消息从秋天起就扰乱了他需要的平静。这些消息使他十分不安，尤其是这些消息都是通过阿尔巴尼亚信使从北京紧急送来的。

第一条消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消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中国压根儿不再提他的名字，就好像他已不存在。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他的同行——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据他们说，林彪谋害毛泽东和企图发动政变未能得逞后，乘军用飞机逃跑，飞机起火，坠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无疑，他的飞行方向是苏联。

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消息。他一直等到

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

第三条消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得无法沉默。

当人们在北京证实关于“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突如其来的消息后，霍查于8月上旬，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上万言的长信，全面阐述了阿的立场，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说：“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因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起初，阿主要领导人对我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中国共产党搞机会主义，而且公然批判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章虽未点名，但目的很明显，就是试图公开挑起中阿论战。它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说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说“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就在中阿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新馆发现了窃听器。

1983年，我新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郝照明抵达地拉那。刚下飞机，前去迎接的阿外交部礼宾司长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讲，阿方已为中方修建了新馆，希望在3日内搬迁。我驻阿原使馆址靠近阿党中央和部长会议，阿方即使在两国关系好时也一

直对我起疑，担心我对它搞什么动作，老早就想把使馆迁走。根据原来的计划，新馆址在拉纳河北岸，与新华社分社、专家宿舍同在一个区域，以便于对中国人统一管理。新馆实际上已经建成，在当时的外国使馆中当属最大、最好的，但两国关系一坏就泡汤了，改做别用。

考虑到两国关系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尽快搬迁的情况，全馆人员于1984年内自行搬迁。自阿礼宾司司长提出要我搬迁馆舍之时起，我方就预感到阿方对新馆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脚，便请求国内派安全保密检查组来新馆进行检查。检查组人员在使馆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而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安全保密组的人员轮流作业，顺藤摸瓜，循着窃听缆线挖下去，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听状态。我驻外使领馆中发现这么多窃听装置，是罕见的。

邓小平叫停援阿

自那以后，阿尔巴尼亚不顾后果地日益恶化两国关系，反华调子日高，两国关系愈益紧张。国内有的同志认为，对阿宁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苏修那样，造成我对阿报复的印象；这在政治上对我有利。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党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我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1978年7月7日，即阿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正好一年，我公布了外交部照会。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阿采用各种手段，妄图压

我多给东西,快给东西。由于阿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双方的合作基础已被阿方破坏殆尽,迫使我再也无法履行协议。针对上述情况,我应抓紧时机,撤回专家,停止对阿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外交部协同各援阿职能部门,对停援和撤回工程技术人员的实施办法进行了周密安排。同时,对我撤回后阿的走向也做了估计,并制订了应对方案。

作为对中国外交部 1978 年 7 月 7 日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照会的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 1978 年 7 月 29 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即公开信)。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说邓小平 1978 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我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 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四人帮”倒台后的 4 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而阿通社的《内参》却做了充分及时的报道,转载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和文章,并在党内下发了通报、进行了传达。阿国朋友私下对我们说:“领导有指示,关于反映中国国内情况的外国电视节目可以看,但不许评论,更不能同中国人谈论。”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

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中国对阿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

(王洪起,新华社高级编辑,前驻地拉那分社兼驻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屋 2008 年第 10 期目录

- | | | |
|--------------|---|--|
| 书屋讲坛 | “国民劣根性”学说是怎样兴起的?
读《国民劣根性》学说是怎样兴起的》的一封信
黑马原来是黑狗
——评摩罗《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 | 摩 罗
邵 建
胡胜华 |
| 口述历史
流年碎影 | 张灏教授访谈录
无声润物 宠辱不惊——忆傅雷
纽约,胡适张爱玲相逢 1955
《梅隐杂文》中旧人旧事
谁是“国难会议”的首倡者?
饶汉祥大笔如椽 | 陈建华
盛禹九
姜异新
范 泓
董国强
王 力 |
| 灯下随笔 | 浮出水面
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
索尔仁尼琴的“市场效应”
为何西门大院内没好人
红太阳,法国造
——路易十四时代的多媒体宣传 | 景凯旋
林贤治
孙 涤
石定乐
施京吾 |
| 旧事新识 | “回忆,是靠不住的”
李苦禅的烟火日常
传统的命运——重读《汉书·艺文志》和
《隋书·经籍志》所想到的 | 留 白
钱红丽
阎 静 |
| 书屋品茗
裁书刀下 | 作为艺术、传说和历史的庵上石坊
时代的心灵痕迹与精神坐标
——写在《启蒙与革命》再版之际
走出新时期
——关于“新时期文学”的断想 | 一 名
张宝明
周景雷 |
| 前言后语 | “如果语言不能表达,就请化作歌声”
——葛崇岳译、著文集代序 | 李振声 |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 6 日出版 定价: 5.00 元
地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话: 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 0731-5790197
邮箱: nlh5314@263.net

1984 年胡耀邦中苏边境行

张持坚

1984年8月11日中午时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悄然出现在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边。

这条界江的两边，已然对峙了二十多年。

这里是军事前沿。苏联的炮舰就横陈在江的对岸。胡耀邦乘坐的直升飞机只能降落在离边境城市黑河还有几十公里的一片空地上。驱车一到黑河，顾不上一路颠簸，胡耀邦就匆匆来到黑龙江边。环顾黑河市，眺望一江之隔的苏联边城布拉格维申斯克，想着彼此二十多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冰封”局面，胡耀邦禁不住陷入了沉思：这里应该怎样打破僵局，怎样跟上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这里的人民应该怎样尽快富起来呢？

作为随行的新华社记者，我注视着总书记的举动和神情。

胡耀邦是从北戴河赶来的。时值盛夏，中央安排在一线工作的同志“半工作，半休息”。可他说“歇不下来”。他无时不在想着他的祖国和人民。警卫人员告诉我，他在北戴河躺在胶皮圈上一边划水，一边唱“我的中国心”。年前，他去了趟深圳，看到改革开放给这座边陲小镇带来的巨大变化，真是满心欢喜。然而，对比一片沉寂的北国边疆，又不免焦虑起来。多少年了，中央领导没有到那一带去过。他决定到那里走走。他深信，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定能消融黑龙江上那厚厚的冰层！

“突破口”

胡耀邦第一站来到黑河。在中苏边境绵延数



胡耀邦视察解放军边防某部八连

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是唯一两座隔江相望的城市。他选定这里作为“突破口”。

在江边，登上解放军边防某部八连高点观察哨，胡耀邦举起望远镜，仔细瞭望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高耸的电视发射塔、整齐的街道、新建的十几层的楼房、宽敞而又漂亮的广场，一一尽收眼底。他把望远镜转过来，看了一遍我国的黑河市，陈旧矮小的房子，狭窄的街道，看不到新的建筑。“不行，破破烂烂的，和人家比差远了！”他不由得摸了一把脸，说：“这里搞不好，脸上无光！”

黑河的同志告诉胡耀邦，五六十年代，两座城市的情况差不多，差距是60年代以后拉开的。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政府增加投资，把布拉戈维申斯克当做摆在中国面前的“橱窗”来建设。而我们，一方面是“文革”动乱耽误了，另一方面是担心中苏两国会打仗，总觉得一旦开火，黑河首当其冲，建设好了也没用。就这样，黑河的建设拖下来了。

当天晚上，胡耀邦和黑河地区的领导同志座谈，反复探讨怎样尽快改变黑河这个“窗口”的面貌。一张边境地图铺在地上，胡耀邦拿出眼镜戴上，蹲在地图前，边看边问黑河地区的情况，询问到对面参加过“会唔”的部队的同志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情况、苏方军队的情况和苏联中下层军官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等等。

长期的封闭，使这里成为“死胡同”，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然而这里又是“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第一线”，人们思想紧张，时时要保持警惕，事事要请示上面。经年累月，不仅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也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拘谨和保守。

胡耀邦边听边思考边发表见解。他明确地说：“中苏之间的仗打不起来。”他要求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放下这个包袱，想办法把建设的速度加快一点，“建设好了，仗就更打不起来了！”

他强调，两国人民之间要讲友谊，中下层的工作要放开手脚干，“越做工作，苏联人民就越怀念两国友好的时候，反之，越不做工作，感情上就越淡薄。”他问大家：是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做好呢，还是不放开好？大家都说：放开好。

怎样把建设搞得快一些，胡耀邦要求下放权力，不要统，要搞开放政策，聘请专家，发展专业户，开展边境贸易，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座谈持续到11点多钟。胡耀邦回屋后，灯光又亮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准备明天在黑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南有深圳，北有黑河”

第二天，8月12日，天气很好。早晨7点多钟，当地大约二百来名干部，聚集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前面放一排桌子，算做主席台。没有配话筒，以防对面苏联能接收到。胡耀邦坐下，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几行铅笔字。他微笑地望着大家，一开口说了八个字：“南有深圳，北有黑河。”会场一片寂静。谁也没想到，总书记一上来会把沉寂闭塞的黑河和热火朝天的深圳相提并论。他解释说，“这是我的一个题目。两个地方大体上意义差不多。”

停顿一下，他说：“来到这里，首先向为开拓

边疆、保卫边疆尽了力，做出过贡献的同志们问好和致敬！”

接着，他提了个问题：“我国和十二个国家为邻，那么我们的边境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环顾了一下会场，胡耀邦说：“守卫在边疆的同志，包括地方的干部、军队和公安的同志，应该明确我国与邻国关系的总的方针，归纳起来主要是四句话，三十二个字。第一句话，争取长期睦邻友好。不要打仗嘛。第二句话，坚决反对任何侵略。假使有人要来侵略我们，我们不怕，坚决斗争到底。第三句话，不要别国一寸土地。第四句话，不给别国一寸土地。”

胡耀邦把思路拉到眼前一江之隔的苏联——

从60年代开始，70年代，80年代，苏联领导者一直反对我们，有个时期好一阵子，但没根本好转。

他搞老子天下第一、搞老大哥，谁都要听他的，其实就是搞大国霸权主义……

当然，六七十年代我们有些对策也不十分妥当，有些事也不该那么做。比如，批评人家的对内政策。粉碎“四人帮”，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改过来了，因为我们讲不准，议论不好，就要犯主观主义和干涉人家内政的错误。

在中苏边境工作的同志，要拿出许多生动的理由来教育干部、群众，中苏之间仗打不起来。和邻国，我们的原则是争取同人家长期友好相处，这也包括苏联。

还有一个问题要区别开来，就是不能把苏联领导人错误的对外政策，同他下面的干部混为一谈，这不是一码事。他下面的干部有跟着错误政策走的，也有不少人怀疑的。上层斗，下层不要斗。人民之间要多讲友谊。

会场静静的，大家听得很认真，也很仔细。多少年来，中苏边境地区的人们盼的就是来自中央的新精神、新声音！

讲了三十二字方针后，胡耀邦设了一问：“边疆的同志怎样创造性地执行好这个方针呢？”

没等下面的同志回答，他“霍”地站了起来，打着手势，说道——

一，把经济搞上去。军队也要协助地方把经

济搞上去。黑河地区土地肥美,产粮多,木材多,条件很好。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明年怎么办,1990年怎么办,大家想办法,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同心协力干。把经济搞上去,国防、边防也就巩固了,和苏联和平友好的可能性就更增强了。

二,必须把黑河市建设好。近几年你们有成绩,工作辛苦了,我向你们鞠躬。但对黑河市现在的建设,我只能摇头,这是讲实话,讲真话。二十多年来,我们轻视这个地方了。改变这里的面貌,要求你们太急了办不到,但三年不行五年,总要变个面貌,不是一般地变,而是要敢于和对面比。现在深圳人扬眉吐气,没有人往香港跑,而是前些年跑过去的人往回跑。深圳人说:“回来可以,但要写个把检讨。”总之,你们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军队要出力,地方要出力,国家、中央、省上都要出力。把黑河这个地方搞好了,有国际意义。要办好我们这个“窗口”。

三,对苏联人民、苏联中下层干部,要有正确的态度,要解放思想,大胆工作,要讲友好。人民军队总是主张友好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存的。苏联是列宁的故乡,他们广大干部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党是有感情的,正如我们的广大干部、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对苏联有感情是一样的。要好好地讲清楚,从各方面来改进。对苏联领导人的错误政策我们要抵制,要反对,混进特务来捣乱要坚决查处,但对他们的干部、人民要好好地尊重,欢迎他们来参观,接待好,招待好,介绍好情况。这些工作要放开手来干。我总觉得我们现在不放手,太拘谨。我们的优势,第一是政策对头;第二是轻工业、农业生产比他们好得多。介绍情况嘛,热情欢迎嘛,热情接待嘛。这不会犯什么错误。相反,只会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情况,提高他们的辨别能力,究竟中国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还是他们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正发愁嘛,大豆、玉米积压严重,都拿出来嘛。他那里每年缺二三千万吨粮食,肉也缺,水果也缺,西瓜就更不消说了。所以要很快地准备,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他们地方干部要求同我们贸易的积极性就高。所以要好好地做工作,大方一些,大胆一些,出不了乱子。他们那边出了什么事,遭了什么灾,什么抢险啦,我们这边要主动过去帮助。总之,中苏友好关系从

下面搞起,这要当做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办。

最后,胡耀邦把话题又拉回到开头的八个字,又把黑河和深圳联了起来。他微笑地望着大家,说:“南有深圳,北有黑河,能不能比翼齐飞?”

安静的会场,一下子响起了一片兴奋的议论声。

“五年不行,八年行不行?”胡耀邦大声地问大家,“不要怕困难,把黑河建设好,有可能和南面的深圳媲美!”

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是发自中苏边境地区干部内心深处的掌声啊!

这些长期在中苏边境这一敏感地区工作的干部,思想上是背了一些包袱的。这里是“反修”第一线,不能出事,出点事就是大事,就是通天的……因此,他们处处谨慎,想的就是怎样维护好现状。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使黑河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里的气氛仍然是沉闷的,甚或是压抑的……

今天总书记给他们带来了清醒的风!

与会干部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爽快而又会心的笑容!

开放搞活 兴边富民

这以后的四天里,碰到下雨我们坐火车,天晴就乘直升飞机,昼夜兼程,沿着边境线到了伊春、同江、虎林、密山、绥芬河、牡丹江等县、市。紧靠乌苏里江边的抚远县闹水灾,车辆进不去,就乘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圈。中苏界湖兴凯湖是冒雨去的。胡耀邦还坐吉普车去了一趟乌苏里江畔的虎头镇。那儿离苏联边境小城伊曼市只有6公里。站在江岸可以看见苏方的建筑和火车的运行。途经地处边境地区的国营农场,胡耀邦和农场的领导同志作了交流。

自从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很少到这一带来视察工作。这次胡耀邦来考察,受到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座谈会上,大家向他反映了不少情况。

绥芬河是中苏边境上又一个重要口岸城市,它和苏联陆路相联。和它相对的是苏联沿海边区的格罗捷阔沃镇,两座城市有两条公路和一条铁

路相通,两个火车站相距 25 公里。

胡耀邦先是登上边防部队某部 605 高地上的观察哨所,了解边境地区的情况。随后和绥芬河领导座谈。绥芬河市委书记回顾了这座边境小城的兴衰史,得出了边境开放就“活”,发展就快,经济就繁荣的结论。他对胡耀邦说,1922 年绥芬河边境开放时,居民达五六万人,店铺有 250 家之多,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来这里做买卖,一度被称为“国际商业都市”。1933 年日本侵占绥芬河,实行封边闭关政策,国内外资本和居民纷纷转移,人口下降到两千多人,变成了闭塞的死镇。现在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但是,由于受中苏关系这个大背景的影响,绥芬河还没有活起来,没有繁荣起来。

边境的同志还向胡耀邦介绍了中苏边境贸易的历史沿革和现状。算年头的话,中苏两国边境贸易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和黑龙江省接壤的苏联远东地区,远离苏联中心区域,这里森林、矿藏等资源丰富,原材料工业比较发达,但农业和轻纺工业落后,不少日用品和食品供应短缺。而黑龙江省则与之相反,农业和轻纺工业比较发达,短缺的正是对方比较丰富的那些原材料。这就使双方成了十分理想的贸易伙伴。在贸易形式上,主要是简便易行的“以物易物”,即你用这堆东西来换我这堆东西,大家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贸易形式依然保持了下来。1958 年 5 月 12 日,两国贸易部长换文,达成广泛开展两国边境贸易的协议。随后,两国交通部又达成协议,规定在黑龙江、松花江、额尔古纳河、乌苏里江、兴凯湖上,两国的商船为了贸易和其他商务活动,可以互驶对方水域和港岸。这两个协议的实施,使边境贸易更趋活跃。然而 9 年后,到了 1968 年,根据中苏关系恶化的现状,双方销账,边境贸易往来就此中断。

胡耀邦听得很仔细,和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赞同“开放就活,封闭就死”的观点,赞同“把政治和生意分开”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和苏联除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外,要大力发展边境民间贸易。边境上成千上万的专业户,都可以搞对苏贸易。他要求绥芬河市的贸易公司主动行动,恢复和对方的边境贸易。他说,现在,我们的蔬菜、水果、饮料等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很多,和他

们以物易物,换回我们需要的东西。他强调,这件事你们自己定就是了,不要老是向上请示;和海关、边检打个招呼,让他们支持。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把什么都“把得死死的”。他几次提到,我们有些事没办好,就总怪天老爷,其实问题不在天老爷,而在官老爷,省里的官老爷,北京的官老爷。他还说,中央的规定不能太具体,中央只能规定一些大框框,你的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不结合实际可能抓不到点子上去,总之,中央的大框框必须结合你的具体特点,你们要有创造性。他讲到了江苏省长顾秀莲,说她有创造性,敢想敢干,她能干,你们也能干。他算了笔账后说,苏联远东地区三个州有 500 多万人口,要能做到每年同他做一千万吨的生意就好了,黑龙江的经济就活多了。

为了消除隔阂,营造融洽的气氛,胡耀邦希望边境的同志在同苏方交往中,要表现出大方、热情,多谈家常,多交心,多交朋友,不要板着脸做生意,不要以为只有板着面孔才是坚持原则,也不要直接谈政治,可以在谈生意中带政治。他说,多送点礼品没有关系,犯不了错误。他还指出,做生意要从长远利益出发,讲信誉,不要老想着占便宜。对苏方人员提出到我方人员家做客和邀请我方人员到他们家做客,我们不敢答应的问题,胡耀邦明确表示:有什么不敢答应的,这方面的思想要解放。他说,邓小平访问美国,到基辛格家做客,反映很好嘛。

胡耀邦对军队支持边贸和开展双边友好活动也提出了要求。他在多个场合讲到,边疆要保卫,警惕性要高,这是必须的,但也不要老是怀疑苏方人员一来就是搞情报的。现在双方往来太少,要多交往,要把友好交往的权放开。友谊比任何导弹的威力都大。

一路上,胡耀邦对改革分配制度、推行家庭农场、加强科研工作、发展粮食和木材深加工等,也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小平在南方画了一个圈,耀邦在北方画了一条线

和随行的黑龙江省委的领导同志一样,听了胡耀邦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讲话,我的心情很激

动,也很舒畅,如沐春风。我长期在黑龙江从事新闻工作,知道笼罩在冰冷的中苏关系阴影之下的边境地区,随处可见的是沉闷和贫穷的状况,也了解那里的干部群众思变、求富的迫切心情。我深感胡耀邦讲话的重要,也深感有责任把他的讲话传到北京的高层,以引起更多的中央领导对中苏边境地区改革开放的关注。我写了几篇内参发了出去。没想到,随行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委婉地批评了我“擅自行事”。事后我想,可能对胡耀邦的讲话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我深切地感到,胡耀邦讲



胡耀邦在黑河访问

出了边境人民的心里话,讲出了边境改革、开放和发展之道,对调动边境地区人民的积极性、改变这里的面貌和改善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必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作为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我应该也必须传播他的讲话精神。

至于公开报道,鉴于当时中苏边境还处在敏感时期,中央办公厅决定,对胡耀邦此行只发简单消息,有关中苏关系和边境开放等内容不公开宣传。8月17日,胡耀邦回到北京。18日,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我写的一条只有一个自然段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8月10日到16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陪同,到黑龙江省嫩江、黑河、伊春、密山、绥芬河、牡丹江等市县进行了视察。视察期间,胡耀邦同志就边防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同当地的地方和部队同志进行了座谈。他还到一些边防哨所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共计134个字。虽简短,但依然醒目,因为它来自神秘而又特殊的中苏边境地区。国内外许多报纸都将它刊登在第一版。它引起广泛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邻国苏联。

不久后的一天,中苏两国边防人员会晤。一见面,苏方军官就小声地试探着问:“你们总书记过来了,有什么指示?”

胡耀邦考察结束后,黑龙江边境地区迅速发生变化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受到极大鼓舞的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绥芬河、黑

河和同江三个口岸,首先邀请毗邻的苏方官员来访。绥芬河还主动送过去500多公斤西瓜,让苏联边区的“邻居”分享中国朋友西瓜丰收的喜悦。黑龙江省中苏友协也把苏联远东三个边区、州的政府领导请到哈尔滨,欢度我们的十一国庆节,安排参观考察,介绍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的情况……

一连串的“主动进攻”,使苏联边境地区的干部感到很诧异,“中国边境地区怎么说开放就开放了呢?”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在变,在积极而又蓬勃地向上;同时,感到自己被动了,意识到长期以来在“苏中对峙”状态下形成的“僵化”的观念不变不行了。和我国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一样,他们也同样怀念两边和平往来、贸易上互通有无的美好时代,尤其是看到中国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他们仍然在实行的凭“卡”配给那些有限的物资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他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向上反映中国边境的“最新情况”,要求改变政策,下放权力,和中方多来往,发展友谊,开展边境贸易。苏联上层显然受到了震动,急忙召开会议,改变政策,扭转被动局面。之后,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来到苏中边境一带视察,并在边境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讲话,提出可以在边境地区和中方合作,设立“联合企业特区”。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两边的步子终于渐渐地协调起来了。苏联《真理报》为此发表题为《在河的那边有伙伴》的长篇报道,形容两下转第46页)

一项改革建议的提出和采纳

陈 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怎样起步？这是面临的首要问题。1980年12月10日我写了篇《试论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因题目长达19个字，其核心内容是按企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不同，分类管理，抓大放小，被简称“抓大放小”、“分类管理”，亦被简称为“一个建议”。这份建议被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发改委主任马洪所赞同和采纳。现回忆之，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我写这篇文章纯属偶然，因我当时在四川大学经济系给研究生开经典著作课。当课程结束后，经过系办公室，看见系主任在给秘书交代，说因病不能去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让秘书去把会议上的论文带回来。我要求道：“您不去，我去行吗？”只有一个名额，你去就得带篇论文！”当天是1980年12月5日，距离12月15日开会还有10天。我说：“可以！”因为，我的观点已形成，只须查10年的经济数据。于12月10日交稿打印好，却得知会议延期，我随即将论文给了川大校报。谁知，被平时欢迎我的文章的川大校报退回，还特别声明说：“陈老师，此文没看，退给您！”显然是被文中的新观点吓坏了。因在当年，如出了事，除了作者挨整，编辑也受株连。回到家里，被老伴大声斥责：“讲讲课就行了，写什么建议？！前车之鉴还嫌少吗？！……”我只得作罢。但是，事又凑巧，次日，即1980年12月31日，四川省委党校请我给地级计委主任及副主任学习班讲课，当讲到“抓大放小”的建议时，竟然全场鼓掌，高呼“请送党中央！”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的爱国心使我瞒着丈夫，以便有难我一人承担。随手撕张过期日历，起草道：“紫阳总理”，连个“尊敬的”都未加，“我是川大经济系讲师，我国领导人有许多

智囊团提出各种不同的建议，供领导人参考。您日理万机，时间少，我利用业余时间，作了些调查，写成此文，仅供参考，但求无过而已，此致敬礼！陈力上1980.12.31”第二天，1981年元旦，我在信封上写上“北京，国务院，赵紫阳总理亲收，川大经济系陈力寄”。用挂号发出后，仍投入忙碌的工作中，忘了此事。因为，在我看来，我尽了一个群众关心国家大事之责，怎么可能奢望总理的回音？！即使被采纳，也是领导走群众路线好，没有必要告诉群众本人。至少我未听说过有国务院总理给群众写亲笔信肯定群众的建议的。谁知到了3月中旬的一天，经济系总支呼我去签收赵紫阳的亲笔回信，用传统的红色封条。“紫阳同志处”密封”，将信封的两头封上，编号是“北京机要通讯7563”，由内部邮局直接送到川大经济系党总支签收转交，信的全文如下：

陈力同志：

你的论文我已阅过。我认为你提出的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在改革初期阶段，更应该区别不同企业，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

你的论文，我将批给中央财经小组所属的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薛暮桥同志）进行讨论，讨论的意见可由他们告你。

近两个月，因我出外地两次，加上出国等原因，你的文章看的晚了，至今才给你复信，希谅！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三月六日

据总理的秘书任涛对我说：“总理从南斯拉夫回来的当天晚上看了您的论文，很高兴！立即给您写了这封回信。”

在“文革”中被造反派乱批乱斗打成臭老九的同事们，看了总理的信后，确认是他的亲笔。因

陈力同志：
你的论文我已读过。我认为你提出的几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在改革初期阶段，更应该区别不同企业，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你的论文，我将批给中央财经小组所属的经济研究所

中心（负责人薛暮桥同志）进行讨论，讨论的意见可由他们告知。

近两个月，因外出外地两次，加以出国在原因，你的文章看的晚了，至今才给你复信，敬请，此致
敬礼
赵紫阳

赵紫阳回信

说：“请她作主题发言。”我上台后，马洪小声对我说：“讲20分钟。”我看了一下表，就开讲了，不多不少正好20分钟讲完。大会结束后，马洪立即见我，说：“你的建议，紫阳同志很欣赏，你的工作有何考虑？……”我这人钻研点问题还可以，在人与人关系上不行，竟立即拒绝道：“还是在基层，搞点调查研究方便些。”堵得马洪半天说不出话，停了一下，他问了我的简历。事后，我很恨自己不会说话，肯定得罪了马洪。但是，他宽宏大量，仍邀我同游都江堰，在鱼嘴上，马洪请中国社

他当过四川省委书记，很多人认识他的笔迹)，并感到欣慰，能用书信方式肯定一个普通臭老九的成果，这是承认“知识产权”啊，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科院工程所副所长吴家骏给我们照了张相（当时，大家都很穷，我们都没有相机）。现在，令我敬爱的马洪主任已过世，这张相片更珍贵了。

果然，中央财经小组所属的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两次讨论。第二次参加的人更多，我在成都接到许多来信，第一封信竟是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老系主任、国务院博士点评审组组长宋涛教授。我在读三年制（1952年—1955年）研究生时，他亲自教过我，在分配工作时，他曾打算分配我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他得知经济研究中心组织两次讨论的论文作者竟是陈力，作为老师能不高兴吗？！几乎同时收到同窗好友吴树青（后来任北大校长）来信说：“这么多年来不知您到哪里去了！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宋涛老师在我们面前夸您有见地，能研究问题。”苏星（红旗杂志副主编）、肖秧（北京市经委主任）、徐禾（人大经济系老副主任）、胡钧（人大经济系老教授）等均来了赞同信。

在1981年4月16日成都开会期间，国务院来的同志（恕我忘了他的姓名）在紫阳总理亲民形象的影响下，对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均十分热情，竟然主动替我们抄来紫阳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讨论的情况，供我们学习研究，现抄录于下：

关于体制改革问题座谈会的纪录稿

主持人：赵紫阳

参加人：杜星垣、袁宝华、薛暮桥、马洪、廖季立、刘明夫、吕培俭、顾明、刘毅、费开龙、李飞、许纲、田纪云、刘卓甫

时间：1981年3月18日下午3:00—6:10

1981年4月16日，原定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改在成都召开。我正打听能否去旁听，却接到国务院作为特邀代表的电话通知。当我刚进锦江宾馆的大门时，即有人向站在会议大厅门前的任涛同志（紫阳的秘书）说：“这位就是陈力同志！”他吃惊地说：“原来您是女同志！今年三十多岁吧？”我说：“我今年50岁”。大会一开始，马洪同志在台上当：“陈力同志来了没有？”我起身致意后，他

紫阳：……四川陈力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我看很有道理，我批了至少在目前可以采纳。……陈力同志把企业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固定资产很多，产品单一，不搞扩权、自负盈亏，因为这些企业不能依靠自己扩大再生产，如大庆、川化，不能让他们自己再搞一套石油、化工设备，对这些企业更宜于计划指导，不搞所得税。第二种，是中等企业，要坚持简单再生产，同时还要搞设备更新，可以拥有部分扩大再生产的权力。这部分企业也不能搞自负盈亏。第三，固定资产小，产品复杂，情况变化大，是小企业，可以通过搞自负盈亏解决许多问题。要把扩权试点企业分三种情况。我看在改革的初期，这种办法可以行得通，也能办得好一点。就是说，对不同的企业采取不同的

办法,对少数大中型企业实行计划控制,对大量小企业,国家计划不能包罗万象,让他们自负盈亏……从1956年开始,我们就习惯于对大、中、小企业大包大揽那一套,要改变过去的企业试点,转为小企业试点……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紫阳总理吸收各方意见,最后做出决定,反映在当年11月31日—12月1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付诸实施。紫阳总理很谦虚地说:

“我们设想,根据企业在国计民生中所占地位的不同,根据企业所有制的不同,根据企业产品的重要性和种类、规格的多少不同,可以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大体上有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的。这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企业或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他们的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大部分,但品种不是很多。二是按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生产的。这是品种繁多的小商品,分散在许多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中生产,不可能也不便于统一计划管理,它们的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小部分。在这两大类之间,还有两类产品和企业。一类是大部分按国家计划生产,小部分由企业自行组织生产,这一类基本上接近前一大类,但又有所不同;另一类是大部分由企业按照市场变化组织生产,小部分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这一类基本上接近后一大类,但也有所不同。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那种统得过死的体制,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它可以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提高经济效益,按照社会需要组织和发展生产。”

实施到1985年10月,拙文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优秀论文一起,被国家教委编入《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选编》第一辑第74—83页。

五年后的1986年马洪还亲笔写了证明信,肯定我的工作。全文如下:

四川大学经济系负责同志:

一九八一年底你系陈力同志曾写过一篇《试论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的文章,提出将全民所有制企业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区别对待,采取不同

的经营管理办法。这篇文章受到赵紫阳总理的重视,曾在几次会议上,当讨论到改革问题,提到过陈力同志的观点,认为她的观点有道理,应当采纳。

一九八一年四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期间,我在大会上介绍过陈力同志的观点,和赵紫阳总理对陈力同志文章的重视。

我同样认为,陈力同志当时能够写出那样的文章是很有见地的。

谨此证明。

马洪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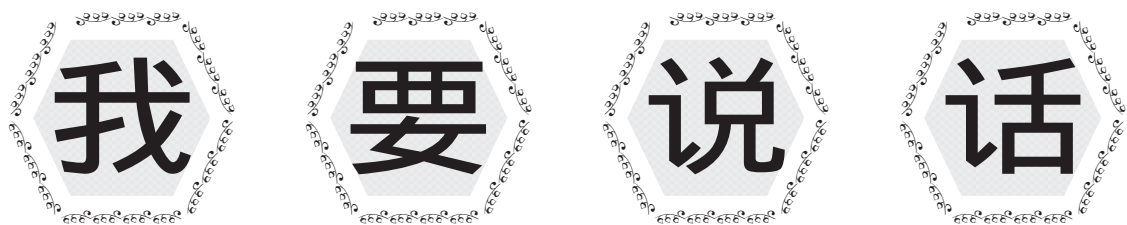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经济学动态》1986年10期再予肯定: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诸问题中,可以说所有制的改革是最为艰深的课题。尤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这是所有制改革的重点,采取什么思路关系极大。

1981年四川大学的陈力在一份建议中提出,我国全民所有制的各种企业,情况、条件极不相同,采用一刀切的统一的经营管理办法、统一的分配制度,矛盾很多,不利于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难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且也影响宏观经济中积累和消费之间计划比例的实现,影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他主张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划分不同类型,区别对待,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这就是分类管理的基本思想。

1981年,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城市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陈力的建议是很有建树的,他提出了改革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新思路,这对推动整个改革具有一定的意义。

回顾建国以来前后各30年,我国从票证满天飞到令世界吃惊地和平崛起,除了邓小平拨乱反正的功劳外,在经济上如何正确起步?赵紫阳总理及马洪主任功不可没!至于我,一个微不足道的“臭老九”,写了一篇“没人敢看”更“无处可发表的‘废物’”,只有在紫阳、马洪这样的领导下,才能变“废”为宝!令我非常感激!非常佩服。特如实记录下来,以告慰二位在天之灵,并以此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责任编辑 杨继绳)



——纪念母亲郑德芳

蒋燕燕

妈妈于2008年3月5日晚9点38分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在医院里，妈妈因肺部感染呼吸困难被戴上了呼吸机，还用胶布封住了嘴。妈妈在纸上写：“我要说话，快把管子拔下来，来不及了。”她有些字写得擦在一起看不清楚，她又用另一张纸写上“我要说话”。她当时头脑清楚，明白撤掉呼吸机就等于放弃生命。蓉蓉姐姐对妈妈说，拿掉呼吸机，你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新新哥哥说，不！是去见爸爸！妈妈瞪大了眼睛，激烈地点头。我们根据妈妈的意愿，请求医生撤掉了呼吸机，但是妈妈没有来得及说话就离开了我们。

妈妈喜欢说话。临终前一天早上，我到医院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是：“我早晨3点半以后就没睡着觉，一直在瞎想。我想文化界应该有一个领军的人物，比如鲁迅，可以把握文化方向，宣扬民主自由，引领文化起到更大的作用；大学校长是蔡元培，学校充满自由、民主的良好风气，培养独立思考，有创造性的学生……”她边说边气喘，脸皮发烧似的泛着红晕，我马上制止她：“你喘得太厉害，少说点儿话，说这些也没用，不可能实现。”我知道没用，只是想着好玩儿。你听我说嘛，从小学起就要人人都能上学，从小就受到民主、自由、平等的教育，了解人的基本权利是什么……”妈妈又在讲演，气喘嘘嘘，同病房的人都静静地听她讲她的梦想，直到医生来查房。

妈妈九十一岁，一点儿也不糊涂，关心时政，喜欢看书，思想活跃，对什么事都有独到的看法。我每周回家，总是要跟我说她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有时阿姨不在，我得干些家务，她就不高兴，说：“坐下来好好跟我说说话，别干活。”她把我看

到的有兴趣的文章——无论是报纸上的，杂志上的，书上的，还是朋友送来的，她都做上记号，专门留着给我看；还要议论，发表她的看法。

妈妈喜欢请朋友们到家里来聊天。朋友们来，她总要准备好茶，一些小吃，有好菜时还要留朋友在家里吃饭。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在一起，政治生活，经济文化、天南地北，大道小道，过去现在未来，无所顾及，全聊。妈妈每次都很兴奋，每次又都很疲倦。然后把听来的各种新闻一一说给我听。

在我眼里，妈妈开明开朗宽容豁达，事事想得开。她虽然生活经历曲折，受过很多苦，但她只记得那些帮助过她的好人和发生过的有趣的事，几乎没听到过她抱怨或诉苦。这使我们对她所经受的苦难知之甚少。妈妈去世后，整理她的东西，看到她在10年前（那年她八十一岁）写的《右派生涯五记》，才多少了解了一些她的右派及文革时期的经历。《右派生涯五记》写得比较简单，有些方面缺少细节，还有些调侃的味道。可能事情过了40年，有些言论、感受、痛苦、屈辱、激烈的情绪、片刻的平静，都已经忘却了，淡化了，不太在意了，只记下了一些事件的过程。遗憾的是我们当时都在上班，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没有跟妈妈详细地谈论过那些事情的细节，深入地了解她在那些非常时期的真实感受。我们更多的是在生活上照顾她，还经常劝她，少谈些主义，多注意身体。

过去我们认为妈妈被划成右派，就是因为说话，言多必失，错就错在一张嘴上。我看了这篇文章，对她有了新的认识。妈妈是个本分，正统，没有城府，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在1957年之前，



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新闻记者（右前侧身女士为郑德芳，高个子戴眼镜的是李炳泉，郑德芳后面是曾建辉）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当时妈妈在会议现场编写稿件，可想而知工作难度之大，但是“心情舒畅”。

另外在新闻界也有新气象，例如，当年北京电车公司试行职工代表大会，据说是南斯拉夫的工作经验。因是工会工作的新鲜事物，经过电车公司党委同意，对外部派了记者采访。妈妈对这样的新鲜报道“毫不犹豫就签发了”。由于外电转载，引起“上面”的注意，结果受了批评，搞得妈妈“更加心烦意乱”。对这件事情后来又说“不再追究了”。

形势在不断变化。1956年9月召开八大提出双百方针，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到12月份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重点又有所改变，突出反对修正主义。1957年2月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妈妈听到了传达，印象深刻。“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强调学术、文艺的自由创作和讨论；是非对错由实践来解决，或者待时间来解决，再不会有什么人以绝对真理的界定人自居。这篇讲话不仅是妈妈听了欢欣鼓舞，全国各界人士都认为一个民主光明的时代就要来了。但是，两个月以后，1957年4月份开始整风。

她是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对外报道的业务工作由她负责。她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感到“心烦意乱”。源出于“在我所做的对外报道上，搞得很糟。糟在宣传多，新闻少，对自己的百姓下诏，对外国读者就不行”；“我部的英、美专家以及友好人士如格林、韩素音都表示过我们的对外报道需要大大改进”；“对外报道大部分稿件是由对内稿改写的，其难处可想而知。我部有个英国专家是个有经验的记者，因此对我们直言批评，对我颇有压力”。（郑德芳《右派生涯五记》）妈妈一心想把工作搞好，但当时对外报道受到很多限制，以苏联宣传为模式，条条框框很多。工作搞得糟，又有压力，所以心烦意乱。

妈妈作为对外部中共八大（1956年9月召开）报道组的一员，报道党的八大，“相当喜欢”。“希望我党从苏共二十大汲取教训，能开民主化的先河，走出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八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

自由创作和讨论；是非对错由实践来解决，或者待时间来解决，再不会有什么人以绝对真理的界定人自居。这篇讲话不仅是妈妈听了欢欣鼓舞，全国各界人士都认为一个民主光明的时代就要来了。但是，两个月以后，1957年4月份开始整风。

整风，妈妈作为党员不得不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当时她也是反右领导小组成员，要有明确的态度。她不相信通过运动这种形式能改进日常工作。于是就说些“虚”的，“远”的。主要有：一、新闻与宣传不分。新闻为读者服务就要客观，新闻要像新闻，要有新鲜事实，要叙述清楚，有根有据，而且要快；记者要平等待人，切忌居高临下地教训外国读者；扩大报道面，其中应有天灾、事故性的报道，这是世界性的，哪个国家都有。二、选人大代表候选人从不与选民见面，不知道他能为选民做什么。三、人权问题：在“三反五反”肃反”时，没收认为有错误人员的出入证，关在机关里搞逼供信，还打人，是侵犯人权。妈妈大概记得有这三条言论，行为是那件原本说“不再追究”的，

签发有关职工代表大会稿件的事。这样既有右派言论又有右派行为，在 1958 年初被划成右派。

原以为反映问题“远而虚”不会得罪人，提意见也是为了改进工作和改进工作作风，由此划成了右派，妈妈感到奇耻大辱，被“打了一闷棍”，像踩了“地雷”，被炸得面目全非。地位由共产党的中层领导，成为“非人”，还要牵累家人。这下惊吓不小，一时竟难以转过弯来。

反右时，我八九岁，在上小学，住在机关大院里，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还有印象。宣传中说右派分子是一些要“推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磨刀霍霍”要“杀共产党的头”的“妖魔鬼怪”。我不明白一向待人温和工作忙碌的妈妈为什么与他们为伍？妈妈划成右派，我有时会被一起玩的小朋友骂“臭右派的孩子”，感到抬不起头。新新知道有些小孩儿欺侮我，怒不可遏地抄起木棍冲向他们，但又觉得无可奈何，只得放弃冲动。上中学时，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对“时事”有些与宣传不一样的看法，又由于好奇我们偷偷去了教堂，就在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当做“问题学生”。班主任老师说我，“你是不是像你妈呀？”意思是满脑袋右派思想，使我惊讶和紧张。

多年以后，妈妈的老同事告诉我们，说妈妈是个敢讲真话的人。后来看了许多有关右派的文章，知道他们就是因为讲了真话，才被打成右派。

妈妈划成右派后，送去劳动改造。妈妈从来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刚开始劳动肯定是吃了不少苦。1958 年下半年开始修建十三陵水库，这是一个完全用人力修建的水库。妈妈是修建水库的十几万人之一，不过她是被改造对象，待遇不同。劳动主要是挑沙石，每天要挑着担子走四五十里，加上从住处到工地来回路上的十六里，“累得够呛”。碰上掌锹人知道他们是右派分子，要表现自己的立场，妈妈的担子还要加码。她从来不说在劳改时受的苦，常说在柏各庄劳改农场能吃到小站米，生活还可以。三年困难时期，妈妈从劳改的地方回家，人又黑又瘦，还浮肿，为此补发了黄豆。受苦的事她从来不说。

新新提起 1962 年他即将初中毕业，妈妈到育才学校参加家长会，他说：在众多家长中，妈妈是那样扎眼，衣着简朴，面孔黝黑，头发灰白。我觉得自己特别难堪，因为妈妈是从劳改农场回来

的。可是没有想到，同学的家长里面有跟妈妈认识的，见了妈妈又搂又抱，嘘寒问暖，很是亲热，根本不在乎她现在的身份。我很惊讶。之后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还跟我说，你妈妈真是个好人的，还很有水平呢。我听了非常感动，也为自己对妈妈的态度感到愧疚。

妈妈由“说”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戴就是 20 年。尽管在 1962 年妈妈已经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社会上还称他们为“摘帽右派”，除了不再劳动改造，所有的处分还都背着，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戴着这顶帽子，随时都有被批被整的可能。更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看到别人被批斗，受皮肉苦，一向达观的妈妈，也不免害怕，紧张。文革又使妈妈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的“右”变成了“现行反革命”。

1966 年是最疯狂的“红色暴力”年。那一年，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女生打死。卞仲耘是妈妈的老朋友，她们在延安时就认识。随之北京市 1700 多位中小学校的老师校长被他们的学生打死。1967 年是全国大规模打派仗的武斗年。妈妈在行动上受到限制，“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尽管派性斗争很严重，但她没参与，也勉强过去了。1968 年，妈妈被她的小学同学出卖了。从心里，我并不恨那位阿姨，她原本就是一个胆子很小的知识分子，根本承受不了“红色恐怖”带来的威胁。怪只怪妈妈因“说”得祸。妈妈划成右派后，有些老朋友就不再来往，新交的多半是右派朋友，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时期是不能随便来往的，所以心里有话就和这位既不左也不右的朋友说了。那个时代，没有“出卖”这个词，只有“对组织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人们道德缺失，几乎没有朋友，不敢交朋友，甚至有可能被自己最亲的爱人、家人“出卖”。

妈妈不知道被人“揭发”后如何“蒙混”过关，也记不起跟别人到底说了些什么。她带着忧思，怀着满腔的积怨，不计后果，彻底坦白了她想说的话。妈妈说“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只有武化”，说了对当时敏感人物——江青、陈伯达、康生、林彪、毛泽东……的看法。

妈妈成了“现行反革命”。她说自己是幸运的，没有触及皮肉。因为军代表说，妈妈的言论极度“反动”，不能在批判时进行扩散，所以不开批

判会。妈妈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去了河南明港干校。我们后来跟妈妈谈起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不解，为什么那个军代表没有把她送上批判台，妈妈说，“那个人也许是个好人，有点儿水平。总之我没有受罪。”

因为反革命的身份，妈妈和我们子女没有任何联系。在我插队期间从1968年到1973年，从来没给妈妈写过信，甚至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弟弟东东在插队时给妈妈写过一封信，寄到新华社外训班。信转到爸爸手里，姐姐给他回信说不要再跟妈妈联系了，没有说明原因。妈妈一个人在干校，唯一的联系就是外婆。妈妈的文章中对干校生活写得很简单：“不能回北京”；和一些“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在一起劳动，“劳动不比修十三陵水库更累”；“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我未被批斗，因为任何一点交代都会成为扩散‘反动’言论”。

妈妈不大记得那些痛苦的事，只记得那些好事和那些帮助过她的人。妈妈曾跟我说，在干校她干不了重活，就派她看田，有些农家的小孩儿到田里捉鱼摸虾，她就送给他们一些空罐头盒，小孩子们帮她干农活。林彪1971年“九·一三”摔死在温都尔汗，是一位和妈妈素昧平生的青年教师告诉她的，“有一天休假，她约我去镇上，路上她告诉我这一爆炸性新闻。她还告诉我北京已经在卖四大古典名著，说她一直在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法文本，我说我也在读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我们在镇上小馆里吃了炒猪肝。我们的交往仅此一次，以后也不敢再来往，现在我仍很想念她。”妈妈和那些有问题的学生“结成了忘年交”，直到“文革”结束，至今仍有来往；离开茶淀农场那天，“下着雨，我的小伙伴们为我推车把大箱子送上大轿车，还为我占了座位。我想有朋友真好，似乎五七战士就没有这样的友情。”

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对妈妈更加孝顺，经常去看望她，而且顺从她的意愿。现在回想起来，在妈妈最困难最需要我们安慰和支持的时候，我们几乎和她断绝了联系，没有给她更多的关爱，甚至不去了解和理解她，不知那些艰难的岁月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妈妈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从来不提我们离她远去。她最大的担心是牵累爸爸和我们。“文革”期间，姐姐回家看望父母，

要一起拍照留念，爸爸和妈妈都表示拒绝。

“文革”结束了，右派改正了。人们期待着一个真正平等、民主、自由的社会到来。妈妈从新华社调到《中国日报》，姐姐至今清楚地记得近七十岁的她，为了捡起那荒废的业务，半夜里仍在拼命工作。

在胡耀邦的领导下，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妈妈在《中国日报》痛痛快快地工作了五年，这五年是她最满意最开心最符合她的意愿的。她说他们那时是“右派办报”。报社的领导大多是“改正右派”。他们不再把宣传当做“新闻”，不再把国内的消息翻译成英文，而是让所有的记者自己采访，自己用英文直接写作，而且是用外国人看得懂的英文写作，没有禁忌，没有说教。这样就大大提高了《中国日报》在国内外的影响，同时也大大宣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可惜年龄使她没有干得更多。

这几年与妈妈的接触多了，对妈妈的经历有了较多的了解。我的外公是个自由职业者，是擦笔画第一人，画月份牌和广告画，当时在民间颇有名气。外公思想开通，有个性，虽然是靠画画维持生活，但也“不为五斗米折腰”，既不趋附权贵，也不为钱作假。家庭氛围比较自由，又宠爱妈妈。因为外公的身份和收入，使得妈妈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一直在上海最好的教会学校中西女中上学，受到西方教育。中西女中是富家子女的学校，她说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后来参加革命的寥寥。高中毕业后，当时家境不太好，妈妈就在学校任职员，准备自己挣钱上大学。在学校的图书馆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和有关苏联的书，因为想了解更多地了解苏联去学习俄语。在此期间认识了爸爸和一些进步人士，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抗日，为了向往苏联的美好，向往国家的民主自由，抛弃了上海的生活，与爸爸一同从南京转到西安，又从西安徒步走到延安，在193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

妈妈在成为“摘帽右派”劳改结束后，调回新华社外训班教英文。这期间，妈妈看了一些反对极权主义的“内部”书，对她有极深的影响，“使我对‘异端’改变了态度，不必怕之如触电。一则是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二则是不接触‘异端’

就不免闭目塞听。封闭得久了，就会夜郎自大起来，肯定落后挨打”，“好在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封闭”，“走向了原本以为应该是千疮百孔的‘垂死世界’，却发现它原来是多元的世界，既不全好，也非全坏。而且在我们忙于运动群众，干了罄竹难书的恶事、蠢事之时，外面的世界却有了飞速的发展。”

人，可能最难改变的是思想。思想与生俱来，与性格、遗传、本质有关，又在所处的环境、社会、教育、群体中逐渐固化，形成明确的带有个性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怎么可能通过简单劳动或在统一的洗脑下改变呢？就像人类不能改造动物的本能，不能征服大自然，不能制造一个同样的太阳，也不能使千百万人只有一个思想。

妈妈有一次跟我聊天，说她这辈子有几件事情值得庆幸，我把她的话记了下来：

我庆幸

1. 我庆幸生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人的集中地。

2. 我庆幸在上海中西女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3. 我庆幸在上海遇到了我的丈夫蒋齐生，一个勤奋而有才能的进步青年。（注：蒋齐生1997年去世，享年八十岁。新华社摄影部新闻摄影理论研究员，离休后为创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尽心尽力，对中国新闻摄影理论颇有建树）

4. 我庆幸在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那是一个积极抗日，为争取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富强国家而奋斗的政党。

5. 我庆幸在一九五七年当了右派，没有资格参加大炼钢铁，没有资格参与大跃进的过激过火



1962年6月6日作者生日同全家在新华社总社四号楼门口（左起：作者的爸爸、作者、新新、东东、郑德芳、蓉蓉姐姐。这时郑在新华社外训班工作）

的破坏行为。

6. 我庆幸在文革期间我已是“死老虎”，不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可以全身而退。

7. 我庆幸文革结束后，到中国日报社痛痛快快地干了五年，直至离休。那个时期胡耀邦是总书记。

8. 我庆幸离休后，跟着蒋齐生到全国各地，看到他为事业而奋斗，并得到众多的有识之士的支持和认可。看到当时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

9. 我庆幸从“八九风波”之后，对中国风雨苍茫的几十年有所警悟和关注。从此关注时政，主张民主自由，在九十岁时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妈妈走了，带着她不屈的自由的灵魂，到了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说话，自由地做事，无所顾及的地方去了；那里有她想要的一切：没有专制、没有空谈，真正的民主自由独立平等。那个地方在哪儿？就在大海的前方，太阳从那里升起，给地球给人类给所有的物种带来光明。人们与黑暗斗争，与狂风暴雨搏击，用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的时间去努力去寻找去拼搏去奋斗，一直朝着那个方向前进，那个看得见走不到又充满希望的地方——地平线。（责任编辑 李晨）

回忆父亲胡耀邦对我的教诲

——从一封家信谈起

胡德平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1983年9月，给我授过课的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送给我他的一本新著——《岳飞传》。他对历史编撰的两种倾向有一评论：官史偏于溢恶，家史偏于溢美。此话用在岳飞身上十分公正。它的普遍意义，则提醒人们书写历史一定要真实客观。

陈模同志为先父胡耀邦写的专著，用了七年时间。他是团中央的老同志，最后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他执意反映父亲生平的拳拳之心和笔耕不辍的辛勤劳动，让我感动不已。他嘱我写点感想，我就试试吧。请读者随时指出我的溢美不实之处。

1971年9月29日，远在河南潢川团中央干校劳动的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谈了很多问题，其中重点谈了我国的农业问题。他先从不久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对遵化县机械化的报道谈起，接着娓娓谈到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历史，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农业，最后他讲述了他对我国农业今后发展的设想：

- (一) 要依靠两个积极性……
- (二) 实行社县自办中小型工业……
- (三) 全面规划，逐步施行……

(四) 国家工业进一步面向农业，为农业提供大量廉价的技术力量……

如果一个全面的农业技术改造计划实现了，那真是农村一切面貌都大大变样了，什么耕地不够，什么低产作物，什么穿、吃、用困难，什么各种灾害，什么就业门路不够，什么农业劳动太苦太累，什么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医疗已些注：原文如此)难以开展一系列问题，都会起根本的变化。

当时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一名

“五七”战士，即便如此，他仍是一个“特殊人物”。在干校，他作为五级高干三百多元的工资已如数照发。一位朴实的农民，特意从几十里外的家中跑来看他，想看看一个月薪三百多元的干部，究竟是个什么样；拿这么多的工资，为何还要干农活；他究竟和常人有何不同？这时他虽然已不能发号召，作指示，也无一群人围着他，对他的讲话作记录，但他仍在信中对我们这代青年人提出他的鼓励、希望和要求：

这的确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艰巨而伟大的工程，你们这些青年人能不动心吗？！

以我当时的觉悟，实在达不到父亲的要求。那时，轰轰烈烈政治运动的后面就是无数家庭凄惨悲痛的灾难，公开场合下的表态、强作欢颜的背后就是一幅愁眉不展的哭脸，谁还会想到农业，农业的机械化，更不要说什么耕地够不够，就业门路了。这是当时中国的一种现实。还有一种情况，随着文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完没了地继续，人们开始怀疑了，厌烦了！嬉笑怒骂情绪下的调侃话语悄悄出现了，当时虽不敢对文革公开指责怒骂，但嬉笑怒骂自己的生活现况总可以吧；互相开玩笑，在对方身上取乐子总管不着吧？父亲就给我讲过，在干校只要谁出一个偏离正轨的歪点子，谁说一句不明显犯忌的俏皮话，就有人学着《地道战》中的汉奸汤司令，把大拇指一翘，脑袋一晃，说声“高！实在是高！”引出周围一片哄笑，但父亲从来不笑，总显得非常特别，和随波逐流的潮流格格不入。父亲理解同情干校中人们的心情和情绪的发泄，同时他也深感痛心和悲哀，难道这就是文革前团中央机关干部追求的趣味和形象吗？

父亲写信的刹那，似乎想到以上两种情况，他关心他的四个孩子和他们的妈妈这时在想些什么，生活怎样？母亲的坚强他十分清楚且自信，父亲一直认为母亲的经历太简单了，“她能有什么问题？”倒是对孩子们能否接受他的思想有不少担心。他写道：

我长篇大论同你谈这个问题，你可能大吃一惊。因为他同你现在的位置，地位风马牛不相及。我不这么想。一个青年如果只埋头自己的业务那就太可悲了。应该把踏实的日常工作和广阔的政治视野结合起来，把自己细小的贡献和国家伟大前程连结起来。古今中外，多少革命家、发明家、科学家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不大多数都是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善于开动机器吗？

当时我虽然惊叹赞美父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也不相信今日的中国会永远是这个“德性”，但归根到底，还是离父亲的要求太远太远了。父亲所以给我回信，是因为我先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虽然也写了些自己的豪言壮语，独特想法，想以儿子的身

份感染他，但最终还是想给他传递一些小道消息——“谁不能用了，谁只能做一般工作了”。父亲的回信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并且正色告诉我，对此类事，“值不得多大高兴，更不应该津津乐道。”

他对农业的考察和思考，六年以后为迎接、推动我国农村改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年的深秋，他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我们事先已得到消息，后门的门铃一响，外婆和我兴冲冲、急匆匆地奔向门口，打开小门。父亲和随行的一位同志站在门外。我记得太清楚了，父亲理了一个平头，脸色微黑，他离开军队已经很久很久，似乎有意学着军人坐立行走的模样，站得很正、很直。“爸爸……”心头一热，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他看了我一眼，很快转头面向外婆，晃了晃肩膀，仿佛事先有准备似的，他一板一眼地说道：“外婆！我回来了！”父亲一段跨越五个年头的家居生活就此开始。

（此文为陈模著《胡耀邦传》一书的前言）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共青团中央主管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

中华儿女



邮局汇款请寄：

地址：北京东城区北新桥板桥南巷7号
中华儿女报刊社出版发行部
邮编：100007
联系电话：(010) 64034905 84036397

银行汇款请寄：

户名：中华儿女报刊社
开户行：北京银行安定门支行
账号：01090369200120111002294

欢迎订阅 2009 年《中华儿女》

浓墨重彩高端人士各界精英 生动展现非凡人生成功秘笈

“万岁”故事

雷颐

在乍暖还寒的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在全国上下早已响彻云霄,终在“文革”十年达到狂热顶点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虽正缓息,但余音未尽,“声”犹在耳,此时历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发表了《“万岁”考》一文,对“万岁”一词追根溯源。此文虽引经据典,却毫无所谓“方巾气”;所指紧扣现实,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这篇文章不长,却是功力、学识与才情兼具的佳作,而作者的胆识和勇气则更令人钦佩。当然,不是“过来人”恐怕很难想像当年发表这篇短文所冒风险之巨,大概也很难理解为何如此一篇短文彼时竟能引起那样的“轰动效应”。

“万岁”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据王先生考证,在汉武帝之前“万岁”字眼虽也常从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却不是帝王的专称。是汉武帝巡幸嵩山和芝罘山时,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万岁”始成封建帝王的专称。不过,皇帝“称万岁之制”及相应的“大不敬律”却不载历代律法条文,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来的。“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更厉害百倍”,偶有“大不敬者”,自是“严惩不贷”。百姓当然深晓此中利害,“甚至供上一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所谓耿耿忠心,就是明证”。

—

及至辛亥军兴,共和肇建,“万岁倒地”。

1947年,著名作家张爱玲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文华影业公司将其拍成电影上映。这部讲述小市民生活的喜剧,初映即大获成功,赢得了票房的肯定。小市民男男女女的庸俗生活,竟然也可冠以“万岁”;“万岁”已失去其“神圣性”。

不过,喊了两千年的“万岁”毕竟传统悠久,影响仍大,并不会轻易绝迹,所以数十年后才又复燃。当然,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此即“新儒家”所谓“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欤?这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又带来何种后果?在在均令人反复琢磨。

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雪峰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1998年第4期回忆说,1966年4月“第二杭州会议”(亦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彭真受到点名批判。会后,由他与宋任穷将彭“押送”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正式通知由他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在5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代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尽管是他第一个喊‘万岁’,但此时无济于事,终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

不知彭真这第一声“万岁”是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喊出的,他很可能不会想到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这“第一声”为何能迅速传播开去,引起强烈共鸣,不仅持续数十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达到全民必喊,甚至一天数次的程度,否则就是“忠不忠”的态度、立场问题,直接关系到身家性命;而且,如此重要之事却也是“不成文法”;且比许多“成文法”更加“厉害”……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看来彭真后来深知此中利害,所以在遭到陷害的最后时刻,只能以历史上是

他最先喊“万岁”来辩诬，表明自己的忠诚，证明自己的无辜。

被拿来为“文革”祭旗的老共产党员邓拓，1966年5月17日夜以死解脱之前，在给“组织”的遗书中写道：“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1968年年末，中央专案组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逼迫“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判、打倒的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交代所谓刘少奇勾结国民党CC派特务“阴谋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的反革命勾当”。因为翦在1936年曾参与国共两党“南京和谈工作”，而指导共产党方面和谈代表的，就是时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之一，只要按“专案组”的要求“交待”，翦就能“立功”、获得“解放”。翦氏知道，“专案组”所要“证明”的完全不是事实，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罗织“罪证”。他当然忠于“伟大领袖”，但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所应有的良知。这样，必然陷入“忠于领袖”与“忠于事实”的矛盾痛苦之中。最终，他与夫人一同服药，双双自尽而亡。人们在他的右上衣袋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实在交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杜师傅是位照顾翦先生生活的退休工人。在翦先生的左上衣袋中，发现了另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历史证明，彭真的这第一声“万岁”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内“政治文

化”的某种变化抑或某种新型“政治文化”的产生。此后，“万岁”在不短的时间内曾是“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个中原因，肯定非常复杂深刻。若对此做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证爬梳，搞清其来龙去脉，并从党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方方面面加以研究，定会取得引人入胜、意义深远的成果。

期盼着读到有关专家们的《新“万岁”考》或《“万岁”新考》。

二

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些闹出后果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先生曾当过几次翻译。据齐锡玉先生在《中共党史资料》第81期《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写道，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



“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慈禧

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是煤矿工会代表。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暗自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于是耐心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却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而这部新闻片最后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却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long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很“不常识”地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三

彭真的罪名之一是包庇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其实，1965年秋发动的对吴

晗的猛烈批判，其锋芒的真正所指可谓“意在彭公”。正是对吴晗的批判，揭开了历时十年的巨大灾难的序幕，因此，吴晗又先彭氏几个月成为这场大灾难的最先受害者。

与“久经考验”的“老前辈革命家”彭真不同，吴晗是“学者从政”。他的学术才华曾深受胡适的赏识，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埋首故纸堆，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40年代中期，时在“西南联大”的吴晗由于种种原因突然左倾，走上激烈革命之途，参加民盟，并任中委。此后他直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冒着危险在学者间奔走串联，鼓动、支持学运，不遗余力，颇有成效。1948年10月，他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许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鲜、激动，但以前数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使他对某些事情，如喊“万岁”之类却感到难以理解，很不习惯。但只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前此数十年的教育就迅速被当成“包袱”扔掉（其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他对这些事物就完全理解、适应、习惯，并对以前的不理解、不习惯深感愧疚。在一篇“自传”中，他对这一过程有较为细致的描述。

吴晗的这篇自传大约写于1956年，当时47岁的他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常委兼北京市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青联秘书长等多项职务，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篇“自传”也写得非常自然、坦诚。谈到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时他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万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了……”（《吴晗自传书信文集》，苏双碧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他的转变无疑是真诚自然、发自内心的，以后确是一心一意，指向哪里，就走向哪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路跟着走，一边扔包袱”（同上）。一些年后，当他辗转

听说毛主席在某次谈话中说要发扬“海瑞精神”，便积极主动发挥自己“明史专家”的专长，急忙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响应号召。他万万不会想到，这在几年后反成为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吴晗的这种激情，这种真诚，决非少数，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满怀激情与真诚高呼“万岁”的。季羨林先生回忆说，建国之初“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10岁，简直变成了一个男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他对自己此前没有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充满耻辱感，甚至，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他自责自己为“摘桃派”，“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季羨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下，《东方》2001年第2、3期合刊）而曾经“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则更是自豪、真诚地高呼“万岁”。参加了共产党夺取政权斗争的老共产党员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写道，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广场的西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回想起夺权道路的艰难曲折、血雨腥风，他不禁百感交集，其兴奋激动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大有“万感填胸艰一字”之叹。然而：当大学生们“涌向金水桥、向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心中的上述感受达到了顶点。以前我曾长期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在此时似乎已理解了、接受了，而且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吴、季均毕业于美国人创办的清华大学，季先生还长期留学德国；李曾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学习，他们都曾如此彻底地转变观念、发自肺腑地喊“万岁”，遑论他人！

这种孩子般的透明、单纯、纯净，憧憬着同样透明、单纯、纯净的未来。然而，正因为所有人都如孩子般的透明、单纯、纯净，丧失了对“万岁”

的权力警惕，未来才会是那样地不透明、不单纯、不纯净。

四

十年浩劫，彭真备受迫害，终于在“文革”后平反复出，走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一重要岗位。

一位曾经在全国人大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曾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每次开会，彭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犹如十年“文革”期间，人们习惯在开会时先翻开《毛主席语录》读一段，然后再谈其他。（《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

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的彭真在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年已七十有七的彭真夜以继日地致力于立法，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结束了一个“泱泱大国”成立三十年竟然没有刑法的历史。1980年，他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并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在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宪法、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法律，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所以，彭真曾对人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使他对法治格外重视，对宪法格外重视。他的亲身经历说明，当年“喊万岁”并未能使他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依然使他身陷囹圄；只有真正重视、遵守宪法，包括像他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

才有可靠保障。从彭真强调自己“喊万岁”到每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认认真真“读宪法”，确是中国政治生活、政治观念、政治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象征之一。

事实说明，当年加德纳的“没有常识”恰恰更符合当代文明的“常识”、“常理”，而我们习以为常的“万岁”，才真正违背了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正因为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才会发生“文革”那样巨大的浩劫。或许，悲剧在当年第一声“万岁”和从“不习惯”到“习惯”的真诚转变

中便已铸就。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社会的悲剧。因为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声音”，而是具有极大代表性，确确实实曾经是千百万人的“心声”，是“时代的最强音”，但惟其如此，悲剧、冤狱便更难避免。因为一旦全社会自觉自愿地尊奉一人为“万岁”，“万岁”的权力便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权力一旦摆脱监督与限制，必然造成巨大的灾难，绝无例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思)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赫鲁晓夫下台内幕	谢·赫鲁晓夫著 述弢译	26.00	6.00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叶维丽	3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纯如	28.00	6.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8.00	6.00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刘 冰	34.00	7.00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托洛茨基	58.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张 胜	45.00	7.00
蒋介石日记揭秘 上下)	张秀章	88.00	8.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6.00
淮海战役秘密战	夏继诚	33.00	7.00
辽沈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5.00	7.00
平津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6.00	7.00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上下)	程美东	68.00	8.00
综合哲学随笔	高亮之	22.00	5.00
红墙见证录 上下)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69.80	8.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28.00	7.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代购代邮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民主是个好东西，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不是对个人，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坏东西……因此，真正能够给民众带来福利的，依然是国内的制度：民主、法治等因素构成的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把这个关乎民族前途的最大问题再次提了出来。每个负责任的中国人都在深思。

《李锐反左文选》

1957- 1978 年 20 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赫鲁晓夫下台内幕》

本书将全面、客观地展示赫鲁晓夫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一生事迹，揭示他参与其中鲜为人知的世界重大政治事件的内幕，带您走进他的真实生活。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阅读此书，你不仅可以了解到苏联总统对后改革时期叶利钦十年的评价，对他领导国家过程中主要的消极成果的评价，对叶利钦及其班子不加批评地接受西方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批评。你还将了解到为什么现在戈尔巴乔夫支持普京的政策。通过阅读此书，你会对苏联第一位和最后一位总统及其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不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种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我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作为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我觉得应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自己当时以及现在的想法写下来……于光远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

(上 篇)

赵启强

—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距捷克首都布拉格市中心仅6公里的鲁津机场,值班人员突然接收到一架刚刚飞临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的信号:由于机器故障,要求允许紧急降落。机场人员准许了这一要求。

客机安全降落后,直接开到机场指挥塔附近。值班人员惊讶地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不是被事故吓坏了的旅客,而是几十名挥动着手枪的突击队员。

机场指挥塔被占领了。仅过了几分钟,装载着坦克的苏联安东诺夫式巨型运输机群的第一架,在突击队员的指挥下降落了。

这支空降坦克部队,在苏联驻捷大使馆小车的引导下,以35英里的最高时速冲进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驻地党中央大厦。

此时,已临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占领军冲进捷共党中央大厦,扣押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共第一书记亚·杜布切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政府总理切尔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8月21日早晨,当布拉格人走向街头时,这个城市已经掌握在外国军队手里。这种情况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也同样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全面占领了。

占领军是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华约部队的24个师。它由5个国家的部队组成——16个苏联师,3个波兰师,两个东德师,两个匈牙利

师,一个保加利亚师。

全世界的焦点都投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得知苏联军队是为“布拉格之春”而来;于是,全世界都在追问,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干了什么?

二

在东欧,几乎每一次动乱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统治松动时发生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有了东德的造反;1956年,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判,则有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这很说明问题:动乱和造反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

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静的、稳定的。在那里,一个斯大林式的统治,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能相安无事地继续了10多年: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强尼城堡(总统府,历代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仍然居住着捷克的斯大林——诺沃提尼。

这位兼任着总统的捷共第一书记,是斯大林



1968年初,“布拉格之春”遭到了苏军的镇压

的真正崇拜者。他处处模仿斯大林：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样的元帅服，经常拿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这位锁匠出身的总统能占据这样的高位，是靠他在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的积极和狂热。

政治清洗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支柱。就像斯大林以枪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开始，然后将政治恐怖遍及全国一样，东欧各国也是从党内最高层的清洗开始，以全国性的政治恐怖为最终目的。捷克斯洛伐克从1950年开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长被绞死而达到高潮。

诺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这个时间迈出的：他得到了被绞死的斯兰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总书记。

诺沃提尼才疏学浅，但他统治这个国家并不困难，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种政策——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而不用担心有人反对；再说，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官僚机构已经构建起来，要操纵这个机器只需要权力而不需要能力。这个表面上安定的国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大规模的罢工，没有颠覆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宣传着令人放心的内容——党和领袖的英明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可是在这种稳定和太平盛世的宣传声中，没有受到反对和监督的官僚政权的腐败和特权所造成的灾难却是巨大的。

极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权式经济管理，已经使诺沃提尼政权脱离了社会主义目标。2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官僚的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围绕在诺沃提尼这位总书记周围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在这个权力结构中，起作用的不是能力和党性原则，而是取决于当权者在下面有多少亲信，在上层有多大的靠山。

这些人过着贵族式的腐化豪华生活，他们的月工资可以高到2.5万克朗，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20倍。而工资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几乎所有开销——香烟、食品、饮料、汽车、别墅、出国旅游都是由国家开销的。

非法的贪污腐败和合法的特权等级所造成

的政权危机已经十分深刻，但对于政治感觉迟钝的诺沃提尼来说，算不了什么问题。经济衰退才是诺沃提尼能感觉到的伤痛。

官僚主义国有化，使捷克这个在战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况愈下：效率低下，技术落后。1963年工业生产总值较上年下降3%，农业生产总值下降7.5%，生产性国民收入下降2%；同时，由于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导致通货膨胀。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于战前，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满，工厂出现骚动。

在这种形势下，连最不愿意承认问题、最害怕破坏了政策稳定性的诺沃提尼也感到了头疼。于是他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抓紧权力，放开经济。

三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还有另一原因：他是崇拜赫鲁晓夫的——就像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一样。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赫鲁晓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赫鲁晓夫搞经济改革，他也不妨一试……

诺沃提尼的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

1964年，45岁的希克教授是被选中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的主要人物。这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会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是改革的主要设计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的副总理。苏联出兵后，他流亡国外。

在既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能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有任何触动的两难处境中，经历了两年的犹豫、拖延，希克教授于1967年1月将自己起草并由主席团通过的“新经济模式纲领”正式实施。

在诺沃提尼时代，希克教授可以做到的，仅仅是扩大企业权限，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纲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规定供需；对工业实行分散管理；对企业实行物质刺激”。

这些措施即便在当时来说，也无多少新意，赫鲁晓夫这么尝试过，而南斯拉夫一直就遵循着这样的经济方针。

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阻挠,改革措施大多没能实施外,即使得以实行的部分也适得其反——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只是加大了国企领导人权力,而没能改变工人的处境、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生产积极性;另外,有了自主权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盲目生产,使一些获利多的产品大量积压,而某些人民需要的产品却因获利少而减少了;有的企业利用价格下放,趁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工厂仍然是老样子:“冷漠的工人不听领班工长,领班工长不理厂长,而厂长则用谎言来欺骗布拉格的部长们”。

几年的折腾和失败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明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改革设计不能交给官僚去执行,因为这些人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利益,而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希克教授等人也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发挥作用!”于是,希克教授等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政治解决上,呼吁政治改革的迫切性。

这一切都发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说,“布拉格之春”不是因为保守和拒绝改革所产生,而是一场不彻底的、失败的改革所引发出来的更深刻的革命。

四

从1964年改革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关注着改革形势。他们愿意将信任交给学者,让他们有时间精心设计,他们愿意将耐心给予官方,让政府有时间稳步实施。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成熟——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狂热、暴力、流血来干扰他们的目标。

捷克斯洛伐克人认真地了解希克教授的改革思想,也仔细地阅读科学院28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书《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这份报告是在科学院哲学所拉多万·利赫塔博士领导下,对捷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结果。

学者们为确立新的目标而忙于改革设计。作

家们则带着人民的不满和焦虑去批判旧的政治体制。

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有400多名作家出席。党的代表团也相当庞大,它由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带领。代表团成员包括了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加上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性极强的会议议程,这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政治影响不低于一次党代会。

率先发言的是党员作家昆德拉。他选择了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的题目。昆德拉对坐在主席台上的文化官员说:

“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做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还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和它的反人道实质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说,他不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它没有人道主义的面具,我们很容易对它加以识别和反对。但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继承者,它保留了这个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口号。而实际上,“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运动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摈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把爱护人类改变成残害人民,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

正因为作家们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人道主义原则给予肯定和呼唤,在后来的“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

接着,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上个月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

索尔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诉审查制度的。他说:“审查制度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国头上,迫使我们的作家服从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他也指责苏联作家协会说,“它自己就是最

大的毁损者之一，它怯懦地将 600 名无辜的作家置之不顾，这些作家遭到迫害，被放逐、监禁、关进集中营，甚至死亡。”

冲破的禁区越来越多了。反专制主义，要人道精神；反审查制度，要文化、新闻自由的呼声成了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捷共代表团团长亨德利赫上台发表了一篇尖锐谴责的讲话，训斥这些越轨、造反的作家。然后，团长愤怒地拂袖而去。

大会继续进行，并达到高潮——尤其是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41 岁的党员作家卢·瓦丘利克的大会发言。

瓦丘利克一开始就把政治恐怖和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现实描绘出来，并痛心地宣称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没有公民了。

他说：“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

瓦丘利克认为，一些平庸无能的人能行使权力，并构成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他说，“得到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帖耳的人，那些不会制造麻烦的人，只要当局不提问题，他们也不会提任何问题的那号人。在选拔各级人才时，被选中的总是些庸才。那些头脑复杂的人，特别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绩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德的标准的人则从舞台上消失了。”

瓦丘利克尖锐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冷漠：

“20 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更高级的需求为止。例如：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等。”

瓦丘利克批评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我站在这儿说话时，并没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个自由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胆怯地利用公民和当权

者之间的某种休战状态，我感到我正在犯罪……统治集团本身、政府和政府成员，他们自己有公民权利的保证吗？没有这种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举，甚至连一个政策也创造不出来。”

瓦丘利克是一位作家，他的力量在于他的背后有整个民族正在悄悄地诉说着同样的话题；同时，他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伪社会主义的批判。瓦丘利克的深刻在于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矛盾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这次发言的最后，瓦丘利克严肃地声明了这一立场：

“当我批评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是统治当局却总是这么说）；前者的命运并不等于后者的命运。”

瓦丘利克因为这次大会发言而被开除出党。这个决定是在 3 个月后召开的捷共中央九月全会上做出的。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诺沃提尼对“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意见和思想”实行全面反击。

这次中央全会取消了作家杨·普洛哈磁卡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因为他在作协代表会议上发出誓言：“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统治者，还有一个读者”就要为民主自由斗争到底。

和瓦丘利克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作家克利马、利姆、姆尼亚奇科；作家昆德拉受到严重警告。

捷共中央还决定将作协机关报《文学报》划归文化部和新闻部直接领导，该报的 19 名编辑被开除；成立新的编辑部。

这次反动是全面的，连经济改革也要停下来——限制在报上讨论改革，不准希克教授再召集改革委员会会议，不准他公开讲话。

五

科学家、作家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为呼唤春天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思考、设计和艰难的

斗争之后，政治家才出场，这似乎晚了一点。但这并不重要，当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表达出来，当人民的力量已经被某一具体的目标团结和调动起来的时候，能代表这种意志的政治家是杰出的政治家，能顺应这股力量的政治势力会陡然壮大起来；同时，有了优秀政治家的加入，人民的力量会更加凝聚，目标会更加清晰，接近目标的希望会更加增大。这种政治现象在 1967 年的捷克表现得十分明显。

首先站出来支持改革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

1967 年，这位年仅 46 岁的斯洛伐克人，担任着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和捷共主席团成员。他毕业于莫斯科党校，是一位职业政治家。

从个人气质上讲，他文静，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常常用微笑来掩饰他的紧张和慌乱。在个人品质上，杜布切克“不是权迷心窍的人，也不是想利用权力来谋求个人私利的人”。对这一点，公众当然知之甚少，但人们都知道，杜布切克夫妇和 3 个孩子一直住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开车，并且常常到公共游泳池游泳、跳水，到体育馆和老百姓一起看冰球比赛……

在九月中央全会上，杜布切克对新的文化专制和镇压浪潮表示反对，他不同意开除作家们。杜布切克的反对未能改变主席团的决议，但他以一个公开的、积极的反对者的面目出现在党的最高层。九月全会后，杜布切克与诺沃提尼的关系严重恶化，诺沃提尼下令掐断他在布拉格办事处通往党中央的专线电话，甚至还派秘密警察对他进行盯梢。

10 月底，党中央再次举行全会。会上，诺沃提尼指名道姓地说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说如果杜布切克对中央的民族政策提出异议，那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经济可以分开，斯洛伐克别再指望得到中央的帮助。

杜布切克没有退让。他说要讨论经济分立，就必须先讨论政治分权；要分，就先从上面分起，从党政分起！



布拉格市民抗议苏军入侵

问题涉及到了整个政治体制，涉及到诺沃提尼集党、政大权于身的这个最招人怨的敏感问题。开始，斯洛伐克的官员站在杜布切克一边；当矛盾进一步激化，问题进一步扩大到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以及政府机构的权力职能、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等一些更重大的问题时，一些捷克领导人也支持了杜布切克的立场：要求党政分开，要求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诺沃提尼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宣布因意见分歧太大，一时无法统一，全会暂时休会到 12 月继续召开。

改革派共产党人在等待 12 月的中央全会，诺沃提尼则寄希望于他的苏联老大哥。全会休会后，诺沃提尼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50 周年的庆祝活动，更主要的是去谋求莫斯科的支持。然而，勃列日涅夫决定抛弃诺沃提尼，因为诺沃提尼把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一团糟，他看出来诺沃提尼的统治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了。

勃列日涅夫非常了解诺沃提尼的无能，并且不喜欢他。这位总书记却不了解杜布切克是怎样一位政治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已经兴起的改革浪潮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当诺沃提尼失去了苏联支持这张王牌后，剩下的只有阴谋和暴力了。

1967 年 12 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举行大规模的冬季演习。这是诺沃提尼在演习对布拉格的军事包围。他的计划是，一旦 12 月 16 日中央全会可能撤销他的职务，就把军队开进布拉格，逮捕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

对改革派领袖和进步人士的逮捕证已经准备好,只等负责保卫工作的党中央第八部部长马穆拉签字了——其中有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的政治家,也有瓦丘利克那样的作家、知识分子。

这些军事行动被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察觉了,而这位将军又是倾向于改革的将领。这个阴谋尚未实行便流产了。

1968年元月2日,捷共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继续召开。此时,中央的派别斗争已经传到社会上,新闻和公众舆论开始对政治家施加压力——要求诺沃提尼下台。

被逼急了的诺沃提尼突然把自己装扮成改革和民主的捍卫者,同时准备牺牲他的亲信亨德利赫,让此人为他的错误政策承担责任。

诺沃提尼的挑选非常高明,亨德利赫是60年代诺沃提尼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也是这两年为诺沃提尼应付困难局面的关键人物。亨德利赫长期主管着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新闻、作家和整个文化界作过许多公开的、不得人心的干预,他一直为诺沃提尼政权充当恶人。

那是在全会期间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诺沃提尼突然向亨德利赫发问:“亨德利赫,你知道你女儿在干什么吗?她向《证据》提供了材料!”

《证据》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分子在巴黎办的杂志。几个月前,31岁的作家贝奈斯因为为《证据》提供材料而被判处7年徒刑。在对贝奈斯的审讯中,发现了亨德利赫的女儿兹杰娜参与了此事。兹杰娜确实将国内的材料秘密地送给了流亡分子办的这份杂志。

亨德利赫愤怒地顶了回去:“安托宁,你休想把我变成另一个巴拉克,那是决不会得逞的!”

巴拉克是原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因向诺沃提尼个人权威挑战,1962年竟被安上贪污罪、判处15年徒刑。西方称这次判决“结束了捷共最高层中进步分子的第一次造反”。

亨德利赫的反戈打破了平衡,诺沃提尼的总理列纳尔特也跟着风向的转变而把票投到了杜布切克一边。

1月4日,主席团进行表决,诺沃提尼以4/7的劣势,被迫交出了第一书记的职务。1月5日,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

并由杜布切克继任的消息。诺沃提尼保留总统的职务。

六

在杜布切克周围,一些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的改革派政治家和作家们敦促杜布切克拿出更大的勇气。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杜布切克的政绩是值得称道的——

为防止改革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他对邻国进行了访问:1月29日访问苏联;2月4日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会晤;2月7日与波兰的哥穆尔卡会谈;撤消了九月全会对作家们的惩治,给瓦丘利克等3人恢复党籍,给昆德拉恢复名誉;《文学报》复刊,改名为《文学通讯》,这个刊物在整个“布拉格之春”期间成了政治改革运动的一面旗帜;让作家们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召开了代表大会并民主选举了新的作协领导;为50年代大清洗中的政治冤案做出更彻底的平反……

杜布切克上任后,阅读了党的档案材料,当他详细地了解了20年来的迫害、暴行和血淋淋的冤案情况后,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失声痛哭了,他发誓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在他的国家重演。

对日益活跃的民主气氛,杜布切克不但没有摆出最高统治者的架子给人民规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相反,他大胆地将民主与人民行使权力等同起来。他说:

“民主不仅是一个人有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是人民“对国家大事负有共同的责任并能共同做出决定。”

在1月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杜布切克还谈到“人的自我发挥”,谈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主张,谈到阶级斗争只是初期的手段,而绝非社会主义的目的。

杜布切克不仅谈论民主、人道,同时还在公众集会上对一些反民主、反人道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了公开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紧接着,这些被杜布切克批评过的捷共中央书记、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务部长和总检察长被撤了职。

杜布切克利用他所得到的权力做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事。他面临的重大考验和选择是——对权力本身将如何处置,尤其是他将如何对待处于

统治权力另一端的人民的民主权力。

1968年初,编辑部和播音室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圣殿。人民倾听着、阅读者、思考着,对民主改革表示了令人激动的情感和关注。

此时,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崇拜的,已不再是那些占据着高位、操纵着官僚机器的人,而是那些与人民贴得最近,又能抓住听众注意力的人。他们除了学者和作家们,还有党和国家的一些新领导如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姆林纳日也成为风云人物。其中,斯姆尔科夫斯基是1968年最受群众爱戴的演说家和改革派首领。

斯姆尔科夫斯基57岁,斑白的头发使他像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修长的身躯蕴藏着巨大的激情。他是50年代政治恐怖的受害者,坐过8年监狱,不久前平反出任农业部长,“布拉格之春”期间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他是最坚定的改革家,是杜布切克最亲密的合作者,他把自己的改革思想坚持到苏联出兵之后。

斯姆尔科夫斯基最早是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呼吁“坚决纠正和克服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在政治生活中,他强调“必须恢复民主精神,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

3月下旬,面带笑容、满怀激情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卢米尔纳大厅”向青年党员演讲时,只能容纳3000人的大厅,挤进了6000多人。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演讲给青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将他们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对改革进程的思考。

一次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议,通过了一项提交国民议会的决议:一、要求诺沃提尼离开总统府;二、正式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三、实行迁居自由;四、实行有效的政治、经济改革;五、对一切事情都应向人民说真话;六、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七、与苏联建立平等的关系。

报纸、刊物、电台空前活跃,人民对改革空前关心,人民的意志迅速反映出未,并对政治家的活动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种政治现象是害怕而加以排斥,还是大胆顺应并组织引导这股力量去实现人民的目标?刚上任的杜布切克就面临着这样的考验。

面对这股强大的、完全不为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说:“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党应该分析和领导这个浪潮。”

杜布切克对民主力量的爱惜和重视,竟被当时和后来的一些人说成是优柔寡断、不能控制局面。实际上,一个政治家不依靠专制权力实行领导,那是需要更大的魄力和政治天才的。

杜布切克是“布拉格之春”得以顺利诞生的助产士。这是捷克人民的幸运,也是杜布切克的幸运。在此之前,杜布切克并没有表现出他具有一个杰出领袖的品质——马克思的渊博深刻,列宁抓住历史时机的敏锐和勇气,拿破仑的意志;但因为他在人民爆发出智慧和力量的时刻,能大胆地投身到人民的行列,而不怕被人民的力量所淹没,他才成了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联系这一点,我们便不能接受个人在历史上无所作为的观点——正是有了杜布切克在1968年头几个月的勇气,姗姗来迟的春天终于降临到布拉格……

(作者系省级电视台导演)
(责任编辑 吴思)

《老照片》

是一种陆续出版的读物,
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
图文并茂, 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每年出版六辑
全年定价六十元

闲览老照片,
如作壁上观。
往事归眼底,
风云自舒卷。

邮发代号: 24-177

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山东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82098460 82098479 E-mail: laozhaopian1996@163.com



读

者

来

信

《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发表李锐同志《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该文有理有据地论证了反右派斗争的前因后果。正本清源，无懈可击，令人信服，消除了误解。这个反面教训，对今后工作必将产生深远影响。难能可贵的是，李锐同志已是九十高龄（去年）的老革命，为了评价和善后反右派斗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他奋不顾身地查阅了那么多的史料，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写出近万言的大作。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实属罕见，不能不令人敬佩。文中提到“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这是不对的。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一周年。由此可见，该文可能写于2007年，发表于2008年。对此，编者应加以注明，不然读者会认为李老写错了。

天津读者 于俊沂

《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夏永安同志的专文《三峡工程论证中的“插曲”》一文，讲述了许多被掩盖的史实，读后很受启发。其中第20页讲到1992年全国人代会表决情况（《插曲之五》），我想再补充一点。

当时我们江苏省的一些稍稍懂点科学和水利的代表，均对三峡工程持怀疑态度。南京水科院院长窦国仁是“泥沙组长”，他对工程后泥沙淤积和排放也讲不清楚，只是说做了“模型试验”，浩浩长江，要用一个小型模型来做试验，确也难以服人。当时代表团里议论纷纷，中央派人来团做正面宣传，然对代表们的提问（包括气象、地质、移民、海水倒灌等等）均答不出来。后来匆匆付诸表决。在表决前，人大台湾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顺兴离座起立大喊：“万里委员长，这么重大的事不能随便决定，要多做科学论证，让专家来讨论！”但会议根本不听，匆匆表决；对那次计票，也有许多代表有异议，认为误差很大。我们江苏省的大部分代表都投了弃权票（因是中共党员，在当时情况下不敢投反对票）。四川、上海等许多代

表，都在会议期间表示了不满和遗憾。故第20页图片说“绝对多数”也不够准确。在决议案修改稿中，记得当时曾加了会后要进一步调查论证的语句，但却未执行，就仓促上马了。而且还绕过人大，成立了三峡省筹备组。一些同志“走马上任”，新省长也准备好了。后来总算在人大的反对下，才中止了建三峡省的进程。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未充分征询民意而匆忙决策。历史的发展终将澄清孰是孰非，孰功孰过。

江苏读者 吴 镨

本刊更正

本刊2008年第8期《瞿独伊忆父母瞿秋白杨之华》一文中从新疆送杨之华到延安的“刘霖哲”少将应为“刘亚哲”少将。同8期12页右栏第2行“9月接见时”应为“5月接见时”；15页左栏倒数第6行“三清团”应为“三青团”；45页14行“指责农村”应为“指责农村部”；53页右栏倒数第9行“三十年间”应为“二十年间”；56页右栏第2行“拨乱反正”应为“拨乱反正”，倒数第12行“两个凡时”应为“两个凡是”；57页右栏最后一行“统部部长”应为“统战部长”；65页右栏倒数第8行“1946年”应为“1945年”。

第9期第29页左栏第5行“1949年”应为“1946年”。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2007年合订本出版发行工作已接近尾声，仅有少量简装本，售价80元。敬请读者汇款前先电话咨询该事宜。

另：本社库存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91年—95年）精选本已售完，希望读者暂时不要再汇款了。以后请关注本刊公告。

发行部联系电话：010-68532048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08年8月15日

欢迎订阅2009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每期定价：6.90元

全年定价：82.8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8年第**10**期

1984年胡耀邦中苏边境行

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

关于三峡的“御前辩论”

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万岁”故事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